

香港長遠競爭力研究

第一部分：總體競爭力/宏觀角度

第一章 競爭力政策的性質和內容

1 前言

21 世紀是歷史上全球化資本主義 (global capitalism) 最發達的時期。它的特色是高度的市場化和全球化。它意味著更微細的分工和更熾烈的競爭。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發達的今天，沒有積極提升自己競爭力的意識，很容易就會在不知不覺間被人家超越，被邊緣化，以致生活愈來愈艱難。全球化資本主義發達，也意味著全球逐步朝向「勝者全取」(winner takes all) 的遊戲規則邁進。全球化資本主義一方面為發展中國家帶來脫貧的機會，卻在每個高度全球化的地區又帶來貧富懸殊加劇的局面。正是這個背景造就了 Joseph Stiglitz 所著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在暢銷書排名榜赫赫有名。同樣亦是這樣的背景促成了 Thomas Piketty 所著《21 世紀的資本》這本厚達 700 頁、羅列大量統計數據、以財富不均為題材的專書，居然能在 Amazon 的暢銷書榜排於首位的奇蹟。可見今天全球化資本主義下日益嚴重的財富不均問題已引起全球高度關注。

在一個以競爭力為主題的報告一開頭便提及分配不均這個敏感課題，不少人或會覺得奇怪，但其實很有必要。一個地區的競爭力不是小撮人的問題，而是近乎全體人民的問題，更是他們能否齊心協力為共同目標盡一己之力奮鬥的問題。一個地區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過度貧富不均的問題，它的競爭力只會不斷下降。人民內部的不滿不停積累，終究會傷害全民共同應對危機和挑戰的能力。競爭力始終是人力資源，包括個體和集體，能不能齊心盡量發揮潛力的問題。今天經濟學最「熱」的經濟成長理論正是以人力資本和積極發揮創意為核心的內生經濟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同時，只有在人民安於在不同崗位、並願意積極發揮自己的長處，並互相配合，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collective excellence)，才能彰顯該地區的真正潛力。相反，如果社會中有很多人怨忿累積，而社

會內耗不停，長期彼此爭鬥，競爭力下降將是不可避免的命運，這亦是社會資本理論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所引|申的結果¹。

可見香港的競爭力是全體社會各部門各司己職和全體市民各展所長的綜合結果，而這個「各司己職」和「各展所長」都要和實際環境相結合，此中就隱含了比較優勢 (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考量。據 Heckscher-Ohlin 的分析，比較優勢乃建基於天賦 (endowed) 的生產要素比例的差異²。但所謂天賦，其實不限於真正上天給我們本有的本錢，還包括過去在不同範疇的資本積累，也包括了知識的積累和文化薰陶下我們創新和自我矯正的能力。

是以這個「各司己職」和「各展所長」意味社會中每個成員按自己的比較優勢充份發揮，為同一個目標、同一個願景奮鬥。領導層要做好領導的工作；中層基層同樣也要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而社會當前的一切資本，包括大家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則視作由歷史因素所決定的既成事實。此中包括社會的制度、基礎建設的質和量、流行於社會的文化和價值。上至法律和管治制度，下至學校和家庭；大至空氣質素和土地資源，小至個人的生活習慣和修養，無一不對香港的競爭力有關鍵性的影響。這些種種的因素，雖然一時間都是歷史因素所決定，然而決定長遠競爭力從今天起的資本積累卻完全端視我們今天能否齊心並持久地各展所能，共創未來。

我們檢視香港的競爭力，先要了解香港現時的實況。我們不能因為一些國際排名仍給香港高度的評價而自滿。事實上我們的競爭力的確有無比的潛力，但我們的潛力又的確沒有好好地發揮出來。我們從數據清楚看到：香港作為大企業的地區總部的吸引力正在下跌。

¹ 可參考 Fukuyama, F.,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1995. 及 Sabatini, F.,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6.

² 赫克歇爾 - 奧林模型 (英語：Heckscher-Ohlin model)，最初由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的伊萊·赫克歇爾於 1919 年提出。其學生貝蒂爾·奧林於 1924 年將其基本觀念於博士論文中進一步闡明，Heckscher-Ohlin 模型已廣為當代經濟學者接受。

表 1.1 2008-2015 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開設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及當地辦事處數目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地區總部	1298	1252	1285	1340	1367	1379	1389	1401
地區辦事處	2584	2328	2353	2412	2516	2456	2395	2397
當地辦事處	2730	2817	2923	3196	3367	3614	3801	4106
總數	6612	6397	6561	6948	7250	7449	7585	7904

資料來源：統計處 2012 及 2015 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報告表 1.1

表 1.1 顯示：2008 年至 2015 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開設地區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地區辦事處(Regional Office)及當地辦事處(Local Office)的數目每年都有增長。但是，近年來出現了明顯的，寧以辦事處形式卻不以地區總部進駐香港的情況。表 1.2 列出這些年間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及當地辦事處之間分佈的變化，突顯了 2010 年以來地區總部所佔比例正不斷下降。2014 和 2015 年當地辦事處僱用的人數首次超越了地區總部僱用的人數。

表 1.2 2008-2015 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開設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及當地辦事處數目比例%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地區總部	19.6	19.6	19.6	19.3	18.9	18.5	18.3	17.7
地區辦事處	39.1	36.4	35.9	34.7	34.7	33.0	31.6	30.3
當地辦事處	41.3	44.0	44.6	46.0	46.4	48.5	50.1	51.9
總數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表 1.1 算出

近年來香港經濟增長疲不能興，如何振興經濟，重拾昔日光輝，需要整個社會共同虛心檢討，客觀分析。這份報告是一個開始。

2 制定競爭力政策的可能性

上文提出：要提升香港的競爭力，領導層要做好領導的工作；中層基層同樣也要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如何促成各方各自盡力發揮所長正是競爭力政策的關鍵。

領導層的責任是制定政策和領導政策的執行。要做好這些工作，領導層必須有全局的視野，並必須深諳人際間互動的規律和個人的心理規律，還要明白市場經濟的運作：特別是市場的積極作用和局限。基於這紮實的認識，他們就可以設計出完整和真正有力的競爭力政策。領導層的責任不是一句「大市場、小政府」或「積極不干預」就能涵蓋所有角色的。事實上，「大市場、小政府」或「積極不干預」都只是一個不盡不實、甚至非常誤導的口號而已。

什麼是大、什麼是小，本來就是非常主觀的概念。香港歷任的財政司都指公共開支不應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並以此為金科玉律，但根本沒有提供任何科學的論證。指「政府在整體經濟中的相對體積不宜過大」當然不會錯，因為任何可稱「過分」的即屬不宜，但這樣說並沒有實質內容，因此稱之為陳腔濫調實不為過。³

政府當然不應做它沒有相對優勢的事情。如果私營部門可以做得更好，政府實無理由跟私營部門爭著去做。但是，不少事情雖然有很高的社會效益，商業效益卻欠奉，私營部門因此是不會主動承擔的，政府就應義不容辭主動請纓，而毋須考慮會否做成「大政府」的局面。

³ 可參考 Lok Sang Ho, *Public Polic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Routledge, 2011, Chapter 9.

可見，雖然一心要做大政府的心態要不得，一心要做小政府、不敢承擔的心態同樣也是要不得。只顧削資去造就「小政府」，往往會因小失大。新奧爾良的防波堤就是因為政府早應調撥的維修經費不到位，最後在颶風卡特連娜來襲時決堤造成重大的人命傷亡和經濟損失。近年政府投入資源一直低於全國。或許正是這個原因，2016年1月公布的Brookings MetroMonitor顯示：2009-2014年間，新奧爾良在經濟發展上仍大大落後於全美國，在100個美國主要城市中的經濟繁榮度綜合排名第94。⁴香港曾有報道，指由於社署削減人手，家居照顧員工作量大增，因而出現工傷個案大幅上升的現象。⁵工傷個案大增，賠償費用和醫療費都會上升，又影響了服務。這些看似民生議題而與競爭力風馬牛不相及，其實都影響到生產力和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生產力和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當然和競爭力關係密切。

為了提升香港的競爭力，領導層所應做的、有全盤視野、有系統、有策略的工作，就是「競爭力政策」。這政策不可能自囿於任何教條框框。因此一開始就假設自由市場至上、或中央規劃至上，都不可能是高效的競爭力政策。競爭力政策不會有任何先驗的假設，更不會不假思索便以沿用多時的，類似「公共支出上限為GDP的20%」的指引為金科玉律。

其實競爭力政策不過是造就有利於「創造條件、善用優勢、群策群力、各展所長」的一切政策和制度。因此，公營部門和私營部門都要分別尋找和發揮自己最擅長的角色。上世紀70年代，財政司夏鼎基提出要倚重市場，政府宜避免干預市場的運作，讓市場更好發揮它的積極作用。這就是所謂積極不干預主義（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自此

⁴ METROMONITOR 2016, table 2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MetroMonitor.pdf>

⁵ 〈家居照顧員四成半曾工傷 社署削資減人手 工作量大增〉，明報健康網，刊於2006年2月4日，

http://www.mingpaohealth.com/cfm/news3.cfm?File=20060204/news/goc1.txt&CFID=37192378&CF_TOKEN=12750341

「經濟自由」被視作維護香港保持地區競爭力的關鍵。每次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 評香港「經濟自由」位居世界首位，特區政府都引以為傲；而歷任的財政司都以「大市場、小政府」的主調制定他們的預算案。這樣的論調假定了政府通常是多做多錯，因此與其多做多錯，倒不如處處少作為，讓私營部門多點發揮。

要公營部門和私營部門都分別發揮自己最擅長的角色，首先政府要有「看全局、知利害」的觀念。政府要明白：私營部門的本質是它不可能有全局觀。私營部門在競爭熾烈的市場運作，難免要「計數」。即是說要計清楚自己承受的成本和自己享受的效益(private costs and private benefits)。近年企業醜聞頻仍，坊間談論企業社會責任多了。但在強大誘因驅使下，只要制度上有漏洞，就會有人鑽空子，漠視違反商業倫理所造成的社會成本。而防止這些人鑽空子正是政府一項重大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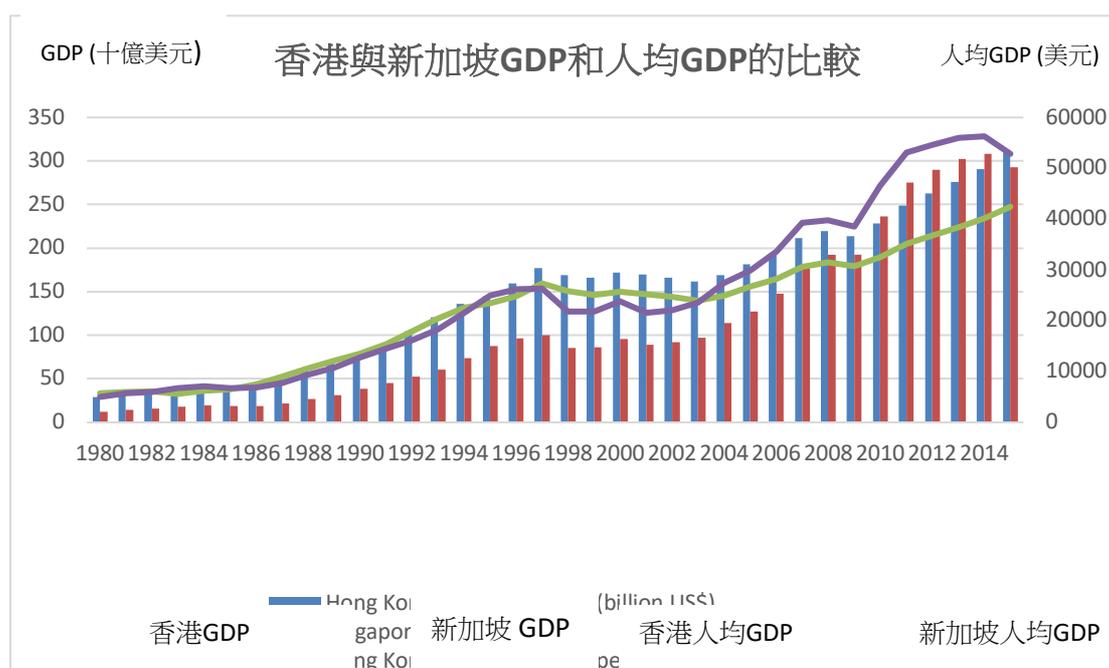
有人會問：監管工作與競爭力有什麼關係？監管工作做得愈嚴謹，競爭力會不會反而下降？對身為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為了提高競爭力，減少監管(Deregulation) 是不是更為適合？

美國2001年爆出安然公司(Enron)醜聞，2006年又出現次貸危機，其後次貸危機更於2008年發展成全球金融海嘯。冰島在金融海嘯前經濟相當蓬勃，當大家都以為減少監管(deregulation) 締造了經濟奇蹟之際，金融海嘯出現，冰島經濟急速下墜。這些事件告訴我們：該監管的不好好監管，最終很可能會釀成巨禍；以減少監管促進競爭力絕對是短視行為。金融海嘯禍及無辜，除要納稅人買單外，不少金融機構元氣大傷，還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金融中心的地位亦會下跌。這不是說少規管不如多規管。事實上近年太多的規管造成巨大的社會成本，金融界合規成本大增、運作舉步維艱。然而適切的規管確有需要，亦是對長遠競爭力真正有利的政策。

3 檢討香港經濟政策哲學

按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2013和2015年Open Market Index的排名，香港和新加坡並列為全球最開放(most open)的經濟，得分兩年都是5.5。Open Market Index含四個範疇的數據：貿易額對比本地生產總值、貿易政策的開放、對外來投資的開放和支援貿易的基礎建設等。新加坡和香港並列為全球最開放的經濟體，但它們的經濟政策哲學卻十分不同，表現亦大異。新加坡和香港直至八十年代尾都是叮噹馬頭，沒有一個見得有明顯優勢。可是踏入九十年代，新加坡的優勢明顯。時至今天，新加坡的本地生產總值已超越香港；人均產值更是遙遙領先。(圖1.1)

圖1.1: 香港與新加坡產值和人均產值的比較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香港和新加坡本來的條件並無重大分別。香港土地面積較新加坡大，人口較多，人口老化的速度也較快，而地勢為多山地少平地。但兩地早期發展長期叮噹馬頭應可視為先天條件大致相若的旁證。基於1979年後中國崛起而香港背靠內地，毗鄰深圳，而深圳和澳

門均在經濟表現上異常突出，香港背靠內地應視為比新加坡佔優的因素。由此推論，近年新加坡經濟大幅拋離香港應有政策上的原因。

香港一直沿用以自由放任為主導思想的經濟政策哲學。政府一向習慣凡事袖手旁觀，非不必要不作行動。除了麥理浩港督主政時，政府主動設立廉政公署、提出10年建屋計劃、建設新市鎮、設立郊野公園等，有關經濟的政策大多是環境逼出來的。

譬如對銀行和金融市場的監管，香港要經歷多個危機，從慘痛的經驗汲取教訓，才逐步建立較為完善的監管架構。雷曼兄弟未倒閉時，結構性金融產品以「迷你債券」命名，監管機構不覺得有問題，明顯缺乏保障投資者不被誤導的資訊。迷債事件過後，又矯枉過正，監管者為了保護自己制定了嚴苛的守則，小額的投資也要求銷售時讀出投資者理應明白的資訊並錄音佐證。

即使香港自1983年10月17日沿用至今的聯繫匯率，當年也是時勢逼出來的。2014年通過的公平競爭法，也是在百般拖延後，沒法再拖的情況下才進行立法。香港似乎一直欠缺全局觀和前瞻力。正是這種被動、為勢所逼、在詫意過後才急就章勉強推出往往未經深思熟慮的辦法，才是造成近年競爭力倒退的原因⁶。

4 經濟政策在香港的實踐：亞洲四小龍中表現如何；與紐約深圳又如何比較（與亞洲四小龍、紐約和深圳的表現比較）

對比香港，新加坡採取「目標先行、主動發功」的策略。當然在設計和推行政策的時候，難免不時還要修正。新加坡推行的政策當然也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有了明確的目標，即是有了方向，做政策檢討時亦會較有依據。新加坡早於脫離馬來西亞之前已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在1965年完全獨立時再制定了第二個五年計劃。二五期間，成立了國家

⁶不同的調查機構會雖有不同的結論。但香港經濟近年活力大減，經濟增長乏力是客觀事實。

生產力中心，為企業提供諮詢服務和訓練。1967 年通過了經濟擴展獎勵法案，1968 年開闢了裕廊工業區。在基建和稅務優惠著手，奠定了引進外資和以出口主導製造業的基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先後推出第一和第二個十年計劃。最近的一個十年計劃 2013 年推出，並以成為全球知識產權樞紐 (a global IP hub) 為目標。⁷

香港從來沒有什麼五年計劃或十年計劃。但 60、70 年代香港的發展從宏觀數字看並不遜色於新加坡。當時香港經濟動力主要來自新移民的刻苦奮鬥，其中不少且是白手興家，亦有不少是 50 年代來自內地逃避國有化的資本家。他們腦筋靈活又肯拼搏，而香港具備天然的深水港亦具地利，政府只須提供起碼的基建並放任市場自由運作，配合充沛的勞工供應和法治的環境，在當天的世界已足以創造輕工業的奇蹟。當年香港舉世曾執牛耳的輕工業包括假髮、膠花、玩具、成衣、手錶等。當年香港人若往外地旅遊，買回家的手信多注明「香港製造」。然而，亦是因為我們缺乏了前瞻力和文化視野，當時只顧發展，差不多完全忘記保育，以致大量有重大保育價值的建築物被拆毀；香港現時已再找不到一個像新加坡那麼仍保育完好、如市中心的一整片富殖民地色彩的地區和馬里士他的舊城區。

時至今天，昔日香港擁有的優勢逐步褪色。擁有天賦的深水港今天已不再是重大優勢。鑽挖的技術早已容許本來不具港口優勢的沿海城市創造人工的深水港。我們獨有的自由貿易港的地位，亦隨著國內大舉市場化和成立自由貿易區而不再特別。我們在 80 年代末，突然發現了保育的重要性，竟然由漠視保育的極端變成保育至上的極端。以前我們凡事聽任政府安排，政府要建新市鎮大家不會有異議；今天我們凡事要設法爭取最大的權益，政府要建新市鎮受盡不同利益集團的阻撓。在 1983 年在時勢逼迫下制定的聯繫匯率制變成禁忌，政府好像對它完全容不下檢討的空間，縱然現行聯繫匯率制或許真的

⁷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 As New Growth Area - Govt Accepts IP Hub Master Plan Recommendations*, published on 1st April 2013, <http://www.ipos.gov.sg/ipcf/News/IPAsNewGrowthArea-GovtAcceptsIPHubMaster.aspx> (Accessed and last updated on 6th September 2016),

沒有最佳的取代方案，官方卻未見提出驗證為本(evidence-based)的論說。相對於人家從大處看、從長遠看，我們就是沒有這份胸襟、沒有居安思危的意識、沒有創新的勇氣。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成立於 1971 年。跟香港的金管局一樣，其前身是多個政府部門。這些政府部門各司其職，無法以宏觀角度從大處看、亦欠缺從長遠看的視野，而且也沒法獨立和專業地操作⁸。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局長王宗智(Ong Chong Tee)解釋，基於新加坡是開放型的小規模經濟，以匯率為政策工具比以利率為政策工具更為合適。基本原則是維持坡元的購買力，確保市場對坡幣的信心，並保障受薪階層的積蓄不致因通脹受損。可見坡元並非自由浮動，也非與任何指定貨幣相固定，而是有意識有目的地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操控。

自由派經濟學者對政府和官員都不信任。他們對中央銀行或金管局採取「隨機應變」(discretionary)的貨幣政策不以為然。他們寧願按既定守則操作，免致因判斷錯誤而犯錯。在匯率政策上，他們或贊成完全自由浮動，或贊成鎖定掛鈎的對象。然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摒棄兩極(“bipolar”)觀點，顯出自信，多年來成績斐然，在控制通脹和保增長兩方面都非常出色。即使在亞洲金融風暴和全球金融海嘯期間，新加坡的宏觀經濟表現都非常突出。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香港金融管理局成立於 1993 年，比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晚逾 20 年。金管局成立時，聯繫匯率制已行 10 年。金管局在管控風險的工作一直都做得非常出色。然而，我們暫仍未以科學論證對聯繫匯率制作認真和客觀的檢討。1974 年至 1983 年的一段日子，發生過兩次石油危機；80 年初更曾面對美國聯儲局大幅提息壓通脹造成的世界性衰退。但在這段時間香港竟沒有一年出現過負增長。當時通脹雖高，其中不少年份又有數以十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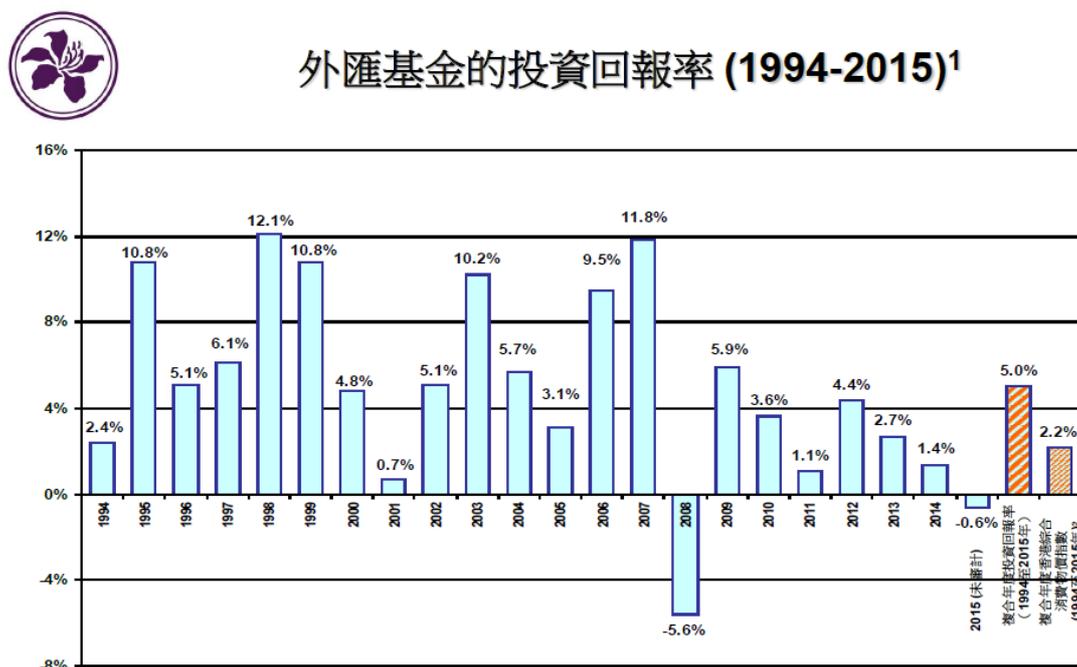
⁸ Ong, Chong Tee(2013), *An Exchange-Rate-Centred Monetary Policy System: Singapore's Experience* (October). BIS Paper No. 73w.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474008>

移民湧入，失業率在上升後每每迅速回落，整體經濟茁壯成長。當時浮動匯率不見得對香港造成禍害。

這樣說並不代表香港應改用浮動匯率制。新加坡也不願意讓匯率自由浮動。我只是說明教條式支持任何制度均不可取。如果金管局認為現行的聯繫匯率最好，它須提出科學論證。此外，縱然聯繫匯率的機制運作良好，掛鉤對象是否就是美元仍值得進一步探討。

香港的金管局並不是像貿易發展局那樣的法定機構，而這個既非一般政府部門也非法定機構的身份反而給它相對更超然的地位，有利獨立運作。然而，它管理萬億計的儲備資金，卻從來不會惠及本地的基金業，這對本地基金業的發展影響很大。如圖 1.2 所顯示，它雖盡用國際名牌，多年來的回報率並不高。

圖 1.2：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率(1994-2015)



1 投資回報率的計算不包括策略性資產組合內的資產。
2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以 2009/2010 年為基期的數列計算。

來源：香港金管局

新加坡的公共政策都是目標為本的。因此任何政策目標必須明確。Ong Chong Tee 在其 2013 年國際清算銀行的文章就指出：新加坡的貨幣政策一向以經濟增長和通脹的考量為依歸。香港金管局在其網頁則如是說：香港的貨幣政策目標為貨幣穩定，即保持港元匯價穩定，在外匯市場港元兌美元的匯率保持在 7.80 港元兌 1 美元左右的水平。相比之下，新加坡的貨幣政策以終極目的為要領；香港的貨幣政策以工具目的為要領。

除了新加坡，台灣和南韓的經濟政策同樣也是建基在明確的目標。

台灣早於 1953 年推出第一個四年計劃，提出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徑推行經濟建設。至 1993 年台灣先後推出十個四年計劃，並為台灣的長遠發展奠下基石。1991 年台灣首推六年經濟建設計劃；接著又有四年的跨世紀國家建設計劃(1997-2000)。可見國民黨掌政時期台灣雖行市場經濟，卻一直同時強調計劃，即無時不記掛政策目標並自覺地設計政策去促成該等目標。

2000 年台灣政黨首次輪替，民進黨推「新世紀國家建設計劃」，提出「知識化」、「公義化」、「永續化」的口號和「綠色矽島」願景。2004 年陳水扁連任，呼籲「團結台灣、穩定兩岸、安定社會、繁榮經濟」，推動「新世紀第二期國家建設計劃」，並以建設「富人文特色的綠色矽島」為總目標。2008 年馬英九競選總統，提出「六三三」政見(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 6%、失業率降至 3%以下、2016 年平均國民所得達 3 萬美元)。4 年後馬氏又推出「黃金十年」國家願景計劃爭取連任。馬英九目標和願景都有，可惜宏觀經濟一直因《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爭議而未見有起色，反而甫上任台灣經濟就因遇上全球金融海嘯而出現倒退。實質薪資(以 2011 年物價計)自 2008 年之新臺幣 45,038 元降至新臺幣 43,193 元低點，2011 年才回升至新臺幣 45,508 元。此數據一直被反對派引用，以證政府無能。然而這現象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和全球金融海嘯餘波影響

下十分普遍，卻被算到馬氏頭上去。⁹ 台灣當下的挑戰，不是要抗拒全球化的大潮流，而是面對全球化帶來的競爭和把握全球化帶來的機遇。

韓國的工業基礎可說歸功於 60 年代藉軍事政變奪權的朴正熙。他為了發展工業，積極扶植他們經營的紡織業、重工業、軍工和化學工業，乃至電子和高科技相關的產業。政策向財閥傾斜的情況沒有因政府更替或引進民主有所改變。今天財閥在韓國經濟中已達超然的地位。韓國前十大企業集團幾乎佔總出口量的四分之三；其銷售額佔國內生產總值八成¹⁰。其中三星集團一家營業額已佔了超過兩成。韓國經濟起飛無疑與當年政策向財閥傾斜有關。但財閥過度膨脹，卻造成尾大不掉的情況。¹¹ 由於彼此互相倚賴，官商勾結的命運迄今始終擺脫不了。尤其是政客，可說沒有一個不需要財閥的支援而能當選。

2015 年五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布最新一期《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指香港的綜合經濟競爭力連續 12 年居全國首位後，2014 年首次被深圳超越，由第 1 位跌至第 2 位。第 3 及 4 位分別是上海及台北。《藍皮書》稱本港對新興但較有潛力的產業關注不足，土地和房屋供應嚴重短缺，亦阻礙經濟發展。

相反，深圳沒有受到土地和勞動力不足的制肘，政府亦積極投入基建建設，在政策上亦積極回應市場的需要，迅速改善的投資環境吸引了大批高新科技企業進駐深圳市高新技

⁹資料顯示：2015 年第一季，台灣實質平均薪資升至 59078 元，為歷年同期最高。見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104 年 3 月薪資與生產力統計結果〉，刊於 2015 年 5 月 22 日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55211625166OJTO36W.pdf>

2014 前三季台灣經濟成長率達 3.6%，居亞洲四小龍之首。此或是馬英九正視全球化促進兩岸合作的滯後成果。見〈社論－台灣經濟成長動能奚自乎？〉，中時電子報，刊於 2014 年 11 月 04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04000017-260202>

¹⁰“Top ten chaebol now almost 80% of Korean economy” By Kwon Eun-jung (Published on 28th August 2012 12:15 KST; Modified on 28th August 2012 12:15 KST, accessed on 6th September 2016) http://www.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business/549028.html

¹¹. 林文斌〈超越相互依賴和對抗？韓國政府財閥政策變遷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 第 4 期 (2010-09-01 - 2010-12-31)

術產業園區。深圳在創新與科技研發表現突出，早已是科技界巨擘華為、騰訊等的總部盤踞之地。四大產業群（包括電子資訊產業群、光機電一體化產業群、生物醫藥產業群、新材料新能源產業群）相繼形成。科研支出達 4.05%，進一步吸引人才匯聚，形成良性循環。

5 競爭力政策的內容

競爭力政策包括對人和對物兩方面的考慮；而此兩者亦要在審視客觀環境之下進行。

競爭力的關鍵在吸引和培養優秀的人才、發揮人的創意和積極性（人），和提供優良的基礎建設和設備（物）支援各種經濟活動，藉以善用一切現有的條件和創造更好的條件，盡展潛力。這一切有賴安穩的社會環境、美好的居住環境、公平開放的市場制度、法治、優質的教育、充足準確和流通的資訊、和齊心創共贏的文化。韓國在四小龍中經濟成長在半個世紀以來最為突出。其成功要素被指為涵蓋於 ABCD 之內。A 是 Agility 靈快巧妙；B 是 Benchmarking 攀比自勵；C 是 Convergence 整合優勢；D 是 Dedication 全心全意。¹²所謂 ABCD 其實亦不外乎齊心創共贏的文化。

全球較知名的競爭力報告包括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IMD、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和經濟學人的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經濟資訊部)等所提供者。其中 IMD 給香港的排名為最高，香港在 2016 年重登榜首，瑞士排第二，美國位列第三，而新加坡則位列第四。(表 1.3 及表 1.6)

¹² HwY-Chang Moon: *The Strategy for Korea's Economic Succ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表 1.3 : IMD 對香港、內地及主要競爭對手 2006 年以來的總評分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中國香港	96.87	93.54	94.96	98.15	99.36	100.00	100.00	92.78	90.33	96.04	100.00
中國大陸	71.55	79.48	73.76	76.59	80.18	81.10	75.77	77.04	73.26	76.99	79.35
瑞士	81.54	90.43	89.66	94.16	96.13	92.59	96.68	93.36	92.42	91.92	98.02
以色列	80.65	81.86	77.64	76.96	78.14	77.10	78.47	79.59	80.36	82.97	91.54
南韓	57.68	61.56	58.88	68.41	76.25	78.50	76.75	75.17	69.65	73.92	74.19
新加坡	90.99	99.12	99.33	95.74	100.00	98.56	95.92	89.86	90.97	94.95	97.65
台灣	72.99	76.05	77.36	75.39	90.44	92.01	89.96	85.19	81.23	85.41	86.37
美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9.09	100.00	97.75	100.00	100.00	100.00	97.88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IMD 對競爭力的評估主要分四個範疇：經濟表現、政府效率、商界效率和基礎建設。IMD 評本港政府效率和商界效率為全球第一；經濟表現第九；基礎建設第十五。其中經濟表現應視作經濟競爭力的成果而非經濟競爭力的本質。經濟表現不太理想，意味著在一些範疇香港的競爭力並不理想。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2012 年公布的 Benchmarking Global City Competitiveness 報告今天或已過時，但仍可作參考。在 120 個主要城市中，香港和巴黎被評為平列第四，在紐約、倫敦和新加坡之後。報告對香港在資本投資(Physical Capital)評為 100 分，與溫哥華、東京、斯德哥爾摩、新加坡和墨爾本看齊。在金融成熟度(Financial Maturity)亦評為

100 分，與如蘇黎世、東京、紐約、新加坡、倫敦等世界級金融中心同分。然而，在制度效率(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方面，香港僅得 85.3 分，低於蘇黎世等三個瑞士城市、雪梨、墨爾本、新加坡、加拿大 3 個城市和美國 12 個城市，而只列第 22 位。

在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2017 競爭力排名榜中，香港位居第九，跟上一年比下跌兩位。香港在基建排名全球第一。新加坡則在產品市場效率排名全球第一；香港則排第二位。效率提升要素(efficiency enhancer)方面，香港在創新和成熟度(innovation and sophistication factors)方面最弱，僅得全球第 23，遠墮後於新加坡的第 12 位，其中在商業成熟度香港比新加坡稍優(排 17，高兩位)，在創新卻大幅墮後，僅排 27，新加坡則排第九位。香港在基本要求(Basic Requirement)上排第三；新加坡則排第一。在基本要求中香港排名最高的是基建(以 6.69 分排第一；新加坡得 6.50)；最弱的是醫療與基礎教育(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以 6.31 排第 26)。在效率提升要素(Efficiency Enhancer)上高等教育及培訓(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方面，香港大幅落後於新加坡。新加坡居全球第一；香港居全球第十四(比上年跌一位)。效率提升要素中最弱是市場規模(market size)，以 4.8 分排第 33。

此外，香港競爭力出現倒退的地方，上述 IMD 報告亦有指出。其中政局不穩定風險上升和社會凝聚力下降估計與政改爭議和佔領運動有關。IMD 報告所指競爭力出現倒退的項目臚列如下(表 1.4)：¹³

¹³ 有報導指，由於過去兩年拉布在立法會越來越普遍，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結果顯示這情況將會持續，導致政策制定效率降低，穆迪認為會對本港信貸評級有負面影響。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6%96%99%E6%8B%89%E5%B8%83%E6%8C%81%E7%BA%8C-%E7%A9%86%E8%BF%AA-%E7%AB%8B%E6%9C%83%E9%81%B8%E8%88%89%E7%B5%90%E6%9E%9C%E4%B8%8D%E5%88%A9%E6%B8%AF%E4%BF%A1%E8%B2%B8%E8%A9%95%E7%B4%9A/>

表 1.4：香港競爭力倒退的項目

	2014	2015
科研及發展沒有移往別處的風險(問卷調查)	5.61	4.94
政府能有效執行決定(問卷調查)	4.88	4.40
每美元 GDP 須消耗商用能源(千焦耳計)	2,191	2,390
投放於中學教育按學生的公共支出 (相對人均 GDP 的百分比)	19	17
政局不穩定風險甚低(問卷調查)	6.41	5.84
社會凝聚力甚高 (問卷調查)	4.89	4.49
生產基地沒有移往別處的風險(問卷調查)	6.06	5.58
工業用家面對的電費每千瓦時美元計	0.130	0.140

資料來源: IMD

據 IMD 的調查，香港市民凝聚力不足及政治局勢穩定性下降，都對香港的競爭力構成威脅。是以否決政改方案以後，香港人更要放下歧見，找尋共識，積極務實，齊心解決困難，才能面對全球競爭帶來的挑戰。此外，IMD 對香港基礎建設的評分比 WEF 的低很多，只排世界第 21。(表 1.5 及 1.6)

表 1.5：IMD 對香港、內地及主要競爭對手 2006 年以來在基礎建設的評分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中國香港	63.63	63.76	60.43	56.32	58.22	64.18	68.63	59.51	53.48	61.54	69.79
中國大陸	39.05	46.37	39.31	37.70	45.36	53.13	52.20	48.86	44.01	50.97	65.19
瑞士	71.48	83.23	79.64	74.00	81.61	79.62	84.76	77.58	71.83	74.06	86.27
以色列	63.52	70.98	64.27	57.09	69.78	70.19	71.85	68.23	57.47	62.05	74.91
南韓	52.94	65.29	55.40	56.12	63.70	66.56	67.60	61.59	54.41	58.93	69.46
新加坡	71.41	81.60	78.75	71.68	74.98	72.17	76.76	68.70	62.77	68.07	80.00
台灣	60.20	63.65	62.67	51.38	69.63	69.42	72.25	63.29	56.57	59.72	70.65
美國	94.85	100.00	97.06	91.04	91.80	87.59	89.08	84.27	76.84	77.40	88.42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表 1.6：IMD 對香港、內地及主要競爭對手 2016 年的總排名和主要項目排名

	2016 總分	經濟表現	政府效率	商界效率	基礎建設
中國香港	1	5	1	1	21
中國大陸	25	3	51	26	25
瑞士	2	10	2	3	3
以色列	21	31	22	23	14
南韓	29	21	26	48	22
新加坡	4	4	3	5	8
台灣	14	15	9	16	19
美國	3	1	25	7	1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6 總結

香港整體經濟在四小龍中，長期以來表現都不太理想。若以 1965 年為基數，以美元計的人均 GDP 到 2013 年為止上升 55 倍，台灣上升 95 倍，新加坡上升 106 倍，南韓上升 246 倍。過去 50 年間，香港的表現最差是回歸後。到 2013 年僅上升 39.4%。台灣升近 56.0%；新加坡升 109.0%；南韓上升 113.0%。四小龍中南韓表現最為突出。

香港整體經濟在四小龍中表現最好的是 1983-1997 期間。美元計的人均 GDP 大升 3.9 倍，比台灣的 3.8 倍和新加坡的 2.9 倍為佳，但仍比南韓的近 4.4 倍升幅遜色。日本在 1973 年前表現突出，經濟奇蹟創造者之稱號不脛而走。然而，在任何其他時段日本均被四小龍遠遠拋離：1983-1997 期間，美元計的人均 GDP 僅升近 2.4 倍，1997-2013 年間更是僅升 12.6%，比香港的上升 39.5% 為差。

四小龍中，新加坡的人均 GDP 乃屬最高，2013 年已逾 55,000 元，比香港高出 44.7%。但在 1965 年新加坡的人均 GDP 比香港低 23.7%。一般認識是經濟愈發達增長動力愈低。但近年新加坡的增長都比香港快。我們明白名義 GDP 會受匯率變動影響，但是持續多年跑贏香港，一定有值得探究的原因。

相比新加坡，其實南韓的表現更為突出。自 1965 年南韓人均 GDP 上升了 246 倍，上升速度大大高於新加坡的 106 倍。

四小龍中，香港是唯一奉行放任主義的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但唯一表現中游的期間是 1983 年至 1997 年。在這個期間，國際經濟環境穩定，而中國剛開放不久，大量廠商把生產基地北移內地，經濟轉型加快。由於 1985 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造就弱美元，跟美元掛鈎的港元亦走弱，大大刺激了香港的出口，經濟增長速度急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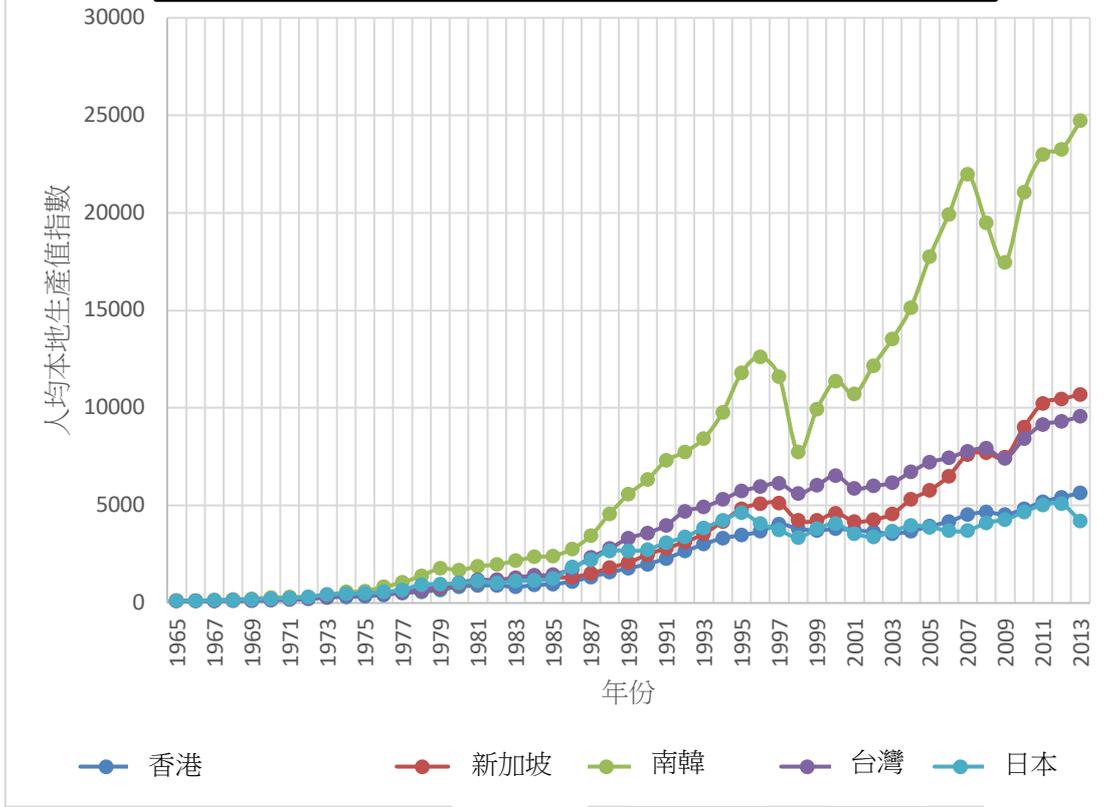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美元走強，亞洲貨幣紛紛貶值，以 1998 年比 1997 年計，美元人均 GDP 香港跑贏，香港僅跌 5.6%；南韓卻大跌 33%。然而 1997 至 2003 年，香港以美元計的人均 GDP 共跌去了 12.3%，屈居四小龍之尾；南韓反倒升 16.6%，升幅躍

升至首位。亞洲金融風暴十年後，美國次貸危機再引爆全球金融海嘯。香港自 1983 年 10 月沿用的聯繫匯率再受考驗。面對外來的重大震盪，聯繫匯率到底是解決問題還是反使問題惡化，值得深究。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浮動匯率亦未必可解決問題。關鍵是匯價是否過強？日元曾愈浮愈高，超強的匯價，不論在聯繫匯率下還是浮動匯率下出現，一樣可以削弱競爭力，對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

記得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不久，筆者在一次旅程上碰到一位經常走訪南韓的外籍商界行政人員，他說南韓肯定可以很快復元，原因是他們鬥心強而又不怕犧牲，並十分重視集體的表現。多年來南韓經濟上的業績似乎印證了他的觀察。可以說：建全的法制和優良的基礎建設外，齊心創共贏的文化(collective excellence)對整體經濟的競爭力十分重要。南韓、新加坡，乃至台灣都不乏政府有形之手，但南韓長期都強調齊心創共贏的文化，這很可能正是它能在逆境過後急速反彈的要因。¹⁴

¹⁴ IMD 對南韓社會凝聚力和整體競爭力評價不高，與其突出的經濟表現並不吻合，比較意外。

**圖1.2:香港、新加坡、南韓、台灣及日本的人均本地生產值
(美元計，指數；1965=100)**



附表(只供參考)

政治不穩定風險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高分代表低風險)					
中國香港	8.16	7.29	6.41	5.84	5.63
中國大陸	6.23	7.03	7.36	7.35	6.74
瑞士	9.43	9.37	9.31	9.16	9.38
以色列	6.19	5.74	6.13	5.15	5.46
南韓	4.12	5.16	5.69	4.72	3.83
新加坡	8.84	8.41	8.92	8.63	8.98
台灣	7.33	6.92	5.68	6.43	5.81
美國	7.81	8.17	8.44	8.30	7.83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社會凝聚力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高分代表高凝聚力)					
中國香港	6.98	4.39	4.89	4.49	4.56
中國大陸	6.87	4.39	4.98	5.18	4.90
瑞士	7.79	5.28	7.90	7.53	8.07
以色列	5.16	5.53	5.23	5.17	5.08
南韓	8.04	3.83	5.77	4.36	4.17
新加坡	8.47	5.62	6.39	7.12	7.76
台灣	6.63	5.71	4.99	5.39	5.44
美國	4.98	4.69	6.11	5.94	5.66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平等機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高分代表更平等)					
中國香港	7.71	6.79	6.66	7.29	7.02
中國大陸	5.53	5.49	5.67	5.70	5.58
瑞士	7.23	6.76	7.10	7.02	7.41
以色列	6.98	6.77	6.09	6.81	6.49
南韓	6.31	5.42	5.69	5.64	6.17
新加坡	8.11	7.28	7.21	7.37	8.00
台灣	6.83	6.94	6.45	6.17	6.00
美國	6.26	6.68	6.65	6.50	6.86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企業生產力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中國香港	7.67	7.88	7.67	8.05	7.92
中國大陸	6.64	6.86	6.67	6.59	6.61
瑞士	7.91	7.31	7.82	7.55	7.99
以色列	6.93	6.52	5.87	6.26	6.05
南韓	7.34	6.46	6.46	6.59	6.29
新加坡	7.09	6.75	7.02	6.73	7.29
台灣	7.75	7.13	7.34	6.69	6.63
美國	7.85	7.69	7.81	7.51	7.57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法律公義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中國香港	8.20	8.26	8.14	8.77	9.05
中國大陸	3.73	3.52	4.00	4.22	4.31
瑞士	8.57	8.37	8.58	8.42	8.52
以色列	7.40	7.40	7.23	7.39	7.94
南韓	5.30	5.26	4.03	4.57	3.93
新加坡	8.44	8.51	8.47	8.07	8.03
台灣	6.42	5.76	5.00	5.40	5.72
美國	7.30	7.45	7.17	7.54	7.33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金融技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愈高分愈多供應)					
中國香港	8.60	8.17	7.92	7.69	8.31
中國大陸	4.75	5.30	5.42	5.50	5.59
瑞士	8.70	8.13	8.33	8.13	8.30
以色列	7.67	7.74	7.74	7.49	7.14
南韓	5.94	5.94	6.17	6.20	5.67
新加坡	7.66	7.36	7.17	7.04	7.57
台灣	7.29	7.35	6.61	6.56	6.71
美國	8.02	7.90	7.94	7.47	7.86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企業家精神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企業家精神在商界相當普遍)					
中國香港	7.39	6.89	6.52	7.24	6.92
中國大陸	6.54	6.46	5.86	6.21	6.30
瑞士	6.91	6.52	7.12	6.57	6.98
以色列	7.44	7.57	7.57	6.98	7.19
南韓	6.50	5.68	5.29	5.53	4.19
新加坡	6.29	6.00	5.53	5.78	5.79
台灣	7.67	7.22	6.82	6.49	6.85
美國	6.58	6.49	6.64	5.96	6.33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企業吸引和留任人才的能力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中國香港	7.88	7.13	7.15	7.68	8.10
中國大陸	7.71	6.90	6.67	6.78	6.96
瑞士	8.09	7.94	8.38	7.66	7.83
以色列	7.26	7.04	7.35	7.19	7.08
南韓	8.73	7.15	7.48	7.43	7.22
新加坡	7.75	7.43	7.44	7.64	7.48
台灣	7.66	6.86	6.67	6.46	6.45
美國	7.34	7.33	7.55	7.72	7.97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企業社會責任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中國香港	6.20	5.66	5.75	6.83	6.87
中國大陸	5.58	5.72	5.38	5.53	5.85
瑞士	6.82	6.55	7.15	6.56	6.62
以色列	5.33	4.98	5.19	5.66	5.89
南韓	6.55	4.76	4.63	4.82	3.83
新加坡	6.58	6.03	5.80	5.81	6.06
台灣	7.67	6.82	6.67	6.56	6.84
美國	5.77	5.76	6.17	6.18	6.02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物流管理支持商業發展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中國香港	-	-	8.90	8.93	9.44
中國大陸	-	-	7.38	7.68	7.92
瑞士	-	-	9.06	9.26	9.35
以色列	-	-	7.47	7.70	7.30
南韓	-	-	6.37	6.65	8.40
新加坡	-	-	8.98	8.88	9.30
台灣	-	-	8.16	8.20	8.09
美國	-	-	8.89	8.66	8.92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分銷基建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中國香港	9.02	8.81	8.83	8.91	9.38
中國大陸	6.94	7.05	7.20	7.42	7.33
瑞士	9.29	9.19	9.22	9.36	9.46
以色列	7.49	8.04	7.35	7.57	7.68
南韓	7.57	7.59	7.42	7.76	7.98
新加坡	9.27	8.96	8.89	8.85	9.24
台灣	8.42	8.37	8.11	7.84	8.02
美國	8.75	8.63	8.62	8.49	8.70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對全球化抱積極態度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中國香港	7.80	8.08	7.48	7.88	8.60
中國大陸	6.77	6.56	6.87	7.02	7.06
瑞士	6.68	6.65	6.46	6.62	7.00
以色列	7.60	7.70	7.48	7.49	7.41
南韓	7.43	6.93	6.94	6.96	6.73
新加坡	7.78	7.55	7.73	7.41	7.79
台灣	7.79	7.02	6.55	6.99	7.04
美國	6.21	6.14	6.24	6.33	6.18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企業價值 (企業認同員工價值)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中國香港	7.39	6.38	6.36	7.55	7.67
中國大陸	5.42	5.65	5.55	5.57	5.78
瑞士	7.37	7.22	7.60	7.17	7.31
以色列	6.37	6.09	6.30	6.34	6.76
南韓	6.84	6.06	5.51	6.00	5.06
新加坡	7.30	6.75	7.21	6.95	6.91
台灣	6.92	7.02	6.29	6.34	6.56
美國	6.41	6.72	6.44	6.84	6.67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1995 – 2016

第二章 政府因素的評估

1 前言

自二戰後，東亞地區的迅速恢復及發展，為發展型國家理論(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提供了實證基礎。從 Chalmers Johnson(1982)¹⁵、Alice H. Amsden (1989)¹⁶及 Robert Wade(1990)¹⁷分別對日本、南韓及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分析，乃至近年中國的經驗看，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宏大的。戰後日本的通產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南韓的經濟計劃委員會(The Economic Planning Board)、台灣的經建會(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都是政府介入市場，制定發展策略並引導公私部門進行國家建設的例子(王，2004)¹⁸。同樣，中國亦透過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及五年計劃等，為國家發展進行指導、管理及規劃。發展型國家制定出口導向的工業政策、對重點培育行業實行金融市場的傾斜、價格扭曲機制、引進外來科技人才的策略以及優惠的財政政策等等，都是為了達到迅速工業化的目標，而對市場進行干預行為。(Öniş，1991)¹⁹

政府既可以是市場的守護者，擔當監督各方遵守合約、監管各方嚴守合理規範的角色；也可以是市場運作的破壞者，干擾市場的正常運作，或縱容對社會有潛在危險的行為。它既可以提供私營部門在日常經濟活動十分倚重的基礎建設，也可以把珍貴資源投放在

¹⁵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 Mirac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¹⁶ Alice 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¹⁷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¹⁸ 王世杰，〈後威權時期台灣國家社會關係—國家能力與社會自主性〉，第三章，學位論文，東亞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2004

¹⁹ Ziya Öniş, "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4, pp.109-126, 1991

大白象工程。它可以為社區建設，促進重要的社會資本，提升社區的文化生活質素，讓市民／國民安居樂業；也可以以節省為由在康體文化設施方面欠承擔。友善高能的政府可以鼓動民心，發揮群策群力的作用，讓整體經濟展露潛能，競爭力自然會提高。過度干預、苛捐雜稅、效能欠奉的政府卻足以窒礙民間的創意，增加營商成本，損害投資和創業意欲。競爭力自然會下降。

政府跟私營部門最大的分別，在於它在職能上必須高瞻遠矚，看得遠看得闊。私營部門無法不以自己的損益表為重中之重，對給其他人士或大自然所造成的影響往往不予理會。公營部門則要看社會成本、社會效益。私營部門聚焦在商業利益；政府則要全盤看。縱然商業上虧本，若對公益有利，項目仍可能有價值。正正因為政府更能掌握這種全盤視野，它對發揮整體經濟的競爭力往往有關鍵的作用。

2 制度方面

政府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建立足以妥善規範社會各界人士行為及處理有關眾人利益的制度(institutions)，並落實這些制度。制度包括正式(formal)和非正式(informal)兩種。前者要求有專責維持和支援該等制度的人員，他們行使指定的權力以彰顯制度的一致性和權威。後者包括一切足以左右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社會傳統、習慣、風俗、價值和文化等。政治制度、法制、教育制度、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市場制度等都屬正式制度，也是每一個政府都要正視和負責設計、執行和秉持的。本章擬就法制、政制、稅制和貨幣制度逐一分析評論，並探討政府在社會價值和文化等議題的角色。

2.1 法制

香港向來具備的一個優勢是司法獨立和落實法治的能力。這法治傳統長期深得商界信賴，在國際間亦享盛譽。香港在全球公義計劃(World Justice Project) 每年公布的法治指數 Rule of Law Index，歷年都位居世界前列。其整體法治指數 2015 年在全球 102 個國家或

地區中排名 17，比美國高兩位。相對 2014 年的排名 16 則微跌一位。2015 年香港在 WJP 的清廉指數排名第十，遠高於美國的排名第二十分，但亦遠遜於新加坡的排名第三。社會秩序和治安(Order and Security)方面，香港在 2015 年的排名由年前的第四跌至第七，但得分其實有所上升，由 0.90 升至 0.91，跟首位(日本) 的 0.93 分別不算很大，跟居第四位(新加坡) 的 0.91 同分²⁰。香港在刑事公義排名第六；在民事公義排名十一。新加坡在民事公義取得 0.84 分全球位居第三，遠高於香港的 0.76。香港在民事公義得分較低的一個原因是訴訟費用高昂，但在一個自由市場，提供訴訟服務的大律師收費多少政府不會干預，但或反映業界的保護主義，在某程度上打擊競爭力。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2015 年的數據，香港在司法獨立的表現全球排名第四，遠勝新加坡的排名 23 和內地的排名 67。香港之能成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政府能長期堅守法治傳統，功不可沒。香港既行普通法又在司法獨立上享譽國際，很自然，在國際仲裁服務和為航運中心而提供的專業服務方面，比其他城市著了先機。前者目前已有不錯的成績；後者尚在起步階段。²¹

然而，從某角度上是優勢從另一角度看可以變成劣勢。香港的司法獨立無疑對營商者提供了信心，但對政府的行政效率卻可能會造成不利。司法覆核亦有其代價。難免會減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²²。香港的司法高度獨立提高了人才來港的吸引力，卻拖慢了香港提升基建水準的速度，有時亦會減慢了政府解決諸如房屋的民生問題。對法治社會，容許司法覆核的機制十分重要。制度亦設有防止濫用的機制，但不少商界人士對這些機制能否有效防止濫用司法覆核仍表示擔心。

對於司法覆核是否遭濫用，在法律界亦有爭議。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Henry Litton) 就多次提出近年司法覆核程序遭濫用。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在 2016 年法律年度開啟

²⁰香港或在小數點的分數輕微落後。

²¹世界經濟論壇 2015 年評香港司法系統解決糾紛的效率為全球第三。

²²一個例子是港珠澳大橋計劃因一名居住東涌的居民指大橋工程可能造成空氣污染惡化入稟反對。原訟庭裁定大橋環評報告不合格。政府其後上訴得直。工程開支卻因此估計上升六十五億元。

典禮演辭中，指「司法覆核被嚴重濫用的指控有誇大之嫌」。她引用 2014 年的數據，指在 168 宗司法覆核許可申請中，只有 52 宗（30%）有法接受助人，而獲法庭許可繼續進行並得到法援的更只有 38 宗（22%）。在過去幾年內，就司法覆核而作的法援申請成功率維持約 25%，未見增加。然而，以司法覆核攔阻大型工程項目在回歸前鮮有發生。回歸後卻有多宗。其中早獲行政會議批准並已刊憲的《中區填海計畫》第 3 期工程因司法覆核更被逼取消²³。高院本已推翻原審庭的裁決，判香港政府勝訴並毋須暫緩填海工程。在保護海港協會再提出上訴後，香港政府仍在政治壓力下主動按照法院提出的 3 個條件檢討有關工程。

2.2 政制

近年香港涉及制度最大的爭議莫過於如何把政制逐步民主化。民主政制的作用，一在人民充權(empowerment)，即體現人民當家作主；二在制衡，即防止濫權和避免特權的滋生。但是政府的功能乃在服務人民。如果不能夠促進經濟、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福祉，所謂政制民主化，只不過徒具形式(formal democracy)，若不能實實在在回應市民的訴求，也就談不上實質民主(substantive democracy)²⁴。2014 年有關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的爭議演化成 79 天的佔中，市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結果卻是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期盼一再落空。

有趣的是：全球各國／區中，人民對政客的信任度在 WEF 2016 排名首位竟是一黨獨大的新加坡，反而自詡為民主典範的美國僅得全球第 40。相比之下，香港人民對政客的信任度在 144 個地區中排名 21（繼 2015 跌一位後再跌兩位），其實一點不差。可見政制進一步民主化雖然對市民充權(empowerment) 有裨益，卻未必會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

²³ 2003 年 2 月 27 日保護海港協會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法院於同年 7 月 8 日裁決城市規劃委員會敗訴，使該工程的批准被取消。

²⁴ 參考 Ho Lok Sang(2012) 及 Bridges and Ho(2006)(eds.)

或市民對政客或政府的信任度。香港保持獨立運作的廉署、審計部門、行政申訴專員，和獨立的司法制度，如能配合進一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特別是決策所採的準則，對增強市民和投資者信心和減少爭議，相比空有平等的投票權或參選權，更為重要亦更為實在。

要平衡民主和效率，最重要的是盡量避免一切利益衝突的嫌疑，依足預設的程序辦事。有利益衝突的人成員務必避席。每一宗牽涉利益衝突的醜聞都會破壞珍貴的社會資本，損害互信。

WEF 在 21 項有關制度的調查，竟然沒有包括新聞自由，這無疑是一個紕漏。資訊流通和新聞自由對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香港十分重要。香港所享有的新聞自由，乃至言論、集會、結社、遊行、工會活動、罷工、通訊自由和私隱等等一般現代文明社會通行的自由，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保護，是以基本法不啻是香港作為現代文明社會的制度基礎。香港在新聞自由方面表現出色，有利競爭力的提升。²⁵

2.3 稅制

除了提供上述等自由的保障外，基本法第 107 條還指定香港財政政策必須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第 108 條又指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並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可見基本法留下了空間，只要香港能維持收支平衡又不偏離低稅率的精神，它在稅種和稅率乃至其他稅務安排上，均有一定的自主性。

鑒於全球化資本主義激化貧富差距，如要保留自由市場作為決定資源配置的主要機制，政府就有必要以稅制或其他方式進行再分配，緩和貧富懸殊的趨勢。但此舉或會影響香

²⁵雖然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有下跌趨勢，卻主要來自民間媒體的自我審查。2015 年比 2014 年上升一位，在 180 國家或地區中排行 69，高於日本的 72 和新加坡的 154。資料來源：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https://rsf.org/en/ranking_table (資料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六日)

港在吸引人才和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因此對於任何稅制的改動，必須小心進行，避免不良的副作用。

香港素來以低稅率和簡單稅制著稱。論者均以此為本港經濟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跨國企業是否有意在香港設全球或地區總部，其中一個重要考慮就是香港的低稅制。

近年不少研究都指出利得稅嚴重扭曲企業行為。World Bank Group and PWC(2013) 的一份報告引用經合組織的研究結果直指利得稅是「所有稅種中，對經濟增長最不友善者」。事實上，近十年全球多個國家都不斷把利得稅率降低。KPMG 數據顯示：全球平均利得稅率自 2006 年的 27.7% 已減至 2015 年的 24.8%。²⁶ 最近，建議索性取消利得稅的包括著名學者和評論員。有電腦模擬研究發現取消利得稅會刺激投資和提高生產力，且由於工資亦會被帶動上升，即使其他稅率不變，政府的稅收亦不至減太多，而整體社會福祉卻會提升²⁷。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由特朗普勝出。股市大漲，主要原因是特朗普建議企業利得稅高達 35% 的聯邦政府徵收的企業利得稅大幅削至 15%，這比香港的 16.5% 還要低。我們預計，如果我們大幅降低利得稅率，同樣可刺激投資意欲和股市上升，最重要的是可大大提高企業來港設全球或地區總部的吸引力。

由於利得稅收入佔特區政府總財政收入近三成，向來財政政策保守的特區政府恐怕不敢貿然大幅削減利得稅稅率。基於這事實，可以考慮一個循序漸進的「試水式」方案，一方面減利得稅一方面增加其他收入。方法是：一方面只向企業盈利的一半徵現行稅率(效果等同稅率由 16.5% 調低至 8.25%)，另一方面把五成的企業分紅和套現了的(realized gains)資產增值視作個人收入課稅。個人收入則改以較累進稅率徵收，並同時擴闊稅階。

²⁶ Corporate Tax Rates Table, KPMG; Accessed on 6th September 2016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services/tax/tax-tools-and-resources/tax-rates-online/corporate-tax-rates-table.html>

²⁷ Fehr, Hans, Sabine Jokisch, Ashwin Kambhampati, and Laurence J. Kotlikoff (2013), Simulating the Elimination of the US Profits tax,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757, December.

最高邊際稅率可由現時的 17%提高至 20%，並取消標準稅率。擴闊稅階的程度應足以包括絕大部分專業人才和行政人才的納稅人毋須加稅甚至可獲減稅；而只有總收入最高的 1%的納稅人才比以前繳更多稅。標準稅率向來為人詬病，指為超富階層設保護傘，或會加劇仇富情緒、不利凝聚力的形成。建議中的稅務改革有很大的爭議性，是否可行須進一步探討。但筆者個人相信會有利社會和諧，更重要的是改變市民心中政府偏幫富人的觀感，促進社會的凝聚力。有人或會指大幅降低利得稅率下，避稅者可把個人支出算到公司支出。為堵塞這個漏洞，或有必要把應酬之類的支出設上限，並與公司營業額掛鉤。

WEF 2015-16 評香港稅制對激勵商界投資的效果以 6.0 分排名全球第四，新加坡則以 5.8 分排名第五。排名首三位的分別是巴林、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卡塔爾。建議中的稅務改革應可大大提升香港對企業的吸引力。WEF 2015-16 的排名次序可能忽略了新加坡積極為個別企業「度身訂造」作特殊稅務安排以吸引它們進駐新加坡的做法。²⁸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徵稅會改變行為。徵利得稅會打擊投資；徵個人入息稅會打擊工作意欲；徵消費稅會打擊消費；徵印花稅會打擊交投量。稅率愈高扭曲行為的效果愈大。

如果我們大幅擴闊稅階，並同時把最高邊際稅率提高至 20%，對於絕大部分的受薪階級都等同減稅，有利激發工作的積極性。最高 20%的邊際稅率只適用於月入 20 萬、30 萬、甚至 50 萬以外的邊際收入。個人認為仍不影響香港落實基本法低稅政策的要求，亦不會引發富人離開香港這片福地。

²⁸ 多位被訪的商界人士都知悉這情形立並異口同聲指稱這是實情。

2.4 貨幣制度

打從 1983 年 10 月 17 日香港便實行聯繫匯率。香港放棄了自 1974 年 11 月便採用的浮動匯率制。香港當時備受政治前景不明朗困擾，兌美元的匯價曾暴跌至接近 10 港元兌一美元。時至今日，跟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已推行了三十多年。

港元跟美元掛鈎確有不少好處。當中最突顯的首推簡單易明，而兌換率波動帶來的風險亦僅限於美元以外的貨幣。對崇尚自由經濟、不信任政府的學者更是一帖可靠的靈丹妙藥。然而，港元跟美元掛鈎亦帶來代價。主要是它阻礙了自由市場發現比較優勢的機制。

設想甲國比乙國在所有五種產品都擁有絕對的生產力優勢。假設在甲國每單位產出分別需 10, 9, 8, 7, 6 個單位的生產要素。在乙國每單位產出則分別需 20, 19, 18, 17, 和 16 個單位的生產要素。撇除資金流向不計光專注貿易，我們可以證明市場供求的力量會導致匯價平衡在雙方互利、比較優勢作用發揮的水準。要是匯率固定於錯誤的水準，雙方甚至不能進行貿易。

表 2.1: 兩國五種產品單位產出需用的生產要素數量

	產品 1	產品 2	產品 3	產品 4	產品 5
甲國	10	9	8	7	6
乙國	20	19	18	17	16

設元是甲國的貨幣；披索是乙國的貨幣。

設每單位生產要素的國內成本是一個單位的本國貨幣。如果匯價是 2 披索= 1 元，表 2.2 列出以元計五種產品的價錢。

表 2.2: 兩國五種產品單價(以元計)

	產品 1	產品 2	產品 3	產品 4	產品 5
甲國	10	9	8	7	6
乙國	10	9.5	9	8.5	8

由於甲國產品 2,3,4,5 的單價都低於乙國的單價，乙國會向甲國進口此等產品；但甲國毫無動機向乙國進口任何產品。外匯市場上對元有很大的需求，卻沒人會賣出元換成披索。供求不平衡下元的匯價趨升。設上升一輪後 2.5 披索 = 1 元

表 2.3: 兩國五種產品單價(以元計)

	產品 1	產品 2	產品 3	產品 4	產品 5
甲國	10	9	8	7	6
乙國	B	7.6	7.2	6.8	6.4

現在甲國可向乙國進口產品 1, 2, 3 和 4。乙國則可向甲國進口產品 5。

由於甲國只有一種產品出口，自己卻要進口四種產品，於是出現逆差。供求不平衡下元回貶至 2.2 披索兌 1 元。

表 2.4: 兩國五種產品新的單價(以元計)

	產品 1	產品 2	產品 3	產品 4	產品 5
甲國	10	9	8	7	6
乙國	9.1	8.6	8.2	7.7	7.3

經匯價再調整後，甲國可以進口 1 和 2 並輸出 3,4,5。甲國在產品 3,4,5 享比較優勢；乙國在產品 1 和 2 享比較優勢。促成雙方貿易是匯價的調整。

可見，透過匯價的變動，就可以促成貿易按比較優勢下進行並達致貿易平衡。上面的分析假設國際間沒有資金流動。

可是事實上，國際間資金流動既量大又多變，這就大大減低了浮動匯率的吸引力。

是以筆者並不建議香港棄用聯繫匯率的機制。聯繫匯率的機制行之有效，不需要改動。但與美元單一貨幣掛鉤並不理想。當美元太強或太弱的時候，我們或出現出口競爭力大跌(如 1985 年和 1998 年；時值美元弱勢)、或出現經濟過熱通脹急升(如 1991 年失業率曾低見 1%；通脹率近雙位數；時值美元強勢)。改作自由浮動雖或可避美元匯價大幅波

動的折騰，但作為小規模經濟體，國際資金流向一樣可以使港元的有效匯價(effective exchange rate) 暴升暴跌。比較理想的做法是沿用聯繫匯率的機制，但採納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的建議，改以一籃子貨幣掛鉤²⁹。關鍵是尋找適當的貨幣籃子，所謂適當性包括可操作性、透明度和能否穩住香港的競爭力等。另一重要的考慮是：縱使港元真的改以一籃子貨幣掛鉤，還必須設計一個萬無一失的過渡方案，確保港元兌美元的匯價在過渡後即時匯價跟過渡前一致，以免引發投機和震盪。正因為這個考慮，必須選擇適當的時機，即美元並非太強或太弱，港匯指數對我們保持長遠競爭力有利的時候。³⁰

2.5 內部管理文化方面

一個高效的公務員體系(competent bureaucracy)對於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十分重要。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的成功，按多位學者的分析，都有賴於它們高效的公務員體系³¹。這點新加坡更是非比尋常的重視。新加坡公務員，特別是部長級的公務員，是全球最高薪的。新加坡政府以此為吸引人才的手段。香港的公務員待遇沒有新加坡的那麼高薪，但仍屬全球公務員待遇最好地區之一。較高薪酬有利吸納優秀人才，這並非與民爭利，而是確

²⁹ “Hong Kong dollar should link to basket, says Stiglitz” by Benjamin Robertson. SCMP Business Section. Published on 19 November, 2013, 2:52AM; Accessed on 6th September 2016 <http://www.scmp.com/business/economy/article/1359850/hong-kong-dollar-should-link-basket-says-stiglitz>

³⁰ 何灝生編制了一個以 GDP 為加權比重的標準貨幣籃子 Benchmark Currency Basket，並以之作為計算有效匯率的基礎。標準貨幣籃子可即時報價，就像任何單一貨幣一樣，因此跟此貨幣籃子掛鉤跟與任何貨幣掛鉤可採同樣的機制。

參看 Ho, Lok Sang(2012) Globalization, Exports, and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September. <http://dx.doi.org/10.1016/j.jimonfin.2011.12.007>

³¹ Shigehisa Kasahara(2013) *The Asian Development State and 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 p.5., UNCTAD discussion paper number 213, November 2013.

保更有效地服務市民。相比新加坡，香港的公務員嫌欠缺領導才能方面的訓練，主動性亦宜加強，而整個公務員隊伍更應有明確的願景牽動各人的積極性。

特區政府對政府運作的效率高度關注，設有效率促進組。該組向政務司司長負責，為政府內部提供管理顧問服務，以提升公共服務的質素和價值；又協助發展嶄新的服務模式，運用設計思維開拓更著重參與和更有效的公共服務。該組亦支援在扶貧委員會下設立的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專責小組的工作，推動以創新方法回應社會需求。效率促進組為市民提供“1823”一站式熱線服務，方便市民獲取政府服務資訊和舉報問題；另又管理政府青少年網站。通過這兩項工作，該組得以瞭解新的公眾需求和趨勢，從而構思如何因應社會需要，調整和改善服務。

特區政府的方便營商處專注改善營商環境，致力協調政府有關方便營商方面的工作，以及統籌各有關決策局和部門為支援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的工作小組的工作。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是政府和商界溝通的橋樑，讓政府更瞭解商界面對的問題，從而知道如何協助商界解決疑難。

然而，為了削減成本，近年政府和商界都喜歡把能外判的工序外判，又把部分職位改為合約工(contract staff)或自僱工(self-employed)。表面上，外判制度和合約工可以減低成本，增加競爭力。但是事與願違的個案比比皆是。很多時候，表面上成本減低的背後是質素下降和社會成本上升。不少合約工續約又續約，顯示工種本有長期需要，只因要省錢就不予公務員合約，造成同工不同酬，致使員工士氣大受影響。把能外判的工序外判，採價低者得的辦法批出合約，往往造成惡性競爭、將貨就價，傷害市民。2015年出現公屋食水受鉛污染事件，經調查發現，有部分單位銅喉的燒焊物含鉛，而承建商所採用在內地預製附設喉管的組件亦發現有含鉛物料。在過去，亦曾發現價低者得下，一些公共屋邨的電梯維修欠妥的情況。工序外判和合約工對削減成本往往有實效，但必須審慎評估社會成本和社會效益才決定工序應否外判，否則可能損害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

一個值得探討的由政府提出的新猷是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設立的「未來基金」，據新聞公布稱，力求透過長線投資，為財政儲備爭取更高回報。發言人又補充：「我們期望『未來基金』作為長期儲蓄計劃，會為我們帶來更進取的回報，支持未來日益增加的開支需求。設立『未來基金』縱非解決全部問題的對策，但可以緩減我們下一代的財政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正立「未來基金」並非光是提高投資上的靈活性以爭取更高的回報，而是一項自我約束的措施，指定不可在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提取，除非是遇上緊急情況。若政府要動用「未來基金」，在現行法例下必須獲得立法會批准。

「未來基金」第一筆注資是二千一百九十七億元的土地基金，此外往後每年若出現財政盈餘，會抽 25%至 33%注資入基金。基金一半將作高風險投資，並交由金管局管理。

未來基金的設計造成自我制肘，其實是反映自信心不足。倘政府有自信，當然寧願保留靈活性。政府指若出現財政盈餘，會抽 25%至 33%注資入基金。若出現財政赤字，又不可從基金抽取填補，突顯自我制肘不對稱的安排。其實若憂慮在民粹政治下或恐會通過欠可持續性的政策，可要求每項政策必須先通過財政可持續性的檢驗。

2.6 教育文化方面

很多香港人不時會談及香港的核心價值。一個社會秉持的價值和文化素養可以說是「軟實力」，而「軟實力」又真的直接影響到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在我們向商界賢達的訪談中，很多時候企業文化和僱員文化都會被提及。譬如傳統上家族企業多傾向在股權上諸多限制，對外來投資者不太歡迎；年青人多對藍領工作比較抗拒；今天的投資者多較急功近利等等，如果這樣的文化「傳承」下去，對香港的長遠競爭力影響深遠。

然而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了什麼呢？很多人會提及：涵蓋和衷共濟、拼搏奮鬥等內容的獅子山精神；或許近年更多人會認為對法治、平等和公義，乃至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是我們共識的核心價值。前者涉及個人的素養和人際關係；後者則涉及社會制度的建設。

但其實最核心的，應該是秉持謙卑的心、對美善的追求和自我矯正的訴求。如果習慣了自以為是、自滿自大，人與人之間就會很難溝通，自己就會很難長進。2014 年出現佔中事件本來源自對政改的方向和步伐的不同意見，這本來是十分平常的事情。大家盡管各抒己見，沒有必要互相攻訐，更沒有必要搞佔中堵塞馬路。但是自己以為自己才對人家則不對，就很容易演變成衝突的事件，做成社會撕裂，無法和衷共濟應對大時代的挑戰。社會出現內耗必定會打擊我們的競爭力。

然而，政府對於「軟實力」的培養，如何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呢？國民教育事件突顯了「軟實力」的培養只能透過柔軟的手法，用潛移默化的政策和制度去移風易俗，並自小培養。「軟實力」是一個大題目，這裏針對幾個重要內容作簡單的闡述。

3 「軟實力」的內容

3.1 抗拒因循、擁抱創新

競爭力的一個根本是抗拒因循、擁抱創新。若是習以為常不假思索地、頑固地守著過去的做事方式無法應對日新月異的將來，就無法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善用市場機制當然合理；但為何公營開支不能逾越 GDP 的 20%？如果客觀分析後，發覺某些支出社會效益巨大，遠超社會成本，何必因會導致逾越 20% 的界限便放棄該項目？市場和政府都有缺陷。什麼留給市場、什麼留給政府，都要仔細分析才作定論。

社會能否破舊立新很視乎文化和心態。但文化和心態的形成又要看制度、政策和教育等因素。制度、政策和教育等因素都能左右社會的氛圍。中央政府於 2009 年決定要把北

京中關村打造成「自主創新示範區」。不少人對這種由上而下的政策不以為然。但隨著時間的過去，官方營辦的「孵化器」逐步被市場上有經驗的企業或創業人士取代。創業和創新的文化漸成氣候。2011年微軟位於中關村科技園的亞太研發集團總部大樓正式投入使用。微軟提供的「孵化器」，為獲選企業免費提供辦公室及開發技術半年，早已惠及逾百所企業；遴選工作全在私營部門進行，毋須政府介入。翌年微軟更與中關村科技發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四通集團成立合資企業，成為園內首家大型軟體企業。要是當天沒有政府的起動，就不會有今天的氣象。

3.2 自信心

競爭力的另一根本是要有自信。對自己失去信心，總以為外國的月亮比家鄉的圓，就無可能培育出創意。2003年，香港政府為振興經濟，耗費逾億港元舉辦大型表演活動維港巨星匯，由投資推廣署負責協辦，可惜整個項目的管理欠佳，雖由香港美國商會建議主辦，商會對項目未見全情投入。維港巨星匯主打國際級巨星，卻未見重視本地藝人。香港是國際都會，當然不應排斥國際巨星，但付巨資招攬國際巨星參加演出，直接推高票價，按當時低迷的經濟條件，要眾多市民付出高昂票價去欣賞音樂節目並不實際。審計署的一個調查發現：以英語回應觀眾意見調查的人士對巨星匯多較為正面，而以中文回應的人士，則傾向於較多批評。這結果反映維港巨星匯並未以本地消費者為重點推廣的對象。維港巨星匯為求國際級巨星撐場，結果失去以本地特色吸引遊客，更未能做到與眾同樂。

反映自信心不足的，還有香港政府和法定機構傾向僱用國際知名的顧問公司而往往忽略本地的顧問公司和學者；亦刻意避免向本地供應商和專業服務公司採購或僱用。一個例子是：多年來金管局鮮有僱用本地基金管理公司協助管理其龐大的外匯和財政儲備。我們不必要求政府凡採購均以港產為先，但我們總不應以外地產品為先。在向外地企業落

單採購之時也應向本港企業落單採購部分需要，給他們一個發展的機會。美國的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Contracting (GC)很聰明，指在政策上向弱勢人士或婦女經營的小型企業傾斜，實質上此類企業都是本國的企業。

此外，雖然出巨資並佔用大幅市區黃金地段締造西九文化區，政府對扶持本地文化創作卻不見重視，同樣反映對本土文化自信心不足。政府要培養香港人的自信心，首先要在政策上顯示自信。

3.3 謙卑心

自信不等同自滿自大。強大的競爭力背後，必須有謙卑向人學習和自我反省的文化。我們要經常自我查找不足，就要參考人家成功的經驗，並要記著自己總是有缺失有盲點。自以為是不可能進步。自以為是只會造成撕裂，損害社會資本。如果彼此都自以為是，就不可能達致共識，無法應對共同面對的挑戰。

研究團隊走訪了不少商界翹楚。很多受訪者都認為年青一代多不失創意，但傾向自以為是、我行我素，而不懂得聆聽別人的意見，也多沒有反思反省的習慣。現時通識教育常常強調「批判思維」(Critical Thinking)。但批判思維應理解為縝密思考、明辨思維；批判思維不是批判別人；而是以論證和科學的態度檢視每一個觀點。謙卑心有助於營造共識，亦更容易贏取別人的尊重。

3.4 拼搏心、公平競爭心

50、60年代的香港，生活逼人，年青人能完成中學已不容易，遑論讀上大學。但是當時香港人都有很強烈的拼搏心。很多十來歲的年青人會當學徒，寄望掌握一技之長可以

自立。很多成功故事都是學徒變師傅；師傅變老闆。今天年青人都可以完成中學；完成中學後約一半可升讀高級文憑、副學士或學士學位。

香港素來都崇尚開放、嚮往公平。早於 60、70 年代，國際間保護主義盛行的時候，香港已經是一個自由港。我們向來不怕競爭，強調要憑自己的實力，以拼搏取勝。70 年代香港可堪稱世界工廠，多種產品的出口量都是世界第一。(Rahman, 1973)³²出外旅遊買回來的紀念品不少都注明「香港製造」。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香港的廠家把生產線北移，香港本土則轉攻服務業，亦有不錯的成績。可惜近年興起了抗拒競爭、排外護己的本土主義。其實，愈害怕競爭，競爭力就只會愈薄弱。

今天的香港，專業界有專業界的排外；勞工界亦有勞工界的排外。政府要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就必須跟專業界勞工界協商出一套合情合理，既公平亦不損害界別利益、並真正惠及市民的輸入專業、輸入勞工的政策。

3.5 生命觀

在探討香港的競爭力的研究報告談生命觀，表面上有點不著邊際。但是，完整視野(holistic)的生命觀對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和長遠競爭力真的不容輕視。上文談到的、狹隘的保護主義就是因為欠缺這樣的視野。完整視野的生命觀要求平等看待自己和他人，處處推己及人，願意為他人著想，對自己和他人的權利同樣尊重，並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不怕

³² Rahman A. H. M. M (1973) *Exports of manufactur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advantage* (Rotterdam University Press) (pp. 114-129). Rahman 發現在 1960-70 年間，香港在 26 項勞動密集力的商品中，有 14 項在世界出口中取得領先地位，它們分別是：衣服(841); 棉織物(652); 玩具及運動貨品(894); 鞋履(851); 雜項紡織品(656); 無線電接收器(724.2); 雜項電子裝置(729); 塑膠製成品(893); 旅行用品，手袋及類似容器(831); 首飾(897); 傢具(821); 賤金屬製的家用設備(697); 刃具(696); 鐘錶(885) (括號內為標準國際貿易分類第一版編號)。

失敗、知錯能改。完整視野的生命觀有利社會資本的形成，增強社會的凝聚力。此外，完整視野的生命觀會使人更快樂，並同時提高個人的積極性、生產力和堅韌力。

韓國賴以成功的 ABCD 模式，指韓國由政府到企業均專心致志(Dedication)，靈快巧妙(Agility)，攀比自勵(Benchmarking)和整合優勢(Convergence)。其實都建基在謙卑自省、拼搏堅持、相信生命有無限潛能等文化價值之上。

研究團隊訪問的商界領袖，不少為香港的年青人當上了義務的導師(mentor)，處處為他們提供意見、找尋機會、協助建構人脈、甚至籌措資金。他們都認為新一代年青人知識豐富，創意無限，但往往缺乏持久力和焦點。由於生長在相對富裕的社會，鮮有如祖輩願意刻苦拼搏。新一代對爭取認為應得的權利十分熱衷；怕吃虧。但原來愈怕吃虧得著愈少。先輩不怕吃虧，反而學得很多謀生和處世的本領。

3.6 教育和職訓

特區政府在教育 and 職業訓練都投放了不少資源。2015-16 年的財政預算，教育(含職訓)佔政府經常性總支出的 22%，達 714 億元，比 2010/11 年度增加了 40%。在 2014-2015 的財政預算，政府建議向 2000 名學員發放津貼，吸引生力軍加入出現勞工短缺的行業，項目由職訓局以先導形式推行。政府又撥款 1.3 億元，資助零售業提升生產力，並由職訓局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因應同學對升讀大學的訴求，政府每年預留 4.36 億元，增加 1000 個資助院校學士學位課程高年級收生學額，而教育局計劃設立十億元的基金，提供穩定資源，長期支援資歷架構的發展，鼓勵業界從業員持續進修。此外，在二零一四／一五年度，僱員再培訓局會提供十三萬個學額，為年滿十五歲、具副學位或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士提供培訓課程和服務。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已經批准注資一百五十億元，長期支持該局的工作。

近年政府對職業訓練投放更多資源，方向正確，亦與不少商界人士的看法吻合。可惜莘莘學子嚮往的，仍以進入大學的門檻為主，甚至出現年青人因上不成大學而自殺的個案。站在僱主的立場，其實最重要的是僱員有敬業樂業、虛心負責的態度。如能對聘用崗位有相應的知識，當然就更理想。訪談中有僱主認為再增加大學學額是誤用資源。反而以實際行動再進一步提高職訓的認受性和改善出路，對改變重學位輕職訓的文化、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更為有效。此外，政府亦宜提供資源，支持各院校推行畢業前實習生 (internships) 計劃，讓更多同學了解職場上的情況，亦讓僱主多一個渠道認識和預早培訓有潛力的年青人，吸收有能力的生力軍。

4 基礎建設和環境保護

多個有關競爭力調查都突顯香港在基礎建設方面的優勢。然而，基礎建設是硬體的一種，而硬體優勢是最容易靠投入資源提高的。任何經濟體，只要有財力，都不難在短時間內增加基建投資提高基礎建設的優勢排名。因此，基礎建設的優勢屬「只爭朝夕」的類別，絕不能視作安穩的長遠優勢。香港的機場曾連續多年排名全球首位，近年卻被新加坡樟宜機場超越，2015年只能屈居世界第四，就是一個例子。然而，對基礎建設的投資，不宜以推高優勢排名為目的，而只應該基於客觀的社會成本效益的考慮。應注意：基於客觀的社會成本效益的考慮結論為值得上馬，不一定在商業回報上同樣具吸引力。

基礎建設的內容，通常指港口、空港、鐵路、公路、水電供應、污水排放、污水處理等。但除了交通運輸、水電煤氣、排污淨污以外，亦包括醫院學校、消防設施、社區設施、旅遊設施、資訊流通、科研設施、天文台、焚化爐、環保設施等。基礎建設多是公共設施，但也往往可以以收費來支付部分成本。優良的基礎建設對私營部門發揮支援的作用 (complementary or supportive role)，降低私營部門的運作成本、提升私營部門的生產力和減低風險。很經典的有關基礎建設對經濟的重要性的研究是 1990 年 David Aschauer 發

表的一篇報告。他指一元額外基建投資足以把每年生產值提升一元的估計也許過於樂觀³³，但現時沒有人會質疑適當的基礎建設投資對經濟發展足以產生關鍵的作用。當然，不是每項基建投資都是物有所值，大白象基建絕非罕有。這意味著每項基建投資都需要經審慎和科學的效益成本評估，並考慮多個不同方案才拍板。

香港在環境保護方面起步較遲。香港的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於 1986 年才成立。但近年環保工作做得非常積極，成績也佳。基於多年來在處理污水的巨額投資卓有成效，維港水質明顯改善，本港得以於 2011 年重啟多年停辦了的渡海泳賽。空氣方面，在區域污染和颱風因素影響下，2015 年 8 月初全港 15 個空氣監測站中，14 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曾錄「10+」的嚴重水平，打破 2013 年年底改用現有指數以來的紀錄，反映本港極受區域污染影響的特質，亦反映空氣污染仍是香港必須正視的問題。值得告慰的是：由於政府對汽車和發電排放加強規管，一眾關鍵的空氣污染指標，如懸浮微粒(PM10 和 PM2.5)、二氧化硫(SO₂)、氮氧化物(NO_x)，二氧化氮(NO₂)，近年均已見下降。2014 年比 2005 年，以路邊空氣監測站樣本計，PM10 微粒下跌了 33%；PM2.5 資料較近期才收集，2014 年比 2005 年資料不全，但 2014 年比 2013 年亦下跌了 14%。SO₂ 和 NO_x 自 2005 年分別下降了 59%和 30%不等。NO₂ 2014 年比上一年跌幅達 15%，但跌勢浮現稍晚，以致自 2005 年起計仍有 6%的上升。以一般空氣監測站空氣樣本計，污染物同樣出現明顯下跌的趨勢，但幅度則稍遜。臭氧(Ozone)是惟一錄得升幅的污染物，反映空氣污染雖見減少，區域的光化學污染問題仍有待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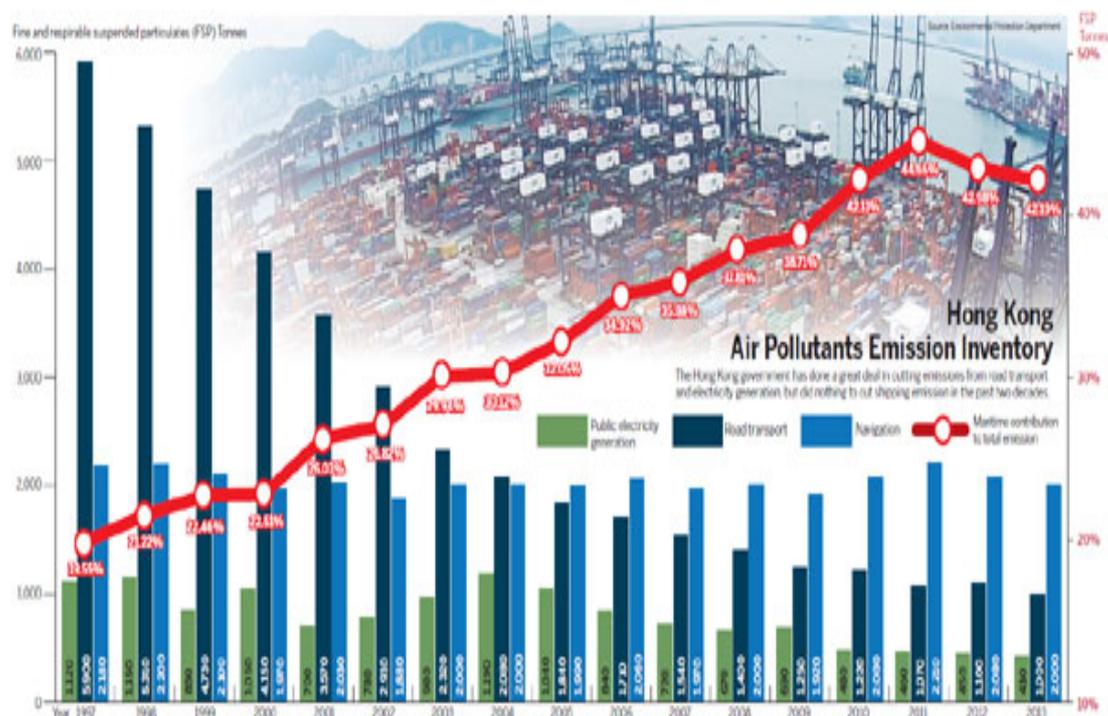
³³ David Aschauer 1989a. "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23, pp. 177-200.

David Aschauer 1989b. "Does Public Capital Crowd Out Private Capital?"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24, pp. 171-88.

據 Aschauer 表五顯示的模擬結果，公營部門在1988年投入5000億元於資本性項目會提高生產力 14.0 至14.8%。1988非農業產值達3萬4180 億元 (1982 價格)，新增產值達\$4790億至\$5090億，意味著一元的基礎建設投入每年回報約一元。

在一個專訪中，黃錦星局長指出，由於區內有三個全球最繁忙的貨櫃港，遠洋船的排放對區內空氣影響巨大(圖 2.1)。針對這個問題，香港在全亞洲首創引入對遠洋輪排放的規管，規定遠洋船在泊岸後必須轉用低硫柴油。此外，自 2013 年底，香港又成為首個亞洲城市推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AQHI, Air Quality Health Index)，這突顯空氣質素對健康的關係和政府對空氣質素的關注。政府正積極協助業界淘汰造成巨大污染的老舊商業柴油車，提供補貼轉換新車，政策為業界所歡迎。總的來說，政府有整全並有效的策略對治空氣污染。這是提高本港吸引人才的競爭力重要的一步。

圖 2.1：空氣懸浮粒子長期下跌；惟遠洋輪船排出份額攀升至 2011 年後仍高企



資料來源: China Daily, “Fuelling a Low Emission Target”, HK Edition 05/23/2016 page 8.

在都市固體廢物的處理方面，政府亦提出源頭減廢、惜食香港、乾淨回收、轉廢為能和衛生堆填五管齊下的治理策略，其中惜食香港針對香港都市固體廢物中近四成是廚餘的事實，一方面推廣惜食文化、一方面又分區建廚餘處理設施，把廚餘轉化為再生能源為主要出路。在固體廢物的處理轉廢為能是重要概念，轉廢為能可以藉生物處理技術或現

代焚化等形式達致。政府即將在石鼓洲旁邊建造先進的焚化設施，預計每天可處理約 3,000 噸垃圾，可紓緩部分堆填區的壓力。惟此焚化設施最快亦要在 2022 年才能啟用。繼推行膠袋收費並取得成效後，政府即將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以鼓勵源頭減廢。此外，政府亦推出 10 億元回收基金，支持回收行業可持續發展。

在推廣環保意識和提倡環保生活方面，政府除了在媒體展開宣傳外，還開發了幾個手機應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載。

環保工作對香港作為宜居城市十分重要。環保界普遍認為先進的焚化設施是處理源頭減廢後仍存在的固體廢物最好的手段，值得持續向市民宣傳；焚化技術的演進亦值得推介，爭取市民支持將來肯定還要增建的焚化爐。此外，對於一些環境敏感的家居廢物，如棄置的慳電燈泡、電池和電子用品，宜設立方便的回收站或預約收集的回收時間，讓大廈管理處協調。

5 資訊提供、營商便捷和其他支援方面

研究團隊在多次跟商界的訪談得到兩個十分重要的資訊。兩個都關乎政府對商界支援不足。有多位商界受訪者提出：由於公眾人士對官商勾結的關注，政府官員為了避嫌往往不敢直接為任何企業施以援手或助以一把。如有初創企業開始有了瞄頭，本來政府可以給以支援，讓它踏上成功之路。支援的方式可以有多種，包括貸款、入股、批地、配合性的基建和政策等。但這些做法都可能會惹來官商勾結的指控。但 Mariana Mazzucato 提出了「企創國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的概念，認為國家參與創業和創新，主動地變成初創企業的夥伴足以產生重大效益。Mazzucato 認為支援商界 (pro-business) 並無不妥。她以以色列的優茲瑪計劃(Yozma Programme) 為例，指出政府不但為創始企業

提供資金，還為它們提供專業和技術支援，就是這樣把以色列打造為創始企業王國(“Start Up Nation”)。³⁴

其實，官員規避引來官商勾結的指控的嫌疑未嘗不是好事。但規避這些嫌疑可以透過更透明更具問責性的程序，而毋須跟商界劃清界線。以色列的 Yozma 本來就是政府支援商界的項目。Yozma 是希伯來文，意思是自發(initiative)，始創於 1993 年，它一方面為外來的風險資本投資提供具吸引力的稅務優惠，一方面又為具條件的企業注入來自公帑的資金。但這都不是官商勾結，因為有機制防止政府官員從中漁利，也有標準和機制決定怎樣注資。1992 年 Yozma 設立一億美元的基金，以吸引有成功經驗的風險資本家去以色列投資。要獲得政府注資，風險資本家要自行籌措 1200 萬美元的資金，並與以色列本土投資者結盟，這樣，可獲計劃以 3:2 的比例配資。這個計劃的好處在於，當基金投資成功，基金夥伴可以以優惠價格買斷政府的股份，這等同投資者可以在計劃成功後獲得較大比例的收益，而政府亦承擔了分享新創投資的風險，並能在事成後實現真正的退場。³⁵自 90 年代起，以色列的新創企業得到長足的發展，高科研投入比例正正是以色列新創產業發展蓬勃的證據，2013 年，以色列的民間研究開發投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 4.1%，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最高。³⁶以色列新創產業的成功，有賴於政府在政策上提供具遠見、適合國家發展形勢及大膽的支援措施。可見，政府對於發揮一地之競爭力具有決定性的功能。

香港近年在支援中小企方面都設有專項資助基金。譬如 2013 年的財政預算講詞中，曾俊華司長就提出要在六方面協助本地的中小企籌集資金及開拓新市場。其中四方面都涉及動用公帑：

³⁴ “Lunch with the FT: Mariana Mazzucato”, Financial Times, published on August 14 2015. <https://www.ft.com/content/f4109fae-40df-11e5-b98b-87c7270955cf>

³⁵ 丹恩·席諾、掃羅·辛格，《新創企業之國：以色列經濟奇蹟的啟示》，木馬文化，2010

³⁶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srael, “National Expenditure On Civili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4”, press release, 25 Aug 2015. http://www.cbs.gov.il/hodaot2015n/12_15_227e.pdf

(一) 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的申請期至二零一四年二月底。政府於 2012 年五月推出了一千億元的信貸保證額，讓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以優惠的擔保費提供達八成擔保比率。有關措施直至 2013 年一月底已批出超過五千四百宗申請，超過四千家企業受惠，涉及的貸款額超過二百四十億元；

(二) 2012 年六月以來，推出總值十億元的 BUD 專項基金，協助香港企業升級轉型、發展品牌和拓展內銷市場，以提升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

(三) 建議調整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累計資助上限，在符合額外條件下，由十五萬元提升至二十萬元，幫助中小企參與出口市場推廣活動，包括交易會、展覽、考察團以及刊登廣告；

(四)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自 2013 年三月一日起為每年營業額少於五千萬港元的香港企業推出一項「小營業額保單」計劃，為出口商的投保增加靈活性。在同日起的兩年內，計劃下保戶更可以享有保單年費豁免及最高百分之二十的保費折扣。

此類支援中小企、特別是初創企業的動作，往後每個預算案都有提出。譬如「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特別優惠措施在 2016/17 的預算案就宣佈再延續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然而有業界人士反映：審批申請嫌過於嚴謹，以致受惠者並不算多。可見，這些支援要有實效，清楚透明的申請資格和審批條件，簡單易辦的申請程序，都有必要。

特區政府近年對科技創新的支援明顯增加了不少。但由於基數低，各項支援其實仍屬偏低。如 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的科技券先導計劃、創科生活基金和創科創投基金，分別只有五億港元、五億港元和 20 億港元，只可以說聊勝於無。比較大手筆的是投入

82 億港元在將軍澳工業邨推動智能生產和研發；又出資 44 億分階段擴建科學園。有關科技創新更深入的討論載第十二章。

6 營造共同目標的能力和爭取市民信任的能力

政府的一個最重要的角色是領導眾人為共同目標奮鬥。如果眾人都能齊心為共同目標奮鬥，競爭力自然會大大提升。要做好領導眾人這角色，政府必須得到市民的信任和提出能攝動人心的願景。

要得到市民的信任，政府必須能經常易地而處，想像市民的處境，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為他們分憂。梁振英常說：「民生無小事」，正是這種思維。然而，雖說民生無小事，民生亦有先後緩急之分。民生愈急於解決的事情，政府愈要優先處理。香港人近年最不滿的應數置業難。可惜特區政府雖然致力於覓地建房並略有所成，其所謂需求管理措施，特別是額外印花稅，卻抑壓了換樓活動，無形中減少了二手樓的供應。上車盤的樓價反而急升，額外印花稅尤其是加辣版額外印花稅幫助不了首次置業人士，反而弄巧成拙。自額外印花稅推出後愈小的單位價錢反而升得愈快，削弱了政府的威信和感召力。

此外，政府必須確立合情合理的程序並按該等程序辦事。如果能定時檢討這些程序，並邀請有公信力的社會人士參與檢討，對日後按程序辦事推行的政策減少阻力會有很大的幫助。一般來說，任何具體政策都會有受影響的人士支持和反對。受影響的人士當然應有充份的機會反映政策對他們的影響，但最終決定應由影響中性、有公信力的人士考慮各持份者所受的影響按既定程序拍板。對於受負面影響的人士，政府宜提供適切的補償。

7 總結

不少論者認為：多個亞洲國家／地區在 20 世紀迅速取得矚目的經濟發展，其政府扮演的角色功不可沒。他們提出此等「發展導向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特徵在於其政府均積極推動發展。約翰遜(Johnson, 1982)指出日本作為「發展導向國家」積極推行兩種政策：一是工業以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提高生產效益；二是工業以結構重整(restructuring)達致戰略目標。前者以改善管理、提升生產力為目標，較少爭議；後者對不同工業要作取捨，亦即是揀選優質的、有美好前途的工業(picking winners)予扶持；夕陽工業則任其衰敗或遭淘汰。結構重整自然意味著農業、工業、服務業等在整體經濟的份額會出現變化。結構重整涉及政府官員的判斷，難免會引起爭議；但如官員真的能洞燭先機，經濟升級轉型自然會更快。

1989 年 SRI 完成了一個關於競爭力的研究，題為《共建繁榮：香港邁向未來的五個經濟策略》，開宗明義提出了以五個經濟策略來共建繁榮，分別為保持香港的特殊性、改善香港的基礎設施和培養並吸引人才、增強國際地位和網絡、增強與內地協作和促進多種伙伴關係。很明顯，要推動這些策略，非在政府層面下功夫不可能做得到。譬如保持香港的特殊性，就必須落實一國兩制，亦必須獲得中央政府的支持。要改善香港的基礎設施和培養人才吸引人才，政府必須大力支持教育和培訓的基建，又加強環境保護。即使在增強與內地協作和促進多種伙伴關係等，也離不開政府的影子。香港跟內地達成的「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也是要政府積極推動才成氣候。SRI 的報告肯定了政府在提高競爭力的角色。

香港向來奉行市場經濟；經濟學界對政府揀選優質工業優先發展的能力，亦差不多一面倒不認同。然而，經濟學界都認同市場可以失效，並認同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時政府可發揮矯正失效的角色。一般而言，只有政府可以有全盤視野，亦只有政府可以掌公權力捍衛市民整體的利益。然而，政府同樣可以失效(government failure)。政府可以對

社會環境和政策誤判，可以用人不當，也可以因循苟且。政府要經常檢討，勇於創新，嚴於分析，敢於承擔，敢於領導；要以身作則培養社會的軟實力；要為社會勾劃出一個合乎公義、積極進取、共享繁榮的願景，才能推動民間的積極性，才能群策群力，打造更美好的將來。

第三章 民間因素的評估

1 前言

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公布 2015 年全球宜居城市指數，2014 年位居第 31 位的香港，因該年的抗爭活動連降 15 名跌至第 46 位³⁷，但仍高於排名第 49 位的新加坡，不過兩個城市相差的分數，只有 0.1 分，香港是 88.8 分，新加坡則有 88.7 分（100 分滿分計）。

城市宜居與否在以知識型經濟為主導的今天，肯定是決定競爭力高低很重要的因素。不宜居的城市無法留住、更無法吸引人才。長遠下去，只會江河日下，無法跟其他地方比拚。什麼因素決定宜居的程度呢？EIU 提出五類因素。其中社會的安穩度佔 25%；醫療系統的可靠性和全面性佔 20%；文化與環境佔 25%；公私營教育是否質量兼備佔 10%；基礎建設佔 20%。五類因素各細分共 30 個小項目。

宜居城市指數細項中，跟文化相關的有很多，其中如罪案率、貪腐的普遍性、社交上或宗教上的禁忌、社會抗爭和亂局的風險、文化多樣性等等，都反映該城市的文化和文明程度。又諸如醫療和教育，乃至房屋等要素，當中關乎政府支出的，其實同樣離不開文化。政府若是以人為本、市民若是重視生命，大家自然會更樂於在這些政策範疇上承擔和投放資源。文化因素不似基礎建設，不是有錢就可以在短時間內建立。文化因素是長年社群共同生活的沉澱，它屬於所謂軟實力，足以決定一個城市的長遠競爭力。一個政府的管治水平，乃至企業是否按商業倫理操作，其實都離不開民間的習慣、風俗、價值、文化。2003 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選舉居然攆走了以減稅減開支為政綱並已執政八年的進

³⁷ EIU 的報告有一段先提底特律市因罪案率上升和社會不穩影響，宜居指數下跌，然後提到香港，指出大規模的抗爭運動及與警方的衝突導致排名明顯下跌。(頁3)

步保守黨(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PC)，顯示人民對公共服務是有要求的³⁸。加州的布朗總督(Jerry Brown)之能以加稅加開支贏得大選同樣顯示人民對公共服務是有要求的。³⁹

2 創意無限，性格獨特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主要由移民創造出來的大都會。絕大部分今天的香港人，自己、父母、或自己的祖輩都是由國內或其他國家的移民。正因如此，香港向來都是中西文化匯聚的地方。來自印度的 Hari Harilela (夏利萊)，祖父來自中東而自己出生於香港的 Michael Kadoorie (米高·嘉道理)，出生在德國但來自加拿大的移民 Allan Zeman (盛智文)，來自日本的小提琴家西崎崇子等，都早已是道地的香港人。至於由內地移居香港，而在各領域卓然有成的更是多不勝數。其中不少是白手興家的創業家；畢生奉獻於教育和研究事業的教育家、哲學家、科學家；畢生奉獻於報業、文化、藝術的文化人。

香港人對外來文化從來都不抗拒。近年日本潮流和韓國潮流都曾風行，很多香港人對日語和韓語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紛紛學日語韓語。此外，亦有不少年青人學法文、德文，乃至西班牙文。香港人非比尋常的開放度和國際網絡使香港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大都會。

香港素來被描繪成文化沙漠，但是其實香港從來都不是文化沙漠。香港向來都有自己的性格，並曾孕育了不少本土作家、詩人、編劇、編舞、作曲家、電影製作人、音樂創作人、表演人。在國共內戰期間，大批知識分子及文人逃避戰亂南來香港，在香港這片自由和太平的土地繼續創作。1949 年後更多文人湧到香港，其中有辦報的，也有辦雜誌的。當時讀報風氣盛，不少讀者更因追看連載小說而買報；不少著名的文學創作都先在

³⁸ 張美珍(2003) 「安省選舉：不流血「政變」。信報十月十三日。

³⁹ John Nichols: "How Jerry Brown Got Californians to Raise Their Taxes and Save Their State," Sept 16 2014, The Nation.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how-jerry-brown-got-californians-raise-their-taxes-and-save-their-state/>

報章發表，其後再編成書刊出版。香港文壇百花齊放，其中金庸的武俠小說不但在港風靡一時，還被翻譯多種語文行銷海外。抗戰期間有抗戰的作品；戰後則有反映小市民生活的、有以歷史背景的、也有以現代為背景的；有推理的、言情的、抒情的。創作體裁有小說、散文、詩詞、歌曲、音樂劇和粵劇等，應有盡有，盡顯民間創意。香港又有其獨有的粵語流行曲，更孕育出香港獨有的英語粵劇。電影的發展亦反映社會的變化。抗戰期間抗戰電影成為香港電影的一個主要類型。1949 年資金和大批中國最優秀的電影工作者南移，國語電影盛行甚至蓋過粵語片。到 70 年代粵語片才壓倒國語片成為主流，並更多採用本地題材。另一曾風靡海外華人市場是則是電視劇。無論在小說、電影、電視劇，乃至流行音樂，香港人的獨特風格和創意均自成一家。即使今天，僱主對僱員評價最高的亦是創意。⁴⁰ 秉承着一貫的原創精神，近年非常蓬勃的港產始創企業亦別樹一幟。2015 年 Hong Kong Business 就揀選了 20 家「最炙手可熱的始創企業」逐一介紹⁴¹。這裏不贅。

3 自力更生、守望相助的獅子山精神

香港向來崇尚自力更生和公平競爭。五、六十年代時香港基本上沒有社會保障網，自食其力外沒有其他選擇，慢慢形成了自力更生的性格。但正是這種性格使香港人和市場經濟有如天作之合。戰後香港人口激增，1945 年起短短五年間，香港人口由七十多萬躍升數倍至 1950 年的二百二十萬。當時人浮於事，生活艱難，但各自走位，各自謀生，新移民居然大致上都能安頓下來。1960 年人口再增至 300 萬；1970 年人口又增至 400 萬；到了 1980 年，人口增至逾 500 萬。其中不少人白手興家，成功創立自己的事業，亦締造了香港的工業騰飛。

⁴⁰ 根據匯賢智庫在 2015 年進行的僱主問卷調查。

⁴¹ “Hong Kong’s 20 hottest startups to watch out for in 2015”, *Hong Kong Business*, March 2015. http://hongkongbusiness.hk/sites/default/files/hongkongbusiness/print/HKB%20FebMar_Cover%20s_tory.pdf 該二十個初創企業只有小部分直接與文化相關，但都印證港人創意澎湃。

然而，自力更生，公平競爭的文化，因政策失誤及教育改革失焦而被逐步破壞。近年政府連年「派糖」，並常以公屋居民身份為識別派糖對象之一；1997年12月公布的租者置其屋計劃更是把珍貴資源大贈送式賤賣給公屋居民。初時即使富戶亦可於計劃推出首年獲折上折優待購入單位。後來此優惠雖取消，富戶仍可以遠低於市價的價錢購入單位。合情合理、本著自力更生精神的居屋補地價政策反遭批評為阻礙居屋單位流動。實情是，居屋住戶購入單位多只以安居樂業為目的，買賣樓宇致富並未在主要考慮之內。2011年嶺南大學受ING委托所做的一個調查就發現在各類住戶當中，居屋業主的快樂指數最高(表3.1)。如果流動率低是因志在安居樂業不願搬來搬去，又何妨之有？

表 3.1 按居住單位性質區分的ING香港快樂指數 2011

Happiness by Living Unit

Live Unit 住屋類別	Mean 平均值	Sample 樣本數目
Private Home 自置物業業主	7.15	3288
HOS Home 居屋業主	7.53	1459
TPS Home 租者置其屋公屋業主	6.91	321
Private Housing Tenant 私樓租客	7.10	1256
HOS Housing Private Tenant 居屋租客	7.00	138
Public Housing Tenant 公屋租客	6.79	2061
Total	7.11	8523

資料來源: ING 2011 On-line Happiness Survey, CPPS, Lingnan University

六、七十年代的小學升中試要求學生考中文、英文、算術並以自己的成績競爭入讀心儀的中學。1978年推出九年免費教育，升中試被學能測驗所取代；學能測驗理論上可以減低操練，亦可抒減學生面對的壓力。然而，由於對心儀學校競爭熾烈，操練的風氣根

本沒有可能改變。學能測驗包括文字推理及數字推理兩部分，而有針對性的操練又的確可以提高成績，改變測驗形式無法減低操練的風氣。

學能測驗減操練不成，卻造成學生語文能力下降。學能測驗的成效雖乏善足陳，卻一直維持至 2000 年。當年的教育統籌委員會決定將派位組別從 5 組減為 3 組，又發表《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並宣布廢除全港的學能測驗。然而，改革設過渡期，在過渡期中，以 1997 年至 1999 年各校的學能測驗結果來調整每校學生的校內考試成績。

2005/2007 年度起，教育統籌局一再修訂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分配辦法仍以 18 個月的校內成績輔以調整為骨幹。其中一個改變是要求每所以中央派位招收中一生的中學為所有中一新生進行包括中、英、數的「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教育統籌局以此測驗取得的成績調整中一新生的所屬小學之往後的小六學生的校內考試成績，作競爭性派位之用。此外，教育統籌局容許中學按本身的辦學理念和特色，自行取錄三成的學生，但必須預先公布收生準則。學校可以安排面試，但不得設任何形式的筆試。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學生可向兩間中學申請入學。

教育統籌局做了這麼多功夫，結果不是轉移了操練的方向，就是產生了一種有壓力下的無力感。自己在校內成績多好，如果上一屆師兄師姐「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成績不好，自己升學的選擇就可能被拖累。有受訪的文化界朋友就指出：香港派位辦法多年來的蛻變，意味著每人應為自己負責、接受公平競爭的文化已起變化。為了減少對學生造成的壓力，教育統籌局一再改革行之有效、強調基本功的升中試。但是，只要學生和家長有心儀的中學，而學額僧多粥少，壓力永遠存在。以 18 個月的校內成績為主要依據，固然比一試決定一切為吸引。但以上一屆升中生的成績來調整本屆升中生的校內成績，容易產生被動感和無助感，自己應考自己負責反而更能建立自力更生、公平競爭的精神。

同樣，禁止學校自行收生時用筆試，而只許面試，亦會產生無力感，對性格較內向，一心將勤補拙的學生並不公道。

談到獅子山精神，不得不提有「基層名校」之稱的鮮魚行學校。該校因為 2003-04 年度新生不足 23 人，2004 年初被教統局要求停止錄取小一學生（即「殺校」），該校師生非常團結，並組織起來表示抗議。2004 年中，教統局安排「特別視學」，視學報告正面，教統局暫緩「殺校」決定，當時學校已作最壞打算，籌款自行開辦私立小學一年級課程。04-05 年度由於小一收生增加，教統局宣布重新資助該校。2005 年 10 月學校獲商人顧明鈞捐款 100 萬港元。時任校長梁紀昌以該筆捐款推行英語科小班教學。2005 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該校小三成績已接近全港水平。小六成績亦理想，中文及英文科更高於全港平均成績。在 2012-13 學年，該校率先全港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2015 年一直帶領學校渡過多重難關的梁紀昌校長退休，施志勁接任校長，仍承襲梁校長以人為本、重視身教、建立自信、啟迪目標等作風。「誓要令『草根』學童也有出頭天，不單成為社會的『正資產』，甚至將來能『十倍奉還』回饋社會。」⁴²

梁紀昌和施志勁校長致力為他們學校的學生灌輸積極的人生觀。元朗元岡幼稚園校長呂麗紅接受低至 4500 元的月薪，只因希望基層學生可上學。為了減輕他們的負擔，她親自物色舊校服和舊皮鞋，並盡量減低學費和茶點費，甚至以她微薄的薪金補貼基層學生的費用。犧牲個人高薪厚職一心去協助貧窮學生的，還有陳蕊，當時才 41 歲的他毅然辭去直資中學校長，於 2009 年開辦免費補習服務，目的只是讓貧窮兒童可以追得上艱深的功課。難得的是他得到太太的支持和諒解，自己靠寫專欄和演講的收入僅得每月 8 千元左右。一家五口開支主要由任職公務員的太太擔起。2011 年陳蕊更成立了「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並成功申請為非牟利慈善機構。補習天地大規模招募義工老師，為有經濟困難的弱勢學童提供完全免費的學習支援，服務範圍包括：一對一補習、學前遊

⁴² 〈基層名校「鮮魚行」 草根學童也有出頭天〉，信報通識，刊於 2015 年 09 月 17 日，<http://iknow.hkej.com/php/article.detail.php?aid=16953>

戲學習班、小組學術班、才藝課程（樂器班、攝影班、美術畫班等）、課外活動（戶外參觀、親子工作坊、英語夏令營等），讓清貧學子有發揮潛能的機會。民間自發的扶助弱勢社群活動除扶助弱勢社群外，對提高社會凝聚力幫助很大，對香港整體長遠競爭力幫助也很大。

4 市民對職業教育的偏見

長期以來，香港學生和家長都視職業教育為畏途。小學畢業後，升讀文法中學，繼而升讀大學，好像是理所當然唯一能踏上青雲路的選擇。以前的工業中學早已變得不合時宜並已淘汰。然而，並非所有人都適合讀文法中學和大學的課程。今天能上大學的，不少其實更能受惠於職業培訓。這不是說他們低別人一等，而是要指出職訓被視作次等本身就是文化偏見。香港要增強競爭力，首先就要人盡其才。即是說每一個人都應發揮其長處和潛能。為了要改變這文化偏見，政府早於 2008 年推出了共分作七級的資力架構，推動學術、職業訓練和持續教育的互通。但光靠制度的安排，恐怕不足以改變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見。職訓的內容有必要滲入人文教育的內涵；職訓的宣傳亦有必要調整，務必使大家了解：高質素的職訓不但為年輕人提供美好的前景，亦可提升個人素質、尊嚴和社會地位。

5 包容與撕裂的對壘

近年來香港包容異見的文化漸見減退，代之而興的是對抗和撕裂。雖然直接肇因似是政改的爭議和對民主訴求的興起，有被訪的文化界人士卻認為這或與社會的貧富懸殊、機會不均有關。觀乎近年的確有仇富的跡象，而且社會上很多論述都用上了權貴這個名詞，好像階級對立就是今日香港的主要矛盾，貧富懸殊和機會不均真的不容輕視。2015 年 *Psychological Science* 的一篇專論(Oishi, S., & Kesebir, S. (2015))在分析多國數據後，發現收

入不均會導致人民幸福感下降，以致足以完全抵消了因經濟增長收入增加的幸福提升。作者以此解釋由 Richard Easterlin 提出的所謂 Easterlin Paradox。⁴³

英國智庫Equality Trust的發起人Richard Wilkinson和Kate Pickett寫了一本題為*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的書，直指過度的收入不均不單損害社會賴以維繫群體整全的互信，還會破壞個人的心理健康、扭曲人性。財富多少直接影響權力分布、社會地位，以及擁有的是優越感還是自卑感。處於社會階梯上端的，會更傾向以不道德不光彩的手法維護自己優越的地位；處於社會階梯下端的則蒙受巨大的壓力，有人會因此患上抑鬱症(depression)或躁鬱症(bipolar disorder)、有人更會變得反社會，變成社會的計時炸彈。過度的收入不均其實對不同階層的人都造成傷害；紓緩過度的收入不均可以惠及所有人。Hochman and Rodgers(1969)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一篇文章就提出：再分配政策不一定會損害被拿走財富者的利益；被拿走財富者其實也可能受惠於心中的更富有和社會的更穩定。⁴⁴

對意見不同的人產生敵意，當然不能全歸咎收入不均或社會向上流動性不足。欠缺包容可以源自各人自己狹隘的心胸，而這種心態在資源短缺時則更易變得極端；若本身心胸狹隘，在社交媒體或其所屬群互動間，更會互相強化，逐漸形成偏激的敵我意識。在發達國家中，主流社會中有人會歧視一些經濟條件往往不好的少數族裔。這顯然不是向上流動性不足所造成的。本來，意見相同的人走在一起，意見不同的人互相排斥，原是十分自然的事。但風氣一旦形成就很難打破，並會拖社會健康發展的後腿。有研究更發現：政見強烈的人往往會對人家擺事實講道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謬誤之處若遇上別人拿

⁴³ Oishi, S., & Kesebir, S. (2015). Income Inequality Explains Why Economic Growth Does Not Always Translate to an Increase in Happiness.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10.1177/0956797615596713

Easterlin Paradox 乃指以切面數據分析通常幸福感與收入有正相關；但以時序數據分析卻往往見不到收入增加會提高幸福感。

⁴⁴ Hochman, Harold M., and James D. Rodgers (1969) "Pareto Optimal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4, September): 542-557

事實拿數據道破，自己不但不會把謬誤矯正過來，還可能會走得更極端。⁴⁵ 可見*包容的胸襟和價值必須自小培養*。對成見已深的人宣傳和教育都不易生效。

6 抗爭文化的濫觴對競爭力的影響

上面談到社會撕裂的現象或與社會貧富懸殊、機會不均有關。反映貧富懸殊、一個很突出、很尖銳並造成年青人不滿情緒高漲的問題是樓價高企使買樓人士「慘變樓奴」的情況。年青人不滿地產商賺大錢，對收貴租的業主階層也有怨氣；他們不能理解為何每年收取以億元計股息可以不用交入息稅。這股怨氣造成抗爭文化濫觴的推動力，間接促成了 2014 年的佔領運動，最後打擊了香港的競爭力。這個對這些社會現象不滿的群體在網上互吐心聲，形成堅牢的反建制力量。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興起一方面為年青人帶來資訊爆炸，一方面亦為他們帶來更大的朋輩壓力。大量資訊唾手可得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壞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同時提供正確和錯誤的資訊，上網者不容易分清楚。互聯網、網媒和社交媒體雖然同時提供不同的觀點，最具影響力的卻往往不是最細緻最精闢的分析，反而是最不須動腦筋、最煽情、罵人最狠毒的論述。前者不容易大量被人分享；後者剛好相反，輕易吸引大量分享和大批讀者。近年本港大力推廣通識教育，英語 *Critical Thinking* 被翻譯成批判性思考；批判性思考又往往被理解為向別人的論述持批判態度，而竟忽略了對自己的論述嚴謹分析、謙卑求證的要求。由於慎思明辨費力，情緒發洩容易，「冷分析」在社交媒體和網媒很容易被「熱議論」比了下去。近年流行的自以為是的文化一定程度與社交媒體的興起和慎

⁴⁵ "The psychology of changing political viewpoints" by Alan Martin. Wired Psychology Section. Published on 4th October 2013. Accessed on 6th September 2016. <http://www.wired.co.uk/news/archive/2013-10/04/changing-political-beliefs>
Nyhan, Brendan; Jason Reifler(2010) "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 *Political Behavior*, June 32: 2, pp 303-330

思明辨的教育不足有關。可幸的是最近教育局已接納 Critical Thinking 可譯為「明辨思維」，現時與「批判思維」並用，但根深蒂固的文化相信不容易改變。

是以有論者提出：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慎思明辨的能力變得非常重要⁴⁶。偏偏我們的教育制度在培養慎思明辨的能力表現有欠理想，而我們滿腔熱誠的老師自己也有人的弱點，他們當中，不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引導年青人把人簡單化地分忠奸敵我，甚至一竹篙打一船人把整個群體標籤化⁴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抗爭文化。曾發生港大校務委員會學生成員洩密事件，有大企業表示該事件使他們對實習生會否洩密表示憂慮，因此會盡量避免他們接觸敏感資料。一位多年研究企業管理的大學教授指出：這樣的抗爭文化，使 1+1 可以變成負數。「人家 1+1=3；自己 1+1=-2」。欠缺互信互助，更反過來彼此鬥爭，對競爭力的傷害可想而知。

IMD 《2014年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4) 指出 (頁490)：

「競爭力不能光以生產力或企業盈利觀之。大家心中明白：一個不能與眾分享所創財富、不能為其國民提供足夠的醫療或教育基建、或不能維持社會和政局穩定的國家，長遠而言其繁榮不可能持久。新加坡突出之處，在於它積極為人民回饋國家的經濟成就：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房屋、醫院和教育。」(“Competitiveness cannot be reduced to productivity or profits. Intuitively, everybody knows that a country that does not share the wealth it creates, that does not insure an adequate health or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for its people or that does not maintain political or social stability, will not thrive in the long term.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has always been keen to ‘give back to the people’ the tangible

⁴⁶ “Social media make critical thinking critical”, Bertrand Duperrin’s Notepad. Published on Jun 28, 2013. Accessed on 6th September 2016.
<http://www.duperrin.com/english/2013/06/28/social-media-critical-thinking/>

⁴⁷ 一個例子是把整個香港警隊描述為「黑警」，把來自內地的新移民描述為「蝗蟲」，把社會的領導層通通描述為權貴。

signs of success of the economy, in the form of better housing, hospitals, and education.”)

要疏導抗爭文化，除教育工作外，還需從制度的改革著手創建更公平的社會環境。

7 保護主義與開放主義的對壘

本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是很自然的事。工會、專業團體、僱主團體都很自然會為本會會員爭取利益。然而，為本會會員爭取利益的同時，任何關心香港前途的團體都仍應顧及社會整體的利益。

香港一般市民非常倚賴公共醫療，原因是絕大部分的受薪階級收入難以支付私家醫院和私家專科的收費。就以2014年第三季的統計資料計⁴⁸，九成打工仔收入在\$37,600以下。但市民湧向公立醫院和公立專科醫療服務，公立醫院和公立專科醫療人手出現不足，輪候時間偏長的情況。很多市民為了健康著想，不得不光顧私家醫院和私家專科。私家醫院和私家專科面對需求上升，便向公營醫療服務挖角。由於人口上升、加上人口老化，公營醫療服務早已面對巨大壓力。然而香港醫療系統保護主義嚴重，現時比港英時代更甚。⁴⁹ 雷鼎鳴教授指出⁵⁰：「香港的註冊西醫有約1.2萬人，每千人口有1.8位醫生...英國有2.8人，美國是3.2人，日本是2.3人，新加坡是2.8人。幸好香港也有六千多註冊中醫，問題才舒緩一點。但可勿忘記，現時香港65歲以上人口共約100萬，到2042年便要達近260萬，對醫生的需求可能要以倍數增長。對病床的需求當然也會上升。」面對嚴重人

⁴⁸ 統計署《2014 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

⁴⁹ 這是非常普遍的印象。很多市民甚至醫生都有同感。後者多指執業試特別難考。但香港醫學會會長史泰祖醫生並不認同。他指出任何地方都有必要審核所有外來有意行醫者的資格。而 28 個醫務委員會的成員，一半由政府（包括兩家醫學院、專科學院和醫管局等提名）委任；只有七名是醫學會的代表，另七名則是由註冊西醫相互選出。此外，史醫生也指出香港近年已大幅增加兩家醫學院的醫生學額和各院校的護士學額，未來本地培訓的醫生和護士的數目都會上升。加上香港地狹人稠，比地大人稀的地方，醫生對人口的比例可以較低。

⁴³ 雷鼎鳴：〈醫療改革〉，《晴報》，刊於 2015 年 4 月 10 日

http://francis-lui.blogspot.hk/2015/04/blog-post_11.html

手短缺，本應放下保護主義，先行解決市民性命攸關的醫護人手問題，才再考慮自己的經濟利益⁵¹。如果新加坡能積極引入外地專才，為何香港不能？香港在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6 就醫療與環境的排名僅得全球第十七位。至於其他專業，像法律、會計或工程，保護主義並不明顯，但有意見認為香港訴訟費較為高昂。訴訟費用乃保證商業活動按合約進行的支出。高昂的訴訟費會打擊一個地區的競爭力，值得注意。

8 工作和商業倫理

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商業糾紛和勞資糾紛都難免時有發生；違反商業倫理的個案亦不時會出現。比較常見的是有僱主以破產為名拖欠員工薪金，實質易名經營；金融海嘯前很多金融機構出售雷曼兄弟迷你債券和其他誤導名稱的金融產品；近年又出現圍標事件；商業詐騙個案亦偶有發生。

然而，互信乃商業社會賴以成功的基石。而互信的基礎則是工作倫理和商業倫理。香港在工作和商業倫理方面表現優秀，勞資雙方通常都靠對話解決分歧。罷工、怠工、按章工作等工業行動比很多國家都少 (表 3.2)。

⁵¹ 讀者亦可參考 C.K. Yeung (2013) Government must break Hong Kong doctors' protectionist barrier, SCMP, published on 16 December 2013. <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1379814/government-must-break-hong-kong-doctors-protectionist>

C.K. Yeung 認為招攬外來醫療人才是解決公立醫院人手短缺最有效的辦法。

表 3.2 : 2010 年至 2014 年選定國家每千名僱員因罷工及閉廠所損失的工作日數

國家/地區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澳洲	N/A	N/A	N/A	12.8	N/A
奧地利	N/A	16.6	375.3	592.7	N/A
加拿大	84.2	86.7	57.3	100.2	113.6
丹麥	N/A	1142.7	1187.6	16230.2	1591.9
芬蘭	N/A	664.3	116.1	211.1	N/A
法國	318.5	N/A	N/A	N/A	N/A
德國	0.7	6.2	3.9	2.2	N/A
香港	0.1	0.2	0.1	4.2	N/A
以色列	65.9	209.2	157.9	17.3	33.3
日本	1093.2	508.8	310.6	N/A	N/A
南韓	30.2	24.7	52.7	35.1	34.8
波蘭	1.5	2.7	1.3	346.2	N/A
西班牙	36.4	26.8	74.7	65.6	N/A
瑞典	N/A	0	8.9	1.7	0.8
瑞士	0.6	2817.3	950.5	13371.9	1
英國	14	52	9	17	27

N/A: 沒有相關數字

資料來源: ILO, ILOSTAT Database, “Strikes and lockouts-Rate of days not worked due to strikes and lockouts”

然而，企業表現愈優秀，勞方往往就會覺得資方有能力提供更優厚的條件。這種盼望雖然或對管理優異、表現突出的企業不太公道，卻也可能有其合理之處，原因是企業若表現優秀，勞方也有一定的貢獻，有貢獻也就值得嘉獎。中原地產的施永青就建議新增盈利可分作三份，其一給勞方作獎勵；其二給股東作回報；其三留在公司供發展之用。⁵² 這個所謂「三三制」未必為多數企業家認同，但它的精神亦確有可取之處，值得參考，亦

⁵² 「施永青先生〈公司法為萬惡根源？利潤三三制〉：《21 世紀資本論》系列」YouTube – goo class. 上載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cwJE2B6GtY>

可作適度調節。譬如由於不同行業勞動力、股東投入、發展需要、競爭程度等各有不同，企業可對三個份額的比例作相應的調整。無論如何，勞工能分享企業成果不但可以激勵員工士氣，創造更和諧的勞資關係和社會，還可視作企業社會責任的彰顯。

關於工作倫理方面，不少僱主、乃至一位大學教授，都關注到部分員工欠責任感的情況。一些員工可以不守承諾、隨時「玩失蹤」、稱會到職但臨時不出現。又有部分員工欠缺虛心反省的態度。這種欠缺承擔的文化，長遠而言足以損害香港的競爭力。⁵³

談到企業社會責任，不得不談商業倫理和企業文化對建立品牌聲譽的重要性。內地消費者經歷過奶粉成份發現有三聚氰胺毒害嬰幼兒事件、黑心麵粉、假雞蛋、假酒等食品安全事件，對大陸生產甚至出售的食品信心大降，紛紛來港購物，大大影響了大陸品牌產品的銷情。2015年，福士柴油車廢氣排放造假事件曝光後，不但要回收補救，還要面對索償和巨額罰款、品牌受損等惡果，亦可能拖累德國其它品牌。可見打造香港品牌須長年累月堅守商業倫理的規範。個別害群之馬殺雞取卵的短視行為，如中藥材一般以兩算的價格實為以錢算、又或以假貨騙人，最終害人害己，堪稱是長遠競爭力的殺手，愛護香港的人都應警惕，當局亦應加強監管和教育。

9 法治和秩序

香港自回歸以來仍沿用英治時期的普通法傳統。1990年4月4日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乃至2014年6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都申明或重申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獨立和採用英國傳統的普通法維護法紀、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和基本人權；而且除了外交等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範圍外，終審權由設在香港的

⁵³ 2015年匯賢智庫僱主問卷調查發現近年年青僱員未能秉持謙虛自強、勇於改過的態度；責任感明顯下降。具體情況可參看附錄。

終審庭負責。縱觀全球的金融中心，排名領先的絕大部分都是行普通法的地區。⁵⁴制度以外，香港亦承襲了深厚的法治文化。2008年一批關心全球管治質素的人士推出「世界公義研究計劃」(World Justice Project, WJP)，2011年WJP首次把香港納入評估。當時報告指出香港在八項指標的其中三項在全球66個地區／國家列首五位之內。在安全與秩序一項更列首位，而2015年則列全球第七位⁵⁵。2015年度世界公義研究計劃中，香港的整體法治指數列於全球第十七，高於美國的第二十九但低於新加坡的第九。

10 對永續發展的啟蒙

香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港督麥理浩推出郊野公園條例，為郊野保育做了好的開始，但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人其實仍普遍缺乏保育和永續發展的意識。尤其六、七十年代經濟發展迅速，很多極有歷史和象徵意義的建築物都給拆毀，藉以騰出建樓和建設施的空間，民間很少會發出反對聲音。

就保育和永續發展的議題而言，1976是別具意義的一年。是年香港政府制定《郊野公園條例》；古物及古蹟條例亦於同年實施。然而，香港還要多等十年，即1986年，環境保護署才成立。至於環保局，更要待特區政府成立後十年即2007年才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分拆出來成為獨立的決策局之一。

香港人對歷史建築的關注可說是2000年後的事。這個遲來的覺醒可從皇后碼頭事件窺探來龍去脈。因應中環填海計劃，政府本來決定於2006年11月新中環碼頭啟用後一起

⁵⁴ 繼深圳市公布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將採用港式陪審團制度後，2015年初，阿布扎比公布其金融自由區將採用英國傳統的普通法，以加強其發展金融市場的競爭力。

見〈哈薩克：現代絲綢之路的合作夥伴〉，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2016年01月26日，
<http://beltandroad.hktdc.com/tc/market-analyses/details.aspx?ID=473074>

⁵⁵ 按 The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報告，2012-2014年香港在安全與治安方面在全球142國家或地區中都排名首位。但2016年的排名卻跌至第11位。

[http://www.police.gov.hk/info/doc/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e.pdf](http://www.police.gov.hk/info/doc/Legatum_Prosperty_Index_e.pdf)

[http://www.prosperity.com/application/files/9214/7808/9761/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2016.pdf](http://www.prosperity.com/application/files/9214/7808/9761/Legatum_Prosperty_Index_2016.pdf)

清拆皇后碼頭和天星碼頭，而早年諮詢市民之時，並沒有人表示反對，因此政府打算清拆後只保留皇后碼頭的牌匾。但香港人的保育意識隨保護海港協會反對維多利亞港填海工程而孕育。在強大壓力下時任特首的曾蔭權表示改變初衷，聲稱考慮保留組件，但香港民間團體仍不滿，認為拆卸搬遷等同破壞。有人甚至絕食抗議。最後政府和四個民間團體（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工程界社促會及長春社）達成共識，接納原址修復的方案。方案下皇后碼頭將切割成幾部分並暫時移走，待填海完成後，才在原址或附近復建。最終，皇后碼頭清拆並被切割儲存。差不多同時，2006年亦出現爭取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事件。按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48年歷史的舊中環天星碼頭及中環天星碼頭鐘樓會拆卸以供作道路和商廈用途，惹來香港部分民間團體和市民不滿。事件演變為警民衝突和兩次佔領行動。最後鐘樓被拆毀且被砸碎，但英國專家檢查仍保留下來的機械鐘，認為其組件99.9%狀況良好，遺失零件也可以再造，他日可以重新組裝，另建新鐘樓後機械鐘可裝上繼續運作。

兩事件影響深遠。皇后碼頭事件過程中，16個民間團體聯署要求香港政府採用2000年中國實行的《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其中包括：

- 必須原址保護。只有在發生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或因國家重大建設工程的需要，使遷移保護成為唯一有效的手段時，才可以原狀遷移，易地保護；
- 盡可能減少干預。凡是近期沒有重大危險的部分，除日常保養以外不應進行更多的干預。必須干預時，附加的手段只用在最必要部分，並減少到最低限度；
- 保護現存實物原狀與歷史信息。修復應當以現存的有價值的實物為主要依據，並必須保存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遺留的痕跡；
- 必須保護文物環境。與文物古蹟價值關聯的自然和人文景觀構成文物古蹟的

環境，應當與文物古蹟統一進行保護。

永續發展的啟蒙孕育了肯為永續發展犧牲經濟增長的思維。回顧兩樁事件，政府其實毋須太過強硬。譬如鐘樓既已被拆卸，根本沒有必要再把它砸碎。如果保留真的有技術問題，讓市民見到政府有盡力，也會贏得市民的稱譽，起碼不會擴大彼此的鴻溝。

市民對保育需要的覺醒本是好事。然而，大家在保育過程中仍須惦記社會各階層的基本需要，社會在保育和發展之間要尋找最佳的均衡點，而對比社會成本與社會效益是關鍵。永續發展不是說佔四成土地的郊野公園永遠也不能碰。面對環球競爭熾烈競爭力不進則退，而眾多人居環境仍亟待改善的局面，社會需要正視如何取捨。

11 尋租文化和以惡利己

在民主社會，爭取惠及自己的政策（尋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美國，2014 年商界花在游說政客的錢估計達 32 億四千萬美元。其中光是醫療衛生相關行業就花了 4 億 8 千 500 萬⁵⁶。香港稅制簡單，爭取向個別行業傾斜的稅務安排空間不大。但是在其它方面，特別是土地利用，過往多宗私人協約方式批地的個案就惹來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疑慮。政府文件指出：有時政策局及部門基於個別政策考慮會提出以私人協約直接批地。這些建議都會交行政會議審核。批准與否則會考慮建議是否符合政府的既定政策；會否有助達到既定的政策目標、帶來的經濟或其他效益；是否具策略重要性、時機是否適當；以及申請人是否具備落實有關建議的財力等⁵⁷。但由於欠缺透明度，這類批地，乃至被視為偏離既定準則的改變土地用途，都容易惹來官商勾結的指摘。2013 年港府容許九

⁵⁶ Statista, Total lobbying expen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4

<http://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57368/total-lobbying-expenses-in-the-us-by-sector/>

⁵⁷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資料文件 CB(1)1100/10-11(03)〈私人協約批地的政策及有關事宜〉，2011 年 1 月 25 日，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0125cb1-1100-3-c.pdf>

巴將八個建於「私家地」的車廠，其中包括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的土地，改作房地產發展，同時又以短期租約出租 12 幅政府地，供九巴重置車廠，就曾惹來利益輸送的疑慮。2015 年拍板，由政府及新世界發展合作的尖沙咀活化海濱計劃，由於未經公開招標，項目雖屬非牟利，仍因可能帶來人流造成界外利益而被指利益輸送，而最後康文署在輿論壓力下被迫取消與新世界簽署管理委託協議。這些本可避免的質疑對政府的形象和市民對政府的信任造成傷害，可能打擊政府施政。

香港人對官商勾結非常敏感。這使一眾決策者紛紛為避嫌而不敢提出對個別行業有利的政策。有被訪的商界人士表示：政府對推廣香港品牌可以更積極一點。當自己建立的品牌在頂尖的國際展覽已敲響了名堂，邀請政府官員出席推廣活動，政府官員反應冷淡，他覺得十分失望。其實，只要先制定公平公開透明合理的程序然後堅守程序，官商勾結的指控自然不攻自破，官員毋須太過擔心。相反，偏離一向沿用的程序，又或程序不公開不透明，就很容易惹來質疑。縱使官員自己覺得光明磊落，如果因做法偏離一向沿用的程序而惹來爭議，就非常不值得。

香港人對官商勾結非常敏感，或與尋租行為非常普遍有一點關係。當「搵著數」已成為風氣，大家就容易猜測別人在「搵著數」。擔心官商勾結「搵著數」十分自然。當政府愈向惡人讓步，更多人就愈會選擇以惡謀私，結果是政府愈變得弱勢。尋租行為愈普遍，大家就愈容易覺得官商勾結。市民和政府之間愈缺乏互信，施政就愈困難。

12 本土力量和去中國化

近年崛起的本土主義和其倡議者推動的去中國化可以說是香港長遠競爭力最大的威脅。這些本土派人士倡議的不僅是本土為先，還要反對中港融合，小部分甚至倡議脫離中國而獨立成國。

打從英治的 1950 年代開始，生於香港的企業家馬文輝三十多年來一直推廣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提出要建立一個屬於港人的自治政體，並創立了聯合國香港協會與香港民主自治黨。但當時中國未推行改革開放，亦未有一國兩制，在殖民地時代萌生這些思想不難理解。在回歸後倡議本土思想，兼且更推動本土自決，反對中港融合的，直至 2000 年都很少聽聞。2011 年「香港城邦論」出版，作者陳雲認為香港人毋須理會國內民主改革的步伐，並只須專注為港人謀福祉。他主張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應不惜抗爭以爭取自治，在不脫離中國的大前提下建構民主香港。然而，本土派反對中港融合、指控中央干預、放大國內同胞的缺點，都只會激化中港矛盾，最終損害香港的根本利益。本土派人士中不少以反共和去中國化為口號，殊不知這樣對於香港的民生和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影響至鉅。由本土派牽頭的所謂「驅蝗行動」和「光復行動」，大大打擊了香港的形象和內地客來港旅遊的信心。2015 年大陸來港旅客減少消費下跌有很多原因，但本土派對內地到港訪客的滋擾肯定也有一定的角色。

13 務實的力量

香港過去成功的一個因素是務實打拼。英治時代，多數人每天營營役役，不會想太多：打工也好，做生意也好，都專心做好本份，靈活變通、努力打拼。正是憑著這積極的態度，回歸時香港早已成為經濟發達地區。可惜回歸後隨著政制逐步民主化，反而爭拗不斷，出現內耗。

然而，最近的一個民調⁵⁸(表 3.3)，竟然發現自稱傾向中間派比自稱傾向民主派和自稱傾向建制派都多出一大截。這結果自然使人欣喜。我們熟悉的香港就是務實不偏激。然而平時務實不偏激的人，在別人和氣氛影響下也可能因情緒變化一時間變得較偏激。控制這些情緒要靠理性思考和定力，而這些都是要培養的。

⁵⁸ 〈湯家驊：香港政治文化轉捩點〉，明報觀點版，刊於 2015 年 10 月 27 日
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51027/s00012/1445882171545

民主思路的湯家驊樂觀地指民調或預示香港政治文化的轉捩點。但少數人的言行仍可以假傳媒的力量擴大影響力，刺激沉默中間派人士的情緒。香港要提升競爭力，就必須回歸理性務實，回歸互相尊重的政治文化。雙方激鬥只會傷害香港。79 日的佔領所造成的破壞，極須有承擔的政治領袖以他們的政治能耐帶領走偏的群眾，回歸理性務實。

表.3.3：自稱傾向中間派的市民佔較多

被訪者眼中中間派的作用		全部答案百分比	樣本百分比
推動互相尊重的政治文化		19.5	59.6
避免社會撕裂		17.5	53.6
與中央溝通		16.9	51.7
推動民主發展		15.0	45.8
落實一國兩制		14.7	45.0
平衡激進勢力		13.3	40.6
被訪者的政治傾向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學或以上
傾向民主派	21	26	39
傾向建制派	16	12	7
傾向中間派	36	43	45

資料來源：民主思路 (2015)

14 國際網絡、軟能力和語文能力

香港可能是擁有全球最強國際網絡的城市。2013 年安永發表了一個全球化指數報告，香港連續第三年取得桂冠地位，在 60 個地區／國家排名首位。⁵⁹ 然而，不知道什麼原因，香港沒有列於較近年發表的 KOF Index of Globalization 2016。⁶⁰

香港人移民外國歷史久遠，遍及全球每個角落。1997 年香港回歸後，眼見社會穩定，自由不減，不少移民從外國回流香港。這些回流人士多持外國護照，並有堅實的國際網絡。作為一個七百餘萬居民的城市，2014 年的外資流入竟達 1032.5 億美元，居然明顯超過美國的 932 億，僅亞於中國大陸的 1285 億而位於全球第二 (表 3.5)。這數字相比 1997 年近 114 億的外資流入額翻了九倍(表 3.6)。以總存量計，香港 2014 年底外資流入累積達 16860 億美元⁶¹，數字居美國(28000 億)和英國之後但高於大陸的一萬三千四百餘億。2014 年新加坡外資流入量僅得 675 億。據 CIA Fact Book 所載，新加坡 2014 年的外資存量为 9124 億。同年香港向外投資流量更達 1427 億，僅次於美國而居世界第二。⁶²(表 3.4) 這數字壓倒大陸的 1160 億和日本的 1136 億，更大幅高於新加坡的 406 億和南韓的 306 億。台灣的外向投資更僅得 127 億。

⁵⁹ “Hong Kong secures No.1 ranking in Globalization Index for third consecutive year”,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報告指香港在訊息和技術交流上大幅領先其他市場。

<http://www.ey.com/CN/en/Newsroom/News-releases/2013-Hong-Kong-leads-Globalization-Index>

⁶⁰ 奇怪的是澳門竟在被評之列。

⁶¹ 香港統計處估計 2014 年底以市值計算的外來直接投資頭寸為 90181 億港元。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400032014AN14B0100.pdf> 約兌 11636 億美元。但因其它地區引用 CIA 估算，為比較這裏統一引用 CIA 估計的數字。

⁶² 不排除部分本港向外投資的資金來源是大陸，但仍反映香港國際網絡的強大。

表 3.4 不同經濟體向外的直接投資流量，按年度計，2000-2014，單位為百萬美元，換算按當時市場匯率和價格計

年度	2000	2001	2005	2010	2013	2014	2014 年 排名	2014 相對 2000 數字的倍數
中國	915.8	6885.4	12261.3	68811	101000	116,000	3	126.7
香港	54078.8	18055.3	27003.1	86247.2	80773.1	142,700	2	2.6
台灣	6701	5480	6028	11574	14285	12,697	22	1.9
德國	56557.1	39889.6	74542.4	125450.8	30109.2	112227	5	2.0
日本	31557.4	38332.9	45781.3	56263.4	135748.8	113628.8	4	3.6
南韓	4842.1	2743.5	8330	28279.9	28359.8	30558	14	6.3
新加坡	6650.27	20027	11588.3	33377.4	28813.9	40,660	11	6.1
美國	142626	124873	15369	277779	328343	336,943	1	2.4

資料來源: UNCTAD STAT

表 3.5 不同經濟體的外來直接投資流量，按年度計，2000-2014，單位為百萬美元，換算按當時市場匯率和價格計

	2000	2001	200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4 年 排名	2014 相對 2000 數 字的倍 數
中國	40714.8	46878	72406	114734	123985	121,080	123911	128500	1	3.16
香港	54581.9	29061	34058	70541	96581	70180	74294	103254	2	1.89
台灣	4928.0	4109	1625	2492	-1957	3207	3598	2839	62	0.58
德國	198276.5	26402	47449	65642	67515	20316	18193	1831	76	0.01
日本	8322.7	6242	2776	-1252	-1758	1732	2304	2090	73	0.25
南韓	11509.4	6522	13643	9497	9773	9496	12767	9898	29	0.86
新加坡	15515.3	17007	18090	55076	48002	56659	64793	67523	5	4.35
美國	314007.0	159461	104773	198049	229862	169680	230768	92397	3	0.29

資料來源: UNCTAD STAT

表 3.6. 1990-2014 年外資流入一覽表 (百萬美元)

區域/經濟體	1990	1994	1997	2014	2014 比對 1997 的倍 數
發達經濟	170 203.0	150 584.1	285 701.7	498 761.7	1.7
歐洲(含歐盟及歐洲其他發達國家)	102 666.4	88 542.2	155 848.9	288 765.9	1.9
北美(含加拿大和美國)	56 004.3	53 299.1	114 923.2	146 261.0	1.3
其他發達經濟區(含澳洲以色列日本)	11 532.3	8 742.8	14 929.6	63 734.9	4.3
發展中經濟	34 622.0	102 387.6	185 721.6	681 386.7	3.7
亞洲	22 907.5	68 444.7	108 594.6	465 285.2	4.3
東亞	9 077.5	1 4415.8	62 509.0	248 179.6	4.0
中國	3 487.1	33 766.5	45 257.0	128 500.0	2.8
中國香港	3 275.1	7 827.9	11 368.1	103 254.2	9.1
韓國	1 045.6	1 136.6	3 301.1	9 898.5	3.0
中國澳門	0.5	3.5	2.3	3 046.1	1318.6
台灣	1 330.0	1 375.0	2 248.0	2 839.0	1.3
東南亞	12 820.8	20 495.9	35 939.7	132 867.2	3.7
新加坡	5 574.7	8 550.2	15 701.7	67 523.0	4.3

資料來源: UNCTAD, FDI/TNC database (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非洲、南亞、西亞、拉丁美洲及加勒比、過渡中經濟體等從略。

香港的營商環境和宜居度都名列世界榜首。一方面吸引跨國企業來港設地區總部(表 3.7)；一方面也吸引了不少外國人來港定居。但年青人的軟能力和語文能力都有必要大大加強。所謂軟能力(soft skills)，乃泛指社交能力、與人溝通、贏取別人信任的能力、組織能力、領導能力、團隊精神、靈活性、責任感等等，一切非關乎個別職業的技術性的能力。在跟各界的訪談中，不少僱主說香港人在技術或技能上並不遜色，而且不乏創意，但在責任感和自發性等軟能力方面卻往往使人失望。又有受訪者指出：雖然佔中好像搞得有聲

有色，但其實亦見到搞社運的學生領袖之間往往各自堅持己見，他們跟佔中三子亦欠默契。如果沒有團隊精神，經常自以為是；有創意卻把創意用於非建設性的事情上，香港的新一代將會很難跟別人競爭。

然而，近年香港出現了英語能力下降的現象。作為國際城市，英語能力下降若成為普遍現象可以對競爭力造成嚴重的破壞。在研究團隊多次跟商界的訪談中，很多僱主都對這個問題表示關切。由於大學學額於 80、90 年代大幅增加，畢業生平均英語能力下降本來並不使人感到意外，但相比新加坡的舉國均能操流利英語，香港在語文方面的相對劣勢在競爭日益熾烈的今天，實在值得關注。一家顧問公司 Education First 就搜集了香港英語水平倒退的慘況。(表 3.8) 然而，不少被訪的商界和專業人士並不相信香港人的英語水平低於日本人或台灣人，認為 Education First 的評分方法有重大缺點，作參考無妨，但不同地區的結果尤其難以比較，並不足信。

表 3.7：設在香港的地區總部按母公司所屬國家數字一覽表

年份	總數	美國	日本	中國大陸	英聯邦	德國	法國	瑞士	其他
2011	1340	315	222	97	117	84	63	39	403
2012	1367	333	219	106	122	86	62	41	398
2013	1379	316	245	114	126	81	66	43	388
2014	1389	310	240	119	120	91	68	45	396
2015	1401	307	238	133	126	87	67	43	400

註：數字基於每年六月首個工作日。

資料來源：統計處

表 3.8: Education First, 各地平均英語能力評分

	2011(2007-2009) (第一版)	2013(2012) (第三版)	2015(2014) (第五版)
香港	54.44(12/44)	53.54(22/60)	52.7(33)
新加坡*	58.65(6*/44)	58.92(12/60)	61.08(12)
台灣	48.93(25/44)	50.95(33/60)	53.18(31)
日本	54.17(14/44)	53.21(26/60)	53.57(30)
中國	47.62(29/44)	50.77(34/60)	49.41(47)

註 *: 2011 年的報告未見新加坡評分。評分是 2012 出版第二版的數字。2011 年沒有新加坡的官方排名。資料來源: Education First, <http://www.ef.com.hk/epi/downloads/>

港大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5 年完成的《香港居民語言應用、語言能力及語言態度研究》顯示(表 3.9)，香港職場上須用英語的情形十分普遍。在 2000 名受訪者中，492 名既是在職而工作亦須書寫；473 名則是在職而工作亦須閱讀。表 3.10 顯示英語書寫能力在職場上比中文更重要。表 3.10 顯示：只有約 6%的受訪人自認英文書寫達到很好的水平。

表 3.9: 語文書寫能力在職場上的應用

書寫語文	內部需要	向外需要	閱讀需要
繁體中文	65.4%	70.0%	77.8%
簡體中文	11.2%	15.9%	20.7%
英語	85.8%	85.5%	86.9%
其他歐洲語	0.0%	0.2%	0.8%
其他亞洲語	0.4%	0.5%	1.1%

資料來源: Language Use, Proficiency, and Attitudes in Hong Kong, HKU 2015, Table 3.2

http://www.ssrc.hku.hk/files/language_2/HK_lg_survey_Final.pdf

表3.10: 自己聲稱的語文能力

水平	廣東話	普通話	口講英語	書寫繁體 中文	書寫簡體 中文	書寫英語
完全不懂	0.2	10.6	20.8	4.1	25.3	22.4
幾句	0.6	12.6	12.5	2.7	10.7	9.8
少少	7.1	31.1	25.1	14.8	32.4	21.9
幾好	26.7	26.8	24.7	28.2	18.2	25.4
良好	19.4	12.6	12.7	21.1	8.1	14.4
很好	46.0	6.3	4.2	29.0	5.3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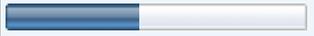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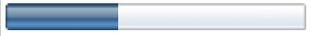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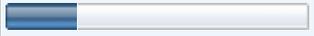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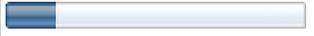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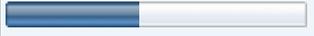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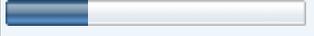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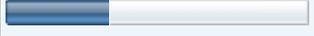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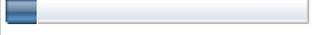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 Language Use, Proficiency, and Attitudes in Hong Kong, HKU 2015, Table 3.3

15 總結

一個城市的競爭力，有非自身力量可以改變的因素，也有自身力量可以改變的因素。前者既然不能改變，並不是競爭力政策的範圍；後者則是競爭力政策的核心。而民間因素正正是提升城市的競爭力的關鍵。但民間因素的正面效果能否充分發揮，卻又要看政府能否借力於制度和政策。如果政府能在教育和文化政策上下功夫提升公民素質，在制度上建立市民對政府的信任，並培養市民之間的互信，就等同推動社會資本的累積，建構香港的競爭力。反過來，如果官民之間、乃至民民之間都存在隔閡，那麼 $1+1=3$ 的所謂相得益彰的格局就不可能出現，反而可能陷入 $1+1=-1$ 的內耗窘境，競爭力就無法建立起來。

附表一覽

1. 僱主認為新聘僱員近年變差的地方

選項	小計	比例
語文	17	 58.62%
社交和溝通	13	 44.83%
組織能力	11	 37.93%
對本行的認識和技能	7	 24.14%
創意	5	 17.24%
紀律	13	 44.83%
未能秉持謙虛自強、勇於改過的態度	15	 51.72%
未能秉持勤奮好學的態度	8	 27.59%
欠缺責任感	14	 48.28%
欠缺團隊精神	10	 34.48%
其他	3	 10.34%
本題有效填寫人次	29	

來源: 2015 年匯賢智庫僱主問卷調查

2. 能說最少兩種語言人口百分比

2001 年, 2006 年及 2011 年按能說語言數目劃分的人口及人口(外籍家庭傭工除外)

年份	2001		2006		2011	
	人口	人口(外籍家庭傭工除外)	人口	人口(外籍家庭傭工除外)	人口	人口(外籍家庭傭工除外)
1	2 240 847	2 226 520	2 056 141	2 042 693	2 068 451	2 043 874
2	2 254 903	2 138 173	2 485 767	2 363 555	1 994 558	1 832 149
3	1 622 052	1 573 841	1 816 623	1 768 412	2 335 814	2 273 811
4 及以上	299 937	297 898	281 813	278 545	409 610	404 315
五歲以下或失去語言能力的人士	290 650	290 642	224 002	223 992	263 143	263 143
總計	6 708 389	6 527 074	6 864 346	6 677 197	7 071 576	6 817 292

來源: 2011 年人口普查

年份	2011		2006		2011	
	人口	人口(外籍家庭傭工除外)	人口	人口(外籍家庭傭工除外)	人口	人口(外籍家庭傭工除外)
最少兩種語言人口百分比(%)	62.3	61.4	66.8	66.05	67	66.15

來源: 2011 年人口普查

3. 香港市民無需申請簽證可往旅遊的國家

年份	2009-2010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2011	2012	2013	2014
數目	140	143	147	147	151

來源:入境事務處年報

4. 適用於香港的國際條約數目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公約數目:**253**

<http://www.doj.gov.hk/chi/laws/interlaw.html>

5. 訪港旅客數目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千人	29506	29591	36030	41921	48615	54299	60839

來源: 香港統計年刊, 表 11.2

6. 香港外來直接投資金額 (HK\$10 億)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十億元	521,9	420,7	642,5	748,2	580,8	596.1	1006.8	1402.0

來源:香港統計處, Balance of Payments Section (2)1,Table047: Direct investment (DI) statistics of Hong Kong

7. 註冊非香港公司的數目(積存數)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數字	7912	8165	8554	8848	9258	9624	10029

來源: 公司註冊處

http://www.cr.gov.hk/tc/statistics/statistics_03.htm

8. 2018-2015 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開設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及當地辦事處數目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地區總部	1298	1252	1285	1340	1367	1379	1389	1401
地區辦事處	2584	2328	2353	2412	2516	2456	2395	2397
當地辦事處	2730	2817	2923	3196	3367	3614	3801	4106
總數	6612	6397	6561	6948	7250	7449	7585	7904

資料來源：2012 及 2015 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報告表 1.1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100042012AN12B0100.pdf>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100042015AN15B0100.pdf>

9. 2018-2015 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開設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及當地辦事處數目比例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地區總部	19.6	19.6	19.6	19.3	18.9	18.5	18.3	17.7
地區辦事處	39.1	36.4	35.9	34.7	34.7	33.0	31.6	30.3
當地辦事處	41.3	44.0	44.6	46.0	46.4	48.5	50.1	51.9
總數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來源：公司註冊處

10. “一般就業政策”獲批申請數目

年份	“一般就業政策” 獲入境處簽發就業簽證/ 進入許可 統計數字
2009	20988
2010	26881
2011	30557
2012	28625
2013	28380
2014	31676

來源：

2012-2014 年數字: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50708-translate-c.pdf>

2009-2011 年數字: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fc/fc/w_q/sb-c.pdf

第四章 香港的處境：自身的強項和弱項、面對的機遇和威脅

1 前言

二十一世紀、回歸後的香港是一個既富機遇，也須面對巨大挑戰的中國城市和世界都會。

回歸後的香港，物質條件寬裕，卻由於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市場主導的分配制度，貧富不均情況嚴重。經濟雖有增長，成果的分配有利地主／業主、不利租客；有利技術高，教育水準高或條件特別優厚的人才，不利低技術、低教育水準或條件不突出的勞工；有利資本雄厚的資本家、不利小本經營的中小企。1998 年起樓價連年下跌，通縮出現，政府 2002 年起停建居屋、並暫停賣地。後期又改以勾地機制取代公開拍賣，以致房屋供應大減，樓市 2003 年起復甦後不斷狂升，租金亦因租盤同樣不足狂升，市民因而累積不滿。回歸後金融市場發展迅速，多隻紅籌股和 H 股接連上市，2007 年股市衝破三萬點，2008 年卻爆發號稱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海嘯，股市樓市顯著下跌，而不少小市民變成雷曼兄弟迷債苦主。市民對金融業大亨、地產商和大地主不滿情緒進一步積累。仇富情緒亦逐漸浮現。

由於種種原因，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信任度自回歸後一直攀升至 2008 年，其後卻戲劇性地大逆轉。市民對中央政府信任下降，多少打擊了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2012 年梁振英接替曾蔭權任特區第三位特首。由於一般認為梁振英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故梁氏甫上任即有人要求他下台。市民對政府不信任大大增加了施政的困難。

2013 年底特區政府發表《2017 年行政長官及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正式開展為期五個月的公眾諮詢。但在缺乏互信的基礎下，反而引發了部分市民倡議用抗爭甚至「佔中」的手段去爭取公民提名，最後演變成大規模的佔領行動，進一步激化了不同政見人士之間的衝突。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撕裂。社會出現內耗，79 日的佔領行動清場後，不時還有人採取所謂「鳩鳴」的流動式佔領，影響店舖營業。

但此際國際間風起雲湧，各地均因金融海嘯後復甦力弱紛紛各出奇謀挽救經濟。2012 年底安倍晉三當選日本首相，推「安倍經濟學」救市。美國和歐盟亦先後採量化寬鬆刺激經濟。新加坡亦積極以財政政策和匯率調控力保增長。香港此際捲入內耗的漩渦，對本身的長遠競爭力帶來莫大的危險。2015 年止的八個年頭有五個增長都低於 3%。香港自有統計數字以來從未經歷過這麼久的疲弱經濟表現。香港各界有必要問：香港如果無法重拾增長動力，如何可以應付人口老化的難題？我們還可能改善我們的醫療、教育、公共房屋、康文設施？競爭力絕對是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事情。本章試用 SWOT(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 和 Threats) 框架，先審視我們的強項弱項，再探討我們的機遇和面對的威脅。

2 強項 (STRENGTHS)

2.1 地理位置

香港先天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的地理位置。香港的繁榮發展與它優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香港由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組成，總面積 1,104 平方公里，僅略大於上海市的六分之一。據估計，目前已開發的土地面積超過 35% 是由填海所得。香港的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與此密不可分。利用地理空間數據庫，這地圖結合空間和時間元素，再配合歷史照片，敘述香港不斷變化的海岸線故事。從中國國內看，香港地處珠江口東側，與深圳經濟特區相連，面朝南海，背靠中國大陸廣闊腹地。在航運方面，珠江三角洲稠密的河網將黃埔港、廣州港等大港和內河港口連接成一片，航道網貫通兩廣，輻射華南。在陸運方面，廣九鐵路又將香港與我國南北交通運輸大動脈京九鐵路連載一起，溝通全國，從而使香港成為珠江內河與南海交通的咽喉，南中國的門戶。從全球看，香港又位處歐亞大陸東南部、南海與參灣海峽之交，鄰近東南亞各國，是遠東與歐洲、地中海等

地航運的必經之路，同時香港至英國倫敦、美國洛杉磯、南非開普敦和紐西蘭的威靈頓航程相當，是亞洲及世界的航道要衝。

正是憑藉其優越的地理位置，香港得以發展成為一個國際貿易港、轉口港。早在《唐書•地理志》記載了唐代聞名中外的「廣州通海夷道」，即從廣州出發，經印度洋抵達東非乃至歐洲航線。此航線經過屯門（今香港），書中說：「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一日至九洲石」。宋元時期廣州海上貿易更加興旺，香港作為廣州外港地位進一步加強，元代「屯門巡檢額管 150 人」，超過廣州地區香山、番禺、南海、新會等縣海防人數，反映香港海上交通地位。明清時期，香港作為廣州外港的地位不斷上升，故林則徐說：「而就粵省海道而論，則凡東越惠潮，北往閩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該處經過」。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閩浙總督伯燾也指出：「香港為上傳內駛必由之路，其島日紅香爐，上有營汛居民，並非偏僻小島可比」。至《南京條約》簽署前，香港已發展為一個國際性貿易港，據記載，1880 年約有中國進口貨物的 1/5，出口貨物的 1/3 是經香港轉口和分配的。到 1900 年歐美各國與中國貿易貨物已有 1/2 經香港轉運。

也正是由於背靠大陸，香港吸引大量內地資源進入港內，也進一步促進其發展，從而進一步成為地區的經貿和金融中心。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受「文革」等因素影響，大量的人才、資金和技術不斷流入香港。正是依託這些廉價的勞動力、資金和技術，香港面向西方市場發展起了以紡織、成衣、電子、玩具等輕工製造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了從以轉口貿易為主向以工業化為主的第一次經濟轉型，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一。上世紀 70 年代，香港經濟受國際石油危機的衝擊陷入蕭條，但伴隨內地 80 年代初開始改革開放，香港開始積極發揮仲介角色和把握內地持續增長的商機，大批港商將製造業轉移到內地，香港也成為中國內地輸往海外市場最大的轉口貿易市場。截至香港回歸前的 1996 年，中國內地經香港的轉口貨物為 6,840 億元，佔香港當年轉口貿易總額的 58%。

2.2 香港特別行政區及一國兩制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回歸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依據，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與政治制度 50 年不變。一國兩制給予香港最佳的發展機遇。香港一方面維持在 WTO 獨立成員和獨立關稅地區的地位，司法獨立、財政獨立、貨幣獨立，一方面卻因一國之便受惠於中國的防衛、享有龐大的市場腹地、消閒去處、政策支持，而毋須上繳任何財政收入或支付軍費。2003 年起更與內地達成「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內容更逐年深化，起碼十個補充協議涵蓋製造業和服務業多個項目。透過 CEPA 香港服務提供者可在大部分服務領域，以優惠待遇進入內地市場。貨物貿易方面，除內地禁止進口的產品外，內地同意對所有經本地生產商申請並符合雙方確定的 CEPA 原產地規則的原產香港進口貨物實施零關稅優惠。貿易投資便利化方面，雙方同意在 10 個領域上加強合作。

香港經濟經歷了多次考驗，從回歸之初的亞洲金融危機，到席捲全球的國際金融風暴，從禽流感的出現，到重創香港的非典，每當香港低迷下行之時，在一國兩制下，中央總是推出一系列挺港措施，有力地維護了香港的繁榮穩定。1997 年至 2013 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實質增長 3.4%，政府財政儲備累計增長 65.2%，外匯儲備增長 2.35 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13 年資料，按購買力平價 (PPP) 計算，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位居全球第 35 位，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位居全球第 7 位。

2.3 基礎建設和人力資本

香港目前已是全球領先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物流與航運中心。靠的除了天時地利和制度，亦有賴多年來的資本積累。這資本積累當然包括企業家的投資，但同樣重要的是卓越的基礎建設和人力資本。有了這些條件，香港在進一步吸引資金和人才便顯出巨大的優勢。本港設有八所世界級的高等學府，還有公開大學和其他私立的優秀院校，加上香港最具規模的職業專才教育機構職業訓練局和演藝學院，長期為香港培訓人才，而年青人亦往往創意無限，只要配合條件得以發揮，有能力創造奇蹟。這些優勢前數章已談不贅。

2.4 安全多元社會、資訊自由流通

香港是全球最安全的大都會之一。按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15年的安全城市指數（Safe Cities Index）排名，香港在整體指數位列全球第十一⁶³。在「個人安全」指數更是位列第六。雖然香港交通意外偏高，行人遇上交通意外的死亡率更是倒數第二，香港罪案率卻是非常低。香港人向來重視安全、重視和平。絕大多數港人都重視法治和合約精神，多文化多元價值各適其適。這對香港作為商業城市十分重要。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資訊流通。這對金融中心的角色相當重要。

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受到憲法、香港基本法以及香港本地法律的充分保障。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從憲制層面確保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香港特別行政區還通過實施《性別歧視條例》、《種族歧視條例》、《個人資料（私隱）

⁶³ 這與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2016 的排名一致。安全指數近年下跌值得關注。可參考第三章註腳 59。

條例》、《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最低工資條例》等法例，為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提供進一步保障。特別行政區政府設立平等機會委員會、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申訴專員公署、法律援助署、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法律援助服務局、婦女委員會、扶貧委員會等多個機構，協助推廣、保護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2.5 政府秉持清廉高效、民間重視商業倫理

香港自 1974 年已成立廉政公署，而清廉高效的政府一直以來讓外來的投資者放心。又由於民間普遍重視商業倫理，香港產品的質素普遍被視為有保證。這也就造就了香港作為商品質素認證中心及香港品牌作為商品質素有保證的條件。

3 弱點（WEAKNESSES）

3.1 產業結構欠多元

香港長期遭人詬病的一個問題是產業結構過度集中於地產和金融。這說法當然有點誇大。因為自始至終零售批發和進出口貿易都保持佔 GDP 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但是產業結構過於集中和愈趨集中卻是不爭的事實。香港政府早於回歸前已成立委員會去處理這個老問題。1979 年產業多元化委員會更發表了報告。可是產業多元化長期以來都只是口號而無法落實。相反，產業結構愈來愈集中於地產和金融。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香港製造業紛紛北移，2014 年製造業僅佔 GDP 的 1.3%，大大低於 2000 年的 4.8% 和 1980 年的 23.8%，而幾乎可說是微不足道。2014 年服務業則高佔 GDP 的 92.7%。一般而言，經濟愈成熟服務業比例會愈高。但不少論者認為有必要保留一定比重的製造業，以免產業過於集中，不利穩定。

3.2 語文能力不足情況普遍

作為國際商業城市和環球金融中心，從業員的中英文水準都十分重要。可惜近年香港逐漸失去這優勢。業界對此均表示憂慮。本來香港對學生有兩文三語的要求，但早年教育局既有指引頒令中小學不教文法而改以傳意式教英文，又不鼓勵背誦，結果造成中學畢業同學英文水準大幅下降。中文方面多年來因取消範文又不鼓勵背誦亦影響同學語法的運用。慶幸的是 2015 年 11 月 30 日教育局更新了高中各科的課程及評估指引。其中，中國語文科新增了 12 篇文言範文，且列明鼓勵學生背誦文言經典篇章，以提高語文能力。語文能力不足是重大弱點，有待各界認真應對克服。近年由於對大陸抗拒情緒上升，不少年輕人對簡體字和普通話都抗拒，進一步削弱了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城市和環球金融中心的優勢。

3.3 軟能力和責任感不足

不少僱主表示：近年來很多年輕人對工作乃至自己的承諾都欠缺承擔。部分人士甚至不辭而別、任意曠工遲到而又不交交代等。有年輕人見工時就顯出對工作欠缺熱誠和顯出好逸惡勞的態度。又有年輕人接受不了批評和意見。這些陋習大大影響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也影響各行各業找接班人的部署。

3.4 人口老化

政府統計處推算，由 2011 年至 2041 年這三十年間，第一個十年平均每年人口增長率 0.8%。但最後十年，平均每年人口增長率將下降至 0.4%。其中最主要原因是人口老化。期間整體人口將增加 140 萬，人口自然減少（即死亡減出生）3.8 萬，香港居民人口增長完全倚靠淨遷入人數。

在女性生育率下降的同時死亡率亦下降，以致平均預期壽命上升。在 2011 年，男性的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臨時數字）為 80.5 年，而女性的則為 86.7 年。統計處推算，在 2041 年男性的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將上升至 84.4 年，女性的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則上升至 90.8 年。六十五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推算將由 2011 年的 13% 顯著上升至 2041 年的 30%。人口老化的速度且會加快，2021 年老年人比例升至 19%；2031 年再升至 26%。老化的速度要待第三個十年才會稍為放緩。

在人口老化，而生育率下跌的大趨勢下，本港勞動人口預計在 2018 年後逐步下跌。展望未來，勞工短缺的問題加劇已成定局。由於子女少，父母都悉心栽培，勞工短缺的問題將以低技術勞工為主。其實，新加坡人口比香港的年輕，卻早已非常進取地輸入廉價外勞。在這個層面新加坡確然比我們優勝。

3.5 官僚辦事欠靈活性

香港向來享譽國際的是其靈活和開放的市場。然而，香港的官僚卻欠洞悉先機靈活應變的能力和主動出擊解決問題的魄力。香港的公務員隊伍十分能幹，大家在日常事務上都覺得運作暢順，無懈可擊。可惜我們在吸引頂尖人才和吸引外資卻無法跟新加坡比拼。據悉，新加坡可在地價、讓稅、代覓學校學位、乃至覓適當居所等提供好處和方便，藉以吸引人才或企業落戶新加坡。香港絕不會度身訂造對個別企業的優惠。香港做什麼都要公平公開公正，這本是香港的一項優點；我們亦無意在這方面仿效新加坡。但是香港官員很少會提出有創意有突破的政策，反而傾向墨守成規⁶⁴。

⁶⁴ 最近香港設計中心為高級公務員開辦了有關設計思維和創意思維的課程，希望開創新氣象。

4 機遇 (OPPORTUNITIES)

4.1 中國是唾手可得進入的、巨大的市場

中國是全世界最大而且是增長極快的消費品市場。雖然自從習近平主席致力打貪以來，奢侈品市場明顯降溫，2015 年奢侈品以外的銷售額還是明顯上升，其中尤以電子商務企業錄得的銷售額最為矚目。阿里巴巴集團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年底，中國零售交易市場的交易總額領先全球零售商。2015 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966 元，比上年名義增長 8.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7.4%。按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195 元，比上年增長 8.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6.6%；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422 元，比上年增長 8.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7.5%。2015 全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 66.4%，比上年提高 15.4 個百分點。「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暨補充協議給予香港合資格產品零關稅之便直入內地龐大和急劇發展的市場。

香港社會應該及時認識問題、全面客觀分析評估並及時調整，從國家發展大局出發，深入謀劃確定香港在新時期國家改革開放格局中的戰略定位，在參與國家建設的同時更好地分享國家發展的紅利。2015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建議》）公布。《建議》明確提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推動人民幣成為可自由使用貨幣，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等發展目標。這為香港轉型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平台與廣闊市場機遇。香港要抓住機遇，趁勢而行，聚力經濟民生，主動積極融入到「十三五」規劃的新發展中，為港人、港企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機遇。

4.2 積極回應「一帶一路」倡議，發揮好香港區位優勢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分別在訪問哈薩克和印尼時提出了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倡議，旨在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通過「互聯互通」達到共贏。2013年底，「一帶一路」的概念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上升為國家戰略。據市場機構測算，「一帶一路」兩端連接最活躍的東亞經濟圈和最發達的歐洲經濟圈，共涵蓋26個國家和地區的44億人口，將產生21萬億美元的經濟效應。並且由於「一帶一路」具有開放性，未來一旦形成虹吸效應，還可能吸引更多的國家和經濟體參與其中，進一步釋放其輻射性。「一帶一路」戰略將重點打造全球新的增長板塊，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拓寬產業投資和經貿合作水準等，在金融、貿易航運、產業轉移、服務業等多個領域將為香港提供大量的發展機遇，在以下各方面重塑香港的核心競爭力：

一是促進絲路沿線貿易發展，帶動香港經濟的轉型升級。內地改革開放後，香港在貿易形態上則由本港產品出口為主轉變為轉口貿易為主。此後，隨著內地企業逐步轉變出口方式，以及香港現代化的港口設施、自由港的便利清關、優越的地理位置等傳統優勢的不斷弱化，香港轉口貿易日益衰退，離岸貿易逐漸成為主要的貿易形態。「一帶一路」建設將增加香港貨物轉口或轉運貿易和服務輸出等機會，商貿洽談、展覽、品牌推廣等貿易支援服務也將大幅增加。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建設能夠大大地推動香港貿易轉型，解決香港高端服務業發展的市場瓶頸，為香港金融服務、貿易服務和專業服務等支柱產業向高增值環節的轉型升級提供機遇，進而推動香港從傳統國際貿易中心向現代國際貿易中心的轉型。

二是積極參與絲路沿線投資，發展香港為世界級資本運營與投資平台。「一帶一路」是國家的全球戰略，將會形成大規模投資，簽訂保護協定，建立合作機制，這樣投資風險

相對較低，效益較好。絲路沿線基建和產業投資的強勁增長，給香港帶來參與開發的機會。一方面，香港企業實力雄厚，擁有豐富的跨國投資經驗，調動籌集資金的能力強，香港企業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參與「一帶一路」投資和建設，這也將為香港資本開闢新的空間，收穫良好的回報。在基礎設施領域、能源領域、資源領域、農業領域、製造業領域等都將成為未來投資的熱點。另一方面，外來投資者將更多以香港為基地進入內地及絲路沿線其他市場，內地企業也會愈來愈多利用香港進行區內併購及投資等活動。香港一向是跨國公司在亞太地區的區域總部所在地，目前在香港運作的地區總部和辦事處約有 4000 家，其中不少是中資企業。國家大力鼓勵及推進內地企業「走出去」，並將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營造有利於中資企業的投資環境。未來將會有更多的中資企業借港出海，先到香港設立投資機構，再以香港企業身份到絲路國家投資發展。

三是為絲路沿線建設提供國際化融資服務，提升香港成為世界級金融中心。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快速、高效的金融服務，既能發揮專業能力和優勢，也能為香港經濟發展尋找到新的動力。一方面，香港可利用專業化金融服務優勢，通過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業務聯動，與不同國家、地區，不同類型客戶形成良性互動，使得香港在更廣闊的平台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香港可充分借助強大的金融資訊聚集和金融研發能力，為「一帶一路」沿線建設設計、開發匯兌、結算、融資方面的標準化的金融產品，助力「一帶一路」的金融網路構建，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多功能的服務和多方面的支援。

香港不少朋友對於特區政府積極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策略不以為然。表面上「一帶一路」策略對於一般營營役役的小市民好像沒有什麼關係。但是由於「一帶一路」策略將可重啟香港經濟發展的動力，使商界和專業人員得益，收入增加，也會帶動政府稅收讓政府得以推動各項民生事業，社會各階層包括基層市民亦能受惠。何況「一帶一路」策

略不會是單向的，也會帶動外資流入，增加港人就業機會和推高工資。因此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策略並非叫港人犧牲利益，而是利己利人的大好機會。

4.3 搭建人民幣走出去的平台，發揮好香港國際化優勢

人民幣國際化是人民幣發展乃至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應對危機政策的負外部性以及中國經濟相對實力的上升，促進大陸政府開始主動推進人民幣國際化。2009 年 7 月，首先在上海等地試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後來推廣到全國和全球。隨後人民幣跨境使用從貿易拓展到投資，再到允許外國投資者持有中國的資產，包括外國央行持有人民幣資產作為外匯儲備。2015 年 12 月 23 日，以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為標誌，預示着中國金融和資本帳戶將進一步自由化，並將對全球金融體系產生實質性影響，人民幣在國際金融投資及貿易結算方面的作用將進一步加強。

雖然人民幣在跨境貿易、投融資和資產負債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進展。但由於大陸還目前存在資本管制，金融市場還不很成熟，大陸仍需要境外形成人民幣離岸市場，創造性地利用離岸市場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香港具有金融開放、聯繫匯率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離岸市場的優勢，但與以往不同，香港已經不再是內地探索跨境人民幣業務的唯一合作夥伴，在未來多個離岸人民幣中心共存的形勢下，香港亟須思考如何抓緊時間和機遇鞏固自身目前的地位。首先，香港應通過金管局對人民幣資產的增持儲備調節機制及建立人民幣匯率期貨交易中心，將香港建成人民幣國際化的資本或財富管理中心，使香港成為防範人民幣資本外流的防火牆，或引導人民幣有序回流的資金池，以有效控制人民幣過快貶值的經濟風險。其次，從宏觀層面看，香港可以與內地合作設計相關行業規範和制度體系，支援並規範相關產品與業務的發展和創新；從微觀層面看，香港應當大力發展更深、更廣的離岸人民幣業務和相關產品，降低交易成本，發展人民幣債券二級市

場。再者，在制定促進離岸市場與在岸市場間資金流動的產品創新和服務升級的市場化政策方面，中國相對缺乏整體的經驗。為此，香港應發揮自身國際化、市場化的優勢，積極支持和鼓勵人民幣業務創新。香港重點應轉向提供多元化的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包括為人民幣加入 SDR 貨幣籃子之後引伸出來的產品，如以 SDR 計價的「木蘭債券」的包銷服務等⁶⁵，形成產品多元、有深度、有定價權的金融市場，滿足「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產生的需求，吸納離岸人民幣。推動香港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際金融創新中心，形成與人民幣相關的金融產品和商品的定價權。

4.4 積極融入國家自貿區戰略，發揮好粵港澳合作的綜合優勢

中國大陸政府非常重視自由貿易。跟其它國家和地區，中國陸續達成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協議。目前，中國大陸已簽自貿協議 14 個，覆蓋 22 個國家和地區，包括東盟、智利、瑞士、韓國、澳大利亞等經濟體。正在談判建立的，有 8 個自由貿易區域(Free Trade Area)，包括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協定(RCEP)及中國與東盟自貿協定(「10+1」)升級談判等。研究設立的雙邊自貿協定則包括中國與印度、哥倫比亞、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等。

為了落實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中國繼上海自貿區，於 2015 年再啟動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2016 年 8 月 31 日新華社傳來消息，國務院再決定，在遼寧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慶市、四川省、陝西省再設立多 7 個自貿試驗區。

⁶⁵ 2016 年 8 月 31 日，中國工商銀行牽頭發行了世界銀行特別提款權（SDR）計價債券，總額為 5 億 SDR（約合人民幣 46.6 億元），期限 3 年，票面利率 0.49%，取名為「木蘭」。這是 1981 年以來全球發行的首單 SDR 計價債券，也是全球範圍內首次以公募形式發行的 SDR 計價債券。據悉，境內外投資者認購踴躍，債券的認購倍數達 2.47 倍。

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廣東自由貿易區實施範圍 116.2 平方公里，涵蓋三個片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 60 平方公里（含廣州南沙保稅港區 7.06 平方公里）、深圳前海蛇口片區 28.2 平方公里（含深圳前海灣保稅港區 3.71 平方公里）、珠海橫琴新區片區 28 平方公里。其中前海及蛇口與香港隔海相望，主打發展金融、現代物流、資訊服務、科技服務等戰略性新興服務業，建設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視窗、世界服務貿易重要基地和國際性樞紐港。前海的定位，讓它可成為香港最佳的戰略夥伴。進駐前海的香港物流公司更可利用前海灣保稅港區之便，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高質素物流服務。早於 2010 年 8 月 26 日國務院已批示成立「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希望規劃利用毗鄰香港的區位優勢，借《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將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定位為深港合作先導區、體制機制創新區、現代服務業聚集區和結構調整引領區。⁶⁶

當前，香港處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香港必須積極融入國家的自貿區戰略，尤其借助廣東自貿區建立的契機，圍繞貿易、投資、金融等眾多領域，加強粵港澳深度合作，實現產業自身發展與升級換代：一是在貿易領域，香港可發揮亞太地區的貿易及航運樞紐，並且是廣東及其它省份通往國際市場的重要門戶的優勢地位，通過粵港澳共同加強連繫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經濟的貿易往來，發展國際遠洋、國際航空運輸服務、船務融資、保險、經紀、船舶管理及相關法律服務等產業，不斷豐富香港的貿易及航運業發展內涵；二是在投資領域，香港可充分利用同時享受「廣東自貿區」寬鬆的市場准入，和 CEPA 及其「子協議」的優惠措施的先決優勢，比其他外商更快一步進入廣東以至整個內地市場，搶佔市場空間；三是在金融領域，香港應積極參與粵港澳金融合作，推進粵港澳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優質金融服務和融資便利，強化香港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地位，以便加強及發揮粵港澳在推動內地金融改革開放的作用。

⁶⁶ Gonzalo Vllalta Puig and Lauren Deutsch(2016), Logistics Industry Should Accept Qianhai's Invitation, China Daily HK edition, September 115, 2016.

4.5 全球化和科技潮流

全球化和科技潮流既帶來機遇也帶來威脅。這裏先談機遇。首先，香港本身市場發展的空間有限。全球化和科技潮流使我們的潛在市場提升至全球每一個角落。這對發展方興未艾的電子商貿尤其重要。上面提到阿里巴巴在短短數年間便突圍而出成為全球第一的電商，正好彰顯這個道理。韓國藝人 Psy 憑一曲 **Gangnam Style** 走紅全球是另一例證。近年香港創業風盛，年輕人以他們的創意，利用資訊科技發展事業，為香港經濟帶來新亮點。全球化之下，香港亦吸引了全球各地的精英來港創業。政府和投資者宜覷準機會，予以配合，爭取共贏。

今天科技發展有幾個方向特別惹人憧憬和對經濟影響最為深遠。其中首推人工智能。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的華迪教授(Moshe Vardi)指三十年內人工智能很可能取代接近一半的勞動人口，而即使是專業職位亦勢難倖免。⁶⁷人工智能的特色是它能從經驗中學習。早前 AlphaGo 戰勝圍棋世界冠軍李世乭，靠的不單是強大的運算能力，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學習能力。人工智能對消費者是天大的喜訊，尤其對城市人能帶來更優質方便的生活。但對各行各業的在職人士它也帶來威脅。科技發展另一突破是 3D 打印和物料科學的進展。3D 打印今天對建築業、製造業、醫學、教育、環保等都開始發揮巨大的影響力。另一發展是區塊鏈(blockchain)的發明。Don Tapscott 及 Alex Tapscott(2016)指出區塊鏈的應用超越金融領域，它是一套給所有互不認識的人都能接觸和使用，把任何有價值的資訊儲存於內而可確保其內容不容篡改的科技⁶⁸。貨幣、擁有權、地契、音樂、藝

⁶⁷ “Robots and AI would take over 50% of human jobs in next 30 years warns expert” By India Ashok.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published on February 15, 2016. Accessed on 6th September 2016. <http://www.ibtimes.co.uk/robots-ai-would-take-over-50-human-jobs-next-30-years-warns-expert-1543835>

⁶⁸ “The Impact of the Blockchain Goes Beyond Financial Services” by Don Tapscott & Alex Tapscot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ublished on 10th May 2016; Accessed on 6th September 2016. <https://hbr.org/2016/05/the-impact-of-the-blockchain-goes-beyond-financial-services>

術、科學發現、智識產權乃至投票，都可儲存或轉移而無人能改動其內容。例如現時已有公司設計出音樂人能直接賣作品給消費者的產品，在傳送音樂的同時加入合約。這種設計改變了音樂人倚靠經理人或發行商代辦的生態。一家初創企業利用區塊鏈科技讓藝術家上載作品和加載水印標記證明是真品，然後像比特幣般可以供買家轉讓給別人。Tapscott 和 Tapscott(2016) 指出區塊鏈更可配合 3D 打印技術改變製造業的運作。另一重大科技突破的領域是生物科技。由於幹細胞和基因研究的突破，很多以前無法治理的頑疾都有可能醫治，人工培植的器官亦可能出現供移植之用。

4.6 大數據的出現

互聯網時代，大數據為各行各業提供重要的市場資訊，讓它們更能掌握消費者的需要和喜好，藉以改善服務和推銷產品。能夠善用大數據的企業肯定有重大的競爭優勢。能夠善用大數據的政府亦肯定能更好掌握民情，改善施政。顯然，企業和政府對能分析大數據的人才需求甚大，社會有必要培養這些人才。

5 威脅(THREATS)

5.1 科技急促發展衝擊傳統營商模式

全球化和科技潮流帶來的威脅主要在對傳統營商模式的衝擊。最經典的是百年老店柯達因數碼相機的冒起無法保住以菲林照相為基礎的業務，最後被逼接受破產保護。申請破產保護一年後即 2013 年柯達公司在售賣大量資產後成功脫離破產保護，但已是完全不同、只專注於為商業客戶提供數碼成像服務的公司。最諷刺的是原來把它淘汰出局的數碼相機技術竟是柯達的發明。但它在傳統的菲林照相技術優勢太強、也太易賺錢，以致

它錯過了好好發展數碼相機技術跑贏競爭對手的時機。另一個例子是電子商貿對傳統營店舖售貨的商業模式的衝擊。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 2016 年初公布關閉全球各地共 269 間店舖，並會更專注於巨舖超市(super centers)和電子商務。這些例子都顯示科技的威力。一時不留意科技潮流的變化並適時反應，好端端、看似根基紮實的企業都可以沒頂。

5.2 競爭對手不斷努力、全方位挑戰香港地位

區內區外競爭對手都積極提升自己的競爭力。無論在硬體如基建或軟件如制度及人力資源，內地城市如上海、深圳等近年都有長足的進步。區內如新加坡和首爾等都市亦積極開發新的經濟火車頭。而國內愈與國際接軌，香港作為國內與國際的橋樑角色就愈淡化。香港須積極強化傳統的優勢和尋找新的優勢，才能避免逐步被邊緣化。

5.3 內耗與社會資本流失：自大人心變封閉、抗爭社會變撕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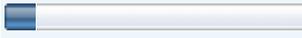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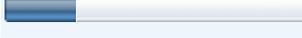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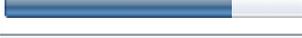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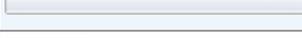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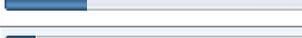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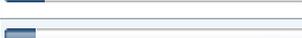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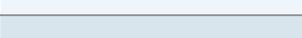
不少港人對香港的政經社會狀況不滿，卻未能掌握問題的核心，反而以自己片面的理解去用抗爭手法爭取自己的理想。殊不知不同人往往各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以抗爭取代溝通講道理只會造成社會撕裂。社會撕裂造成內耗；內耗又造成競爭力下降。

回歸後的香港人對中央政府本來逐步建立互信。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步入通縮，經歷了異常困難的日子，但中央政府給香港有力的支持，香港經濟逐步回穩。可惜 2008 年後，一連串不幸的事件動搖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心。2005 年，曾蔭權政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向立法會提出循序漸進修改 2007 年行政長官和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議案，但是部分市民嫌步伐太慢，並醞釀要求公民提名等偏離基本法的普選特首方案，2013 年有人更提出「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為手段脅逼政府就範。最終 2014 年佔中運動維持了 79 天，給廣大市民帶來不便，造成衝突。市民之間分成兩派，堅持

己見、各不相讓。一些對中央政府抗拒的人士，更進一步發展成對大陸人不友善、甚至對大陸遊客和新移民動粗、抗拒普通話、以至抗拒中國人的身份，要去中國化。這些趨勢已威脅到香港作為旅遊消閒的目的地、中西文化匯聚的國際大都會、甚至企業在亞洲地區首選總部地點。

與國際城市相比，香港近年來在多個機構的評比中，有關競爭力的排名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2016年營商環境報告》，香港在全球的排名由2015年第三位下降至2016年的第五位，尤其在「登記財產」（第五十九位）和「跨境貿易」（第四十七位）方面的排名較為遜色。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報告中，香港從2014年至今排名分別為第4、第2、第1名，名次有反覆。其中，2015年IMD的報告雖未直接評論「佔中」的影響，但點出香港社會凝聚力排名偏低。報告進一步提到，香港在過去一年顯著轉差的專案包括了政府決策能力、政治不穩定風險和社會凝聚力等，但並未提供更詳細的說明。

表 4.1 2015 年匯賢智庫僱主問卷調查：對本港競爭力最大的威脅是什麼？

選項	小計	比例
勞工成本上升	8	 27.59%
勞工質素成疑	3	 10.34%
租金/土地成本	22	 75.86%
政策支援不足	7	 24.14%
政治文化形成內耗	22	 75.86%
合規成本上升	0	 0%
科技落後	8	 27.59%
政策幹擾營商	3	 10.34%
勞資關係惡化	4	 13.79%
企業家避險傾向短視係惡化	3	 10.34%
本題有效填寫人次	29	

(註：本調查對象主要為中小企。取樣雖少，仍足以反映相關行業的經營環境和憂慮。但如合規成本等對金融服務關係較大的問題則並不適用)

即使與內地城市的對比中，香港在競爭力方面的領先優勢也大不如前。中國社會科學院 2015 年發佈的《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顯示，曾連續 13 年位居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榜首的香港，首次被深圳超越而退居第二位。翌年，《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 2016》同樣給香港在「綜合經濟競爭力」第二位的排名，低於深圳。在「可持續競爭力」方面，香港則仍穩居榜首，依次高於上海、北京、深圳、澳門、廣州、杭州、蘇州、南京和青島。

多個研究顯示社會矛盾明顯損害了香港的競爭力。突顯這些矛盾的事件包括 2014 年發生的「佔中」、訪港內地旅客受到滋擾，以及急增的遊行示威事件等。香港的人均收入增長與澳門和新加坡相比明顯落後，貧富差距卻長期是熱門的議題。

6 總結

今天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不停地顛覆昨日生產和分銷的模式和秩序。我們的競爭對手都主動和積極培養和羅致人才，並投放巨大的資源推動和應用創新科技。香港是全球最開放最自由的經濟體，很早就接觸不同的文化和事物。香港與號稱中國矽谷的深圳毗鄰，亦擁有多所世界級的大學，完全有條件跟競爭對手比拼，各顯神通，推進人類文明。然而，若果香港由經濟城市轉變成政治城市，無休止地內耗，則將無法善用我們優厚的條件，無法發揮香港的潛能。

目前，中國的經濟由急速成長期步入優質成長的結構重整期。國內大力推動環保科技，並積極研發創新，香港宜夥拍國內先進企業和研發機構，加快升級轉型。

國家主席習近平及總理李克強分別在不同場合指出，「十三五」核心目標是要全面建立小康社會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挑戰，在優化經濟結構、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的同時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國家明確提出要深化內地和港澳台兩岸三地的合作發展，包括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參與國家雙向對

外開放、「一帶一路」建設，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以及加快粵港澳合作。
香港以它的國際聲譽和國際地位特別適合的工作包括融資，提供法律和仲裁服務、培訓和其他顧問服務等。

第五章 兩大瓶頸如何應對：地產和勞工政策

1 前言

探討香港競爭力問題的學者多會拿新加坡作比較。新加坡和香港都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它們都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它們都是華洋集處的大都會；它們都曾經是英國殖民地，而現時都沿用普通法法系。直至 90 年代初，新加坡和香港的經濟增長都不相伯仲，人均產值亦非常接近。然而，過去二十年來新加坡大幅跑贏了香港。新加坡的人均 GDP 早已超越香港。2010 年 GDP 總額亦都超越了香港。1965 年新加獨立那年，香港的 GDP 是新加坡的 2.5 倍；2014 年，香港的 GDP 還不到新加坡 GDP 的 95%。1994 年香港人均 GDP 是新加坡 GDP 的 1.04 倍。2014 年香港人均 GDP 僅得新加坡 GDP 的 71.4%。雖然國際間以美元計的 GDP 或人均 GDP 都受匯價變化影響很大，一、兩年間的變化不能作準，長時間若趨勢明顯則多會反映一些背後因素在發揮作用。⁶⁹

經濟學者看競爭力，往往會看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變化。如果投入生產的要素不變，總產量卻提升，就表示生產的效率提高；TFP 正就是生產要素投入解釋不了的生產增長。2009 年中文大學的研究團隊⁷⁰就將香港經濟增長分解為資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和全要素生產力(TFP)的變化。資本深化指每單位的勞動力得獲更多的資本配合，每單位勞動力的生產力因而提高。全要素生產力，如前述指生產要素投入解釋不了的生產力，一般而言源於更聰明的生產方式或技術進步。Young 的多篇文章指東亞地區多個經濟體的高速增長雖然觸目，卻主要歸功於生產要素的投入，反而全要素生產力(TFP)的表現未見突出。⁷¹

⁶⁹果然 2015 年香港總產值以美元計再超越新加坡，而人均收入回升至新加坡的八成。

⁷⁰ 中央政策組委託中文大學團隊(張俊森等)撰：《香港經濟研究：經濟轉型、競爭力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2009。

⁷¹ Young, Alwyn, "Tale of Two Cities: Factor Accumulation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NBER Economics Annual, (1992) pp. 13–54.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NICs: A Contrarian View,"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No. 38 (April, 1994a), pp. 964–73. "Tyranny of

亞洲發展銀行 2010 年由 Park 撰寫的一個研究報告發現 1970 至 2000 期間香港的 TFP 都低於新加坡；2000 年過後香港的 TFP 卻迅速反彈，在兩種假設下增速居然位於四小龍之首；在第三種假設下則只是輕微落後於新加坡⁷²。(表 5.1)

表 5.1 全要素生產力增長及對亞洲四小龍及五國集團 GDP 增長的貢獻(i) (%)

假設	數據時段	香港	南韓	新加坡	中華台北	日本	德國	法國	英國	美國
實際勞動份額	1970-2000	1.3	0.3	2.0	1.5	-0.2	1.2	0.9	1.1	0.7
		(19.8)	(3.8)	(25.0)	(19.4)	-(7.7)	(52.2)	(33.3)	(43.5)	(20.7)
勞動份額=0.6	1970-2000	1.9	1.5	2.8	2.5	0.3	1.2	0.9	1.0	0.7
		(29.9)	(20.1)	(35.2)	(31.6)	(11.3)	(51.3)	(34.2)	(42.3)	(22.1)
勞動份額=0.6 (按 勞工質素調整)	1970-2000	1.5	0.7	2.3	1.8	-0.1	0.2	0.2	0.8	0.4
		(23.6)	(9.7)	(29.5)	(23.5)	-(2.9)	(10.2)	(7.4)	(34.0)	(11.9)
實際勞動份額	2000-2007	2.6	1.0	2.3	1.0	0.7	0.3	0.2	1.0	0.1
		(54.9)	(25.0)	(46.5)	(27.5)	(61.3)	(26.2)	(13.7)	(37.6)	(3.6)
勞動份額=0.6	2000-2007	2.7	1.3	2.4	1.2	0.8	0.3	0.3	1.0	0.1
		(57.6)	(33.8)	(48.8)	(32.7)	(72.2)	(26.0)	(15.6)	(37.2)	(6.1)
勞動份額=0.6 (按 勞工質素調整)	2000-2007	1.8	1.0	2.0	0.4	0.5	-1.0	-0.1	0.7	0.7
		(39.2)	(24.1)	(39.4)	(12.0)	(44.8)	(90.3)	-(8.6)	(25.0)	(33.6)

註：括號內數字為 TFP 增長對 GDP 增長的相對貢獻率

資料來源：Park (2010), ADB. Table 4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4680 (March, 1994b).

⁷² Jungsoo Park: Projection of Long-Term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for 12 Asian Economies ADB Working Paper No. 227, October 2010。假設一視勞工所得份額等同實際情況、並不為不同質素的勞工投入作調整；假設二設所有經濟體的勞工所得都佔取總產值的六成、並不為不同質素的勞工投入作調整；假設三設所有經濟體的勞工所得都佔取總產值的六成、同時視優質勞工的生產力為一般勞工的數倍。

對 TFP 的估計，不同學者由於採用不同的方法，結果可以相當不同。Park 也列出其他學者的估算。(表 5.2) 顯示：其他學者一致認為香港的 TFP 多年以來對 GDP 增長的貢獻都高於新加坡。

表 5.2 全要素生產力增長及對 GDP 增長的貢獻(ii) (%)

研究作者	研究年份	數據時段	香港	南韓	新加坡	中華台北	日本
Chen	1977	1955-70	4.3 (46.5)	5.0 (56.4)	3.6 (55.2)	4.3 (53.6)	-
世界銀行	1993	1960-89	3.6 (43.9)	3.1 (36.9)	1.2 (15.0)	3.7 (42.0)	3.5
Young	1994	1970-85	2.5	1.1	0.1	1.5	1.2
Young	1995	1966-90	2.3 (31.5)	1.7 (16.5)	0.2 (2.3)	2.6 (27.7)	-
Kim and Lau	1995		2.4 (35.0)	1.2 (14.0)	1.9 (23.0)	1.2 (15.0)	-

註：括弧內數字乃對 GDP 增長貢獻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Park (2010), ADB. Table 4.

本港學者王于漸在一篇專文⁷³同樣指出香港的 TFP 多年來都是優於新加坡(表 5.3)。然而他亦指出香港的 TFP 數字雖高於新加坡，但近年差距已收窄。1960 年至 2011 年，香港 TFP 平均較新加坡高 19.7%⁷⁴，但在 2000 年至 2011 年期間，兩地差距僅為 4.4%。

⁷³ 王于漸，〈政策與人力資本如何影響新加坡與香港的增長差距〉，信報財經新聞，刊於 2013 年 10 月 2 日，<https://forum.hkej.com/node/106097>

⁷⁴ 原文為 18.5%，應該是錯值。

表 5.3：香港及新加坡「全要素生產力」(TFP)與美國基準對比

	香港 TFP	新加坡 TFP	兩地 TFP 比率
1960-70 年	1.053	0.686	1.535
1970-80 年	1.095	0.972	1.127
1980-90 年	1.100	0.976	1.128
1990-00 年	1.159	0.934	1.241
2000-11 年	0.980	0.939	1.044
1960-2011 年	1.075	0.898	1.197

資料來源：王于漸，2013

關鍵的問題是：如果香港在 TFP 的表現不低於新加坡，何以香港的經濟增長大遜於新加坡？

王于漸認為兩地平均增長率之間的差距，主要由於政府資助房屋的市值未能全面反映於香港 GDP 數字，因為不像新加坡建屋發展局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轄下公共房屋般可在公開市場自由買賣。但是這說法顯然缺乏說服力。如果王于漸這解釋正確，又如何解釋香港的經濟增長直至九十年代初都跟新加坡不相伯仲？

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近年來香港的經濟增長受制於一些瓶頸(bottlenecks)。只要這些瓶頸乃屬有牽制性(binding)，則其他生產要素就無法發揮本身的作用。比方說：一個基建項目的某環節因為勞工短缺，無法如期完成。投放了的其他要素便都必須等；工程的其他環節同樣也必須等。社會各界原來要倚賴該基建項目的，也要等。香港經濟近年受土地短缺和勞工短缺兩大瓶頸牽制，無法再像過去土地和勞工充裕的時間相比。相反，新加坡差不多可任意填海，且幾乎全面發展市內的土地，法例保育地少於全國土地面積

的 10%；新加坡並大量輸入外勞。至於專才方面，香港和新加坡可說同樣開放。但香港的保護主義要比新加坡嚴重。結果是香港的瓶頸效應亦遠較明顯。

2 勞工短缺問題的性質

本章談的勞工是廣義的勞工，即人力資源的投入。要掌握勞工短缺問題的內涵，首先要明白不同的人力資源之間存在相輔性(**complementarity**)遠多於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缺乏了甲類人力資源，乙類人力資源的作用就可能無法發揮。再多的乙類人力資源也紓緩不了甲類人力資源嚴重短缺的問題。這就是瓶頸效應。

有人說：提高工資可以解決勞工短缺。這對個別企業而言是對的，但對整體經濟就可能不對。個別企業提高工資可以解決勞工短缺，是因為藉此可以從其他企業搶人。提高工資只是從本企業把勞工短缺轉到其他企業而已，整體經濟的短缺仍然存在。

對於勞工是否存在短缺，工黨李卓仁有不同看法。以被指為拖慢工程進度的建造業勞工短缺為例，他在 2015 年 1 月發表的一篇文章說：「政府透露，去年九月，建築地盤的職位空缺數目按年大升超過七成，反映人手需求持續緊張。驟眼看七成升幅似是十分驚人，但實際代表多少職位呢？答案是不足六百五十個。同期地盤工人失業數字又是多少呢？答案是大約八千人，另有兩萬多人開工不足。換句話說，本地工人足以填補建築地盤的職位空缺，即使有人手和技術錯配問題，政府亦應先協助工人配對就業和提升技能，而非捨難取易，帶頭輸入外勞，損害本地工人利益。」⁷⁵

⁷⁵ 〈李卓人：反對放寬輸入外勞〉，星島日報，刊於 2015-01-23。

<http://labour.org.hk/blog/2015/01/23/%E5%8F%8D%E5%B0%8D%E6%94%BE%E5%AF%AC%E8%BC%B8%E5%85%A5%E5%A4%96%E5%8B%9E/>

我們參考統計處的資料，確定李卓仁的數字沒有錯。但地盤工包括不同工種，由非技術的普通工人及雜工到混凝土工、砌磚工、地渠工、砌石工、鋼筋屈紮工、不同種類的技工等三十多個工種。同樣，報稱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工人亦有不同的情況。有真找不到工作的，也有不滿意工作條件或地點；有具有能力和有積極性的，也有工作能力或工作態度欠佳的。即使地盤工人失業數字大於職位空缺數目，仍有勞工短缺的可能。要評估有無勞工短缺和勞工短缺的嚴重性，可參考工資上升的速度。一般而言，如果某工種的工資短時間內急升，而升幅又比一般工資的高出很多，我們就可以推論有嚴重的勞工短缺。如鋼筋屈紮工和混凝土工，近年工資年內升幅都曾逾 10%、乃至逾 20%，大大高出一般工資的升幅，顯示在某些時段短缺嚴重！在勞工出現嚴重短缺時，可以肯定會拖慢工程進度和拖低經濟增長。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勞工市場可以短時間內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尤其是建造業。一個大工程的開始和終結有時足以使勞工由不缺驟變成缺；又由缺驟變成不缺。近年由於多個大型基建項目同時進行，公樓及私樓動工率上升，翻新和維修工程也多，建造業人手短缺嚴重，建造成本急升。建造業議會為吸引年青人入行，2016 年九月起調升專門技術課程的每月津貼額。⁷⁶

除了體力勞工出現短缺，不少專業人才亦出現不足。其中香港市民特別關注醫生荒。近日 20 多位來自內地、台灣、歐美大學畢業而考取香港執照的醫生合著的《風雨杏林路——香港執照醫生奮鬥歷程》指出：由一九七七年開始舉辦每年一次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試，三十多年來，經執照試獲取牌照的醫生只有約一千一百名。要取得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必須經過三個考試和完成十八個月的臨牀實習（一九九七年後實習期改為十

⁷⁶ 此等課程屬一年制，免學費之餘可享 3150 元的每月津貼。見〈建造業課程增津貼吸新血〉，東方日報，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60811/00176_044.html

二個月)。而數字顯示：在回歸後保護主義似更趨嚴重；經考試及實習合格後發出的執照，由回歸前平均每年 49 個，竟驟降到回歸後平均僅得每年 9.7 個。⁷⁷

勞工短缺往往又和人口結構和人口政策相關。香港最近幾十年來婦女生育率一直下降。一般生育率由 1981 年的每千名 15 至 49 歲女性（扣除外籍家庭傭工）有 65.2 名活產嬰兒下降至 2003 年的 24.9 名，然後稍見回升，2014 年是 35.9 名。⁷⁸ 生育率下降造成人口老化。⁷⁹ 人口老化又造成勞動人口減少。按政府統計處最新的勞動人口推算，整體勞動人口按推算將會由 2014 年的 360 萬（不計外傭）稍微上升至 2018 年的 365 萬，然後下降至 2031 年的 343 萬，隨後至 2038 年將徘徊在 342 萬至 343 萬之間，最後下降至 2064 年的 311 萬。人口變化是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加淨流入人口。勞動人口則視乎工作年齡人口和勞動參與率。人口政策足以左右人口淨流入的數字、出生率、各類人才的培訓和淨流入，乃至退休年齡等關鍵數字，因此對於勞動力供應相當重要。

3 解決勞工短缺問題的方法

勞工短缺問題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而且，如沒有合適的應對措施，隨著時間的過去問題的嚴重性還會加劇。鼓勵生育對現時甚至二十年內的問題毫無幫助。縱使真的成功提高生育率，勞動人口在二十至三十年內都仍會持續下降。要短期內紓緩問題，邏輯上只有三個：A. 提高現有勞工的生產力；B. 發掘潛在的勞動力；C. 從外間輸入新的勞動力。

⁷⁷ 吳歷山、朱祖仁編，《風雨杏林路—香港執照醫生奮鬥歷程》大中華文化出版社，2015 年。

⁷⁸ 香港統計月刊 2015 年 12 月〈1981 年至 2014 年香港生育趨勢〉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1512FB2015XXXXB0100.pdf>

⁷⁹ 香港統計月刊 2015 年 10 月專題文章，《2015 年至 2064 年香港勞動人口推算》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1510FB2015XXXXB0100.pdf>

3.1 提高現有勞工的生產力

提高現有勞動力的生產力有四個途徑，包括教育培訓、自動化、改善勞僱雙方的配對、改善管理等。

3.1.1 教育培訓

我們現時已有僱員再培訓局和職業訓練局，且都做得很不錯，但仍須不時檢討怎樣可以做得更好。有意見認為我們的職業訓練局的課程對年青人吸引力不足。這或跟社會風氣鍾情上大學有關。其實事業成功不一定要上大學。2015 年國內最賣座的電影捉妖記的導演許成毅早年畢業於仍未升格為大學的香港理工學院平面設計系，工作數年後又在加拿大的瑟丹學院（Sheridan College）學習電腦動畫製作。瑟丹學院也不是大學。許成毅卻成功打出名堂，2002 年由他負責設計的 Shrek 贏得最佳動畫的奧斯卡大獎。許氏 2007 年 3 月獲選為首屆香港數碼娛樂業風雲人物，並於同年與克裡斯·米勒（Chris Miller）一起在「ShoWest 電影市場展⁸⁰」被選為年度風雲動畫導演。

2008 年 5 月 5 日特區政府推出一個七級的資歷級別制度（「資歷架構」），用意是鼓勵市民進修有質素保證的課程並考取認可的資歷。政府認為資歷架構可提升整體工作人口的質素及競爭力。可惜推行以來，年青人和家長的觀念仍未見改變，多元成功路的道理和真實的成功個案都有必要加強宣傳、加強職涯教育（生涯教育）和在職培訓。其中重點應是宣揚憑非大學學位渠道進修卻事業有成的個案。

據我們的訪談和問卷調查，我們現時的年青人在不少僱主的心目中，語文能力、責任感、勤奮度和主動性都嫌不足。這些質素的培養是否可以加強？我們的中學大學是否過於著

⁸⁰ 2011 年起易名為 CinemaCon。

重學術成績而忽略了全人教育的內容？如能培養他們成為勤奮盡責、謙卑求學、推己及人等美德兼備的人，則不論在什麼崗位他們都會發揮潛力，為他們所屬的機構盡力貢獻所長。

3.1.2 自動化和資本投入

在某程度上勞工短缺問題可以以資本投入紓緩。在製造業，大規模的自動化，特別是用電腦程式指揮的機械人(**computerized robotics**)，可以取代大量勞工。以之處理重複和刻板的工作，既快捷又少出錯。然而，即使在製造業，一些工序仍必須倚賴技術人員的判斷；在服務業，因為服務對象是人，給賓客人性化的服務十分重要，機械人派不上用場；在建造業，由於地盤環境複雜，而每個地盤都有獨特性，也無法大量使用機械人。

除了自動化資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還包括給勞工有更好的工作環境和為僱員提供更好的工具或器材等。此等資本投入同樣可以提高勞工的生產力。

3.1.3 改善勞僱雙方的配對

要勞工充份發揮他的生產力，每位僱員都應在最合適他們的崗位。僱員在不最合適的崗位工作有很多原因。有一些人為了不喪失申請公屋、居屋或領取其他福利的資格，寧可屈就做較低薪的工作。有一些人到了合約上的退休年齡，無法繼續在原來崗位甚至相關的工作崗位服務，被逼當上大廈管理、司機或其他年齡限制較寬的工作。另外也有人因居所地點關係，寧捨遠就近，即使薪酬吸引也不願長途跋涉上班。此外，因為資訊不完全，僱主和僱員要理想配對並不容易。要解決這些問題，設計福利時，在入息上的申請資格都不應劃上死線，稍過死線即完全喪失申請資格，而應改為「漸退」式的辦法；收入稍逾規定時，福利只稍降，收入逾規定愈多，福利降幅愈大，藉此減低扭曲效果。此外，減低長程交通費用、設計最佳的資訊平台等措施，亦有利於改善勞僱雙方的配對。

3.1.4 改善管理

坊間也有其他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土法。其一是超時工或無償加班；其二是設法提高勞工每小時內的付出(effort intensity)。然而這些做法不可能持續，很容易做成勞方曠工率和離職率上升、士氣低落，甚至盜竊、刑事毀壞等問題，結果得不償失。相反，僱主若能採用人性化的管理模式，突顯同理心，讓僱員感受到僱主的關懷，並提供渠道給他們向管理層提出意見和製造機會讓僱員發揮創意，僱員投入感和工作滿意度都會提高。不少研究已證實：僱員的工作滿足感提升了，生產力亦自然會提升。⁸¹香港提升快樂指數基金（基金）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合作推出的「開心工作間」推廣計劃自2012年起，倡議人性化管理提高員工士氣。2015年已踏入第三屆，該屆計劃下247家企業及25家機構分別成功申請「開心企業」及「開心機構」標誌，推廣人性化的企業文化。

3.2 發掘潛在的勞動力

發掘潛在的勞動力也有四個方向可考慮：延後退休年齡、提高勞工市場參與率(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提高兼職勞工投入的時數和創造兼職機會等。

比對新加坡和不少經合組織的國家，香港65歲以上長者的勞工市場參與率十分低。由於公共衛生和醫療條件的改善，加上市民保健意識提高，很多長者身體狀況都仍很好，

⁸¹ 參閱 Jonha Revesencio 所著的“Why Happy Employees Are 12% More Productive”, published on Jul 22 2015.
<http://www.fastcompany.com/3048751/the-future-of-work/happy-employees-are-12-more-productive-at-work> ;
Martin Zwilling (2014) “How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By Employee Happiness”, Forbes Magazine, published on Dec. 2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martinzwilling/2014/12/02/how-to-squeeze-productivity-from-employee-happiness/#6f67d5301de5>

仍能如常工作。由於他們經驗豐富，他們的生產力不低，並能扶掖後輩。香港特區政府已宣布公務員退休年齡由六十改至六十五，大廈管理員可工作至七十歲⁸²。延後退休年齡對紓緩勞工短缺很有幫助。

表 5.4 2014 年各地長者[@]勞動參與率

地區	百分比	地區	百分比
冰島	36.6	加拿大	13.4
南韓	31.9	英國	10.3
日本	21.3	香港	8.8
挪威	19.4	德國	5.8
新加坡	25.2	法國	2.5
美國	18.6		

@：長者定義為 65 歲以上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香港統計處：香港統計年刊 2015 年版，表 2.1 及 Ministry of Manpower of Singapore: Labour Force in Singapore 2014, table 5

3.3 從外間輸入新的勞動力

如果整體經濟確實出現勞工不足，個別僱主只能由其他僱主挖角。縱使能成功，整體經濟勞工缺口仍存在，結果只會推高工資，生產和投資卻被拖慢。輸入勞工和專才本來是紓緩勞工短缺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然而，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勞工和專業團體都傾向保護主義。勞工團體通常擺明車馬抗拒輸入外勞；專業團體則傾向委婉地以公共利益為名保護主義為實，設定種種對外來競爭的限制。

⁸² 保安局網頁顯示：保安及護衛業管理委員會宣布，為配合人口政策，由 2015 年 12 月 18 日起，乙類保安人員許可證年齡上限的年齡上限，已由 65 歲放寬至 70 歲。

<http://www.sb.gov.hk/chi/links/sgsia/extension.htm>

勞工團體擺明車馬抗拒輸入外勞，主要是認為輸入外勞會影響工友就業的機會和加薪的幅度。由於外勞工資較低，他們有理由害怕僱主以廉價外勞取代他們，並逼他們接受較低的工資。因此，如要輸入外勞，就必須建立穩妥的機制，讓他們看到就業和加薪的前景。輸入外勞也要經認可程序，並應設定留港時限：

首先要由有公信力的認可組織確定某僱主無法在不向其他僱主搶人的情況下才僱用到足夠的本地員工。目前的勞工顧問委員會由勞資雙方同等人數的成員組成，由於雙方偏向爭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很多時候無法達成共識，甚至可能出現拉倒的情況。要避免這種局面，可加入相同人數的、不涉利益衝突的市民代表。輸入勞工在合約期完成後，除非在同樣條件下找到工作，否則必須離港。

其次要為該僱主的本地員工在輸入勞工的合約期內設加薪率下限。加薪率下限為全港平均工資的加薪率乘以 $(1+A)$ 。A 為正數並可商議。按照常理，加薪率高於全港平均工資，足以保證業界本地員工不致因輸入勞工而受損。聘用外勞的僱主要承諾現有僱員在輸入勞工的合約期內獲不低於認可加薪率下限的加薪。如個別員工因失職解僱，須向認可組織提交證據，並獲接受。如屬建造業相關的工種，輸入勞工的合約期不會超過工程進行期。

至於香港的醫生荒，一個主要自原因是：亞洲金融危機後，政府因財赤削減醫科學額，由二零零一/零二年度每年約 310 人，減至二零零三/零四年度每年 280 人，再在二零零五/零六年度進一步減至 250 人。在人口老化和人口增加的大趨勢下削減醫科學額無疑是短視和不智。又由於近年私家醫院發展迅速，從公營醫院挖走不少資深醫生的需求，令醫生人手更形緊絀。特區政府二零一五年已把醫科學額增至 320 人，並會在二零一八年進一步增至 420 人，未來更可能每年增加 50 名。本身是 LMCHK 的吳歷山認為以執照試發牌增加醫生數字有「收放自如、靈活調節、節省開支、和諧社會」等多個優點。他

並建議外來醫生必須在公立醫院工作至少 5 年⁸³。筆者認同這建議。目前最缺人手的是公立醫院。公立醫院增加人手改善服務最切合香港現時的需要，亦最有助於建構和諧社會。建構和諧社會有助提高大家對政府的信任，並提高本港的競爭力。

4 土地短缺問題的性質

香港本來並不缺地。但是香港近年已開發的和可供發展的土地十分不足。團結香港基金 2015 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香港造地作發展用途的步伐在過去十年間大幅放緩。所謂造地，不一定是填海造地，也包括所有從原始或未能發展的狀況改變成可供發展的土地。1995 至 2004 年間香港造地 7,800 公頃，最近十年造地卻大幅減少至只有 1,100 公頃。

香港缺地的情況早已不限於住宅用地。圖 5.1 顯示：1999 年至 2015 年寫字樓租金上升了 1.5 倍，零售業樓宇租金升了 1.8 倍，都比住宅租金升幅顯著。這些升幅都遠超消費物價指數約兩成多的升幅，亦遠超期間工資指數低於 5 成的升幅⁸⁴。圖 5.2 更顯示：各類物業的售價指數升幅更驚人。其中分層工廠大廈售價指數升幅竟達 6.5 倍，零售業樓宇售價升逾 4.5 倍，寫字樓售價升 3.5 倍。相比之下，住宅售價 2 倍的升幅算相當溫和。寫字樓租金高企打擊香港作為商業城市的競爭力。團結香港基金的報告指出香港核心商業區的寫字樓的租金是亞洲區最高，比北京高近四成，更比新加坡高出近八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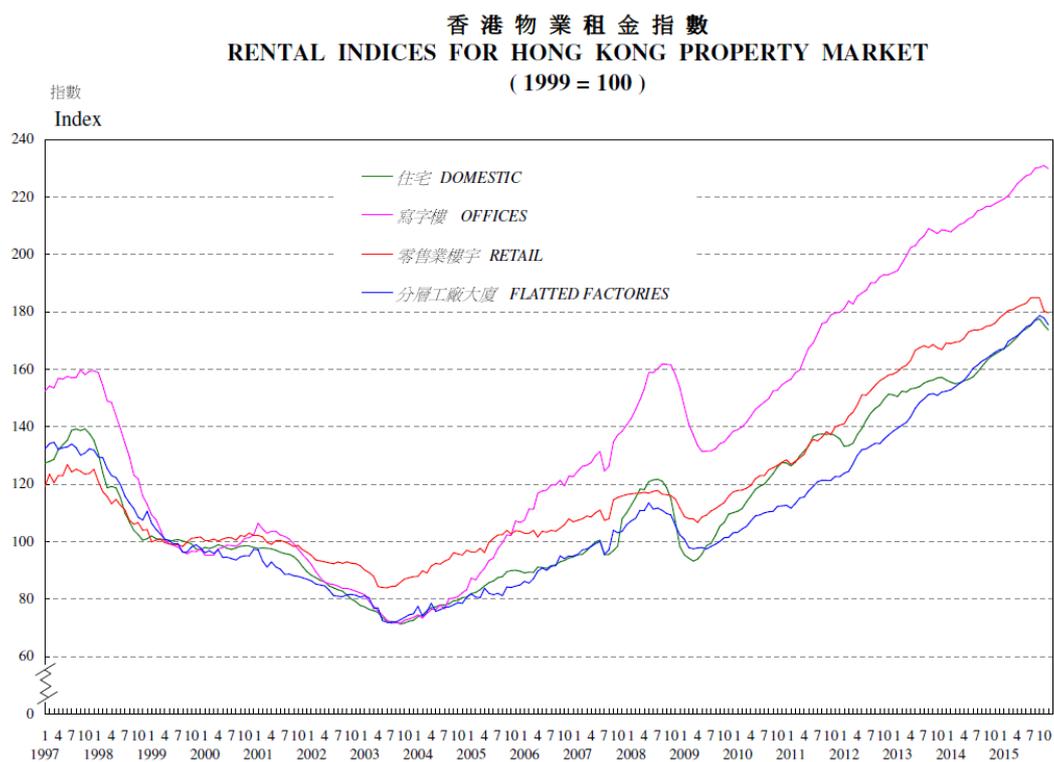
⁸³ <吳歷山：醫生執照試門檻太高 必須改革>。明報 2015 年 12 月 10 日。

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51210/s00012/1449683441545

⁸⁴ 按「所有選定行業主類」計。包括製造、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地產租賃及保養管理、運輸、住宿及膳食服務活動，和金融及保險活動等。見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 2015 年 9 月，表甲、表乙，頁 3、5 及 1999 年 9 月工資按季統計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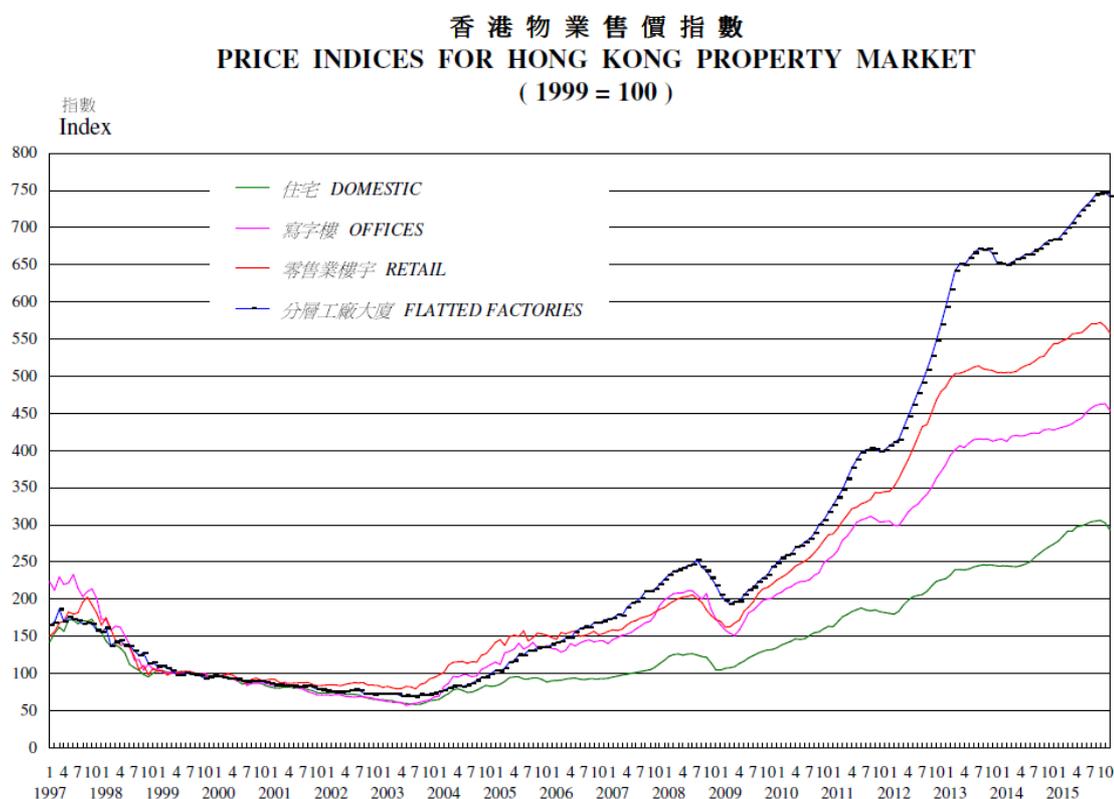
分層工廠大廈租金升幅遠低於寫字樓和零售業樓宇租金的升幅。有人或會奇怪何以分層工廠大廈售價升幅如此驚人？這點除可追溯於基數低的因素，還跟可改變用途的前景有莫大關係。

圖 5.1 香港物業租金指數 (1997-2015)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 <http://www.rvd.gov.hk/doc/en/statistics/graph1.pdf>

圖 5.2 香港物業售價指數 (1997-2015)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 <http://www.rvd.gov.hk/doc/en/statistics/graph1.pdf>

政府在二零零九年十月宣布的活化工廈政策，容許業主把工廈改成合法地用作更多用途的空間。據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2015 年 8 月網誌稱⁸⁵：2010 年 4 月起實施的活化工廈措施，截至 2015 年 7 月底地政總署共接獲 161 宗活化申請，其中 112 宗已獲批准。獲批出的整幢改裝申請大部分位於觀塘及葵涌，新用途主要包括辦公室、食肆、零售和服務行業以及酒店；而批出的重建申請多位於觀塘、油塘、長沙灣、葵涌及黃竹坑，重建後作住宅、商業或酒店之用。據規劃署《全港工業用地分區研究》2014 年的報告，工廈整體空置率近年不斷下降，工廠區亦已陸續穩步轉型。活化工廈措施已經達到善用工業

⁸⁵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因時制宜 善用工業用地〉發展局局長隨筆，刊於 2015 年 08 月 16 日。
http://www.devb.gov.hk/tc/home/my_blog/index_id_139.html

用地樓面、促進市區舊工廠區轉型的目標。政府決定 2016 年 3 月 31 日後不再接受有關的特別豁免書及契約修訂的申請。

陳茂波局長在同一篇網誌⁸⁶指出：諸如陳列室、數據中心、研究發展／檢測中心、文化創意藝術工作室，甚至是水耕或水產養殖等所謂「其他用途」，現時共使用約 5.1%的工廈樓面面積，並且有上升趨勢。工廈的優勢在於租金相對低廉、交通便利，樓底較高，結構比不少住宅安全。它不但為一些初創企業或新興活動提供更靈活的發展空間，更有人把一些工廈單位改裝成非法的劏房。政府表示會研究建議在合符消防和樓宇安全的大前提下探討進一步放寬非工業用途的限制，值得歡迎。然而，芸芸「其他用途」中，做文化創意藝術工作但產品商業價值不高的人士最難負擔日漸高昂的租金。如何協助他們尋找立腳地對發展本土文化創意藝術十分重要。

5 解決土地短缺問題的方法

5.1 填海造地

新加坡一直以填海造地為解決土地短缺問題的主要策略。在過去，香港亦是相當倚靠填海來增加發展用地，尤其是市區的發展用地。回歸後，保護海港條例通過，除非有凌駕性公眾需要才可以在維港範圍填海，政府並須諮詢公眾。然而，維港以外的沿海仍可酌情填海造地。

用上酌情填海的字眼意味著仍須考慮保育上的問題，並難免仍要向保育人士解話，說服他們填海合乎社會利益。

⁸⁶ 同上。

5.2 農地或棕地的開發

據 2016 年特首施政報告，現時本港約有 4 000 多公頃農地，當中約 15% 為常耕農地，其餘多數荒置。即使以當中 20% 或 800 公頃用以耕作，仍有 3200 公頃土地可供發展。

此外，很多評論員都提出可發展棕地，2016 年的施政報告認同新界不少棕地有發展潛質，但又指出目前大部分棕地已各有各的用途，要發展亦先要安置該等土地用途如何解決。況且棕地又各有其業主，收地要作賠償，除非以凌駕性公眾利益強行收地，否則亦要對方同意。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將部分現時作業遷入多層樓宇的可能性，政府在洪水橋新發展區已預留 24 公頃土地作相關用途，並會盡量整合不同模式的作業，改善新界鄉郊環境，並釋放土地作發展用途。這是正確的方向，但估計仍會面對不少阻力。

其實，在規劃處的土地用途分類，從來沒有棕地這個選項。據智經研究中心的一篇文章稱，所謂「棕地」，通常指「後工業社會因產業轉型帶來的使用率低或閒置的用地，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地都有類似概念。」香港棕地的產生則與本地農業式微有關，多是鄉郊農地荒廢或遭破壞後的產物，其中大多轉為露天貯物和港口後勤用地。⁸⁷ 由於棕地本來都並非規劃為棕地，到底新界有多少棕地並不確定。智經研究中心說：「發展局局長曾指，新界最少有 365 公頃棕地，面積相等於 19 個維園（約 19 公頃），亦即約粉嶺北、古洞北新發展區面積一半。另據公共專業聯盟 2012 年的調查估計，新界有逾 800 公頃棕地，其中近六成被用作貯物和廢物回收，三成左右土地為貨櫃物流相關用途，使用效率相當之低。」近年冒起的本土研究社根據 Google Earth 衛星圖片估計，全港棕地面積近一千二百公頃；若公共專業聯盟和本土研究社提供的數字均為正確，則在短短三

⁸⁷ 〈「棕地」發展：試住先？〉智經研究中心於 2015 年 5 月 22 日刊登於《經濟日報》。
<http://www.bauhinia.org/index.php/zh-HK/analyses/331>

年間棕地面積增加了近五成。⁸⁸ 本土研究社建議當局盡快研究成立棕地資料庫並妥善規劃，優先發展棕地。在一個香港電台主辦的城市論壇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回應說開發棕地是政府必然的選項，並且是優先選擇。他指出現正規劃的洪水橋便有 190 公頃棕地，元朗南則有 100 公頃，涉及的土地已佔一千二百公頃的四分之一。但他強調不可能所有棕地一下子都用來發展。政府必須平衡不同需要，再配合基本建設和交通配套才可以發展。⁸⁹ 觀乎鬧得熱烘烘的橫洲事件，棕地發展可說舉步為艱。

粗略地說，發展土地都有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之分。政府發展新市鎮，乃至由市區重建局發展舊區，都屬前者。發展商向規劃署申請改變土地用途，要發展其擁有的農地，則屬後者。前者主動；後者被動。這樣分類或嫌過於簡單，但大致上仍可分主要按規劃師或掌政策者主導或主要靠市動力量主導兩種模式。

由上而下推動發展的好處是發展方向和速度都在規劃師或掌政策者可控範圍之內；由下而上的發展則有較多不確定性。由上而下的一个壞處是無可避免要面對苛索和民間阻力的可能。政府要強行收地固然會遇到反對和反抗，並可能要付出高額の賠償。

由下而上、由市場主導的發展，好處在借助市場力量，減少政府要花的氣力。由於申請發展的人士主動申請，政府可以按既定程序處理。壞處是要是沒有人申請要求發展，發展步伐可能追不上社會需要。市場主導亦減少了城市規劃師發揮的機會。有一些政府欲見的結果要靠主動設計和規劃才能達致。市場主導意味有些政府欲見的結果要落空。

一向以來，兩個發展模式香港都有採用。備受爭議的新界東北發展區，乃至洪水橋和元朗南的發展，都屬由上而下的發展模式；而屢次被否決的由恒基推動的元朗南生圍住宅

⁸⁸ 〈1200 公頃棕地荒廢〉，東方日報，刊於 2015 年 12 月 28 日。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51228/00176_007.html

⁸⁹ 〈被指無優先發展 發展局：開發棕地是必然選項〉，AM730，刊於 2016 年 1 月 18 日。
<http://www.am730.com.hk/article-298641>

發展計劃則屬由下而上的發展模式。該計劃長期由於保育人士的反對仍陷僵局。規劃署的立場是，只要申請人滿足保育樹木、擴闊蠓洲路等多項要求就不反對申請。規劃署在諮詢期間，收到約五百六十份公眾意見，當中三百三十多份支持項目，認為項目配合政府的房屋政策；至於反對或提出關注的意見，就有二百二十多份，主要關注對生態影響。目前恒基正向城規會申請在南生圍興建 28 幢樓宇及 140 間獨立屋，住宅樓面面積逾 30 萬平方米，料提供逾 2521 個單位，城規會暫定 2017 年 2 月 24 日再次審議。⁹⁰

除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兩個發展模式之外，其實還有一種嶄新的混合模式可以考慮，或可為香港未來的城市發展另辟蹊徑。下列屬探討式的討論供各持份者參考，冀能在爭議聲中拋磚引玉。

這發展模式可分六個步驟：

- A. 把大片農地和棕土區劃為「潛在發展區」(Potential Development Areas)，並規定作不同用途和「潛在地積比率」(Potential Plot Ratio)。這過程可稱之為「潛區劃」(Notional Zoning)。但業權擁有者仍未擁有發展權(Development Right)。(政府主導「潛區劃」)
- B. 業權擁有者如有發展意向要將意向交城規會審批。(市場主導；民間參與)
- C. 政府考慮發展意向要求的額外基建是否合乎成本效益，然後決定是否配合。(政府配合)
- D. 如決定配合，會向受惠業權擁有者徵收基建稅("Special Assessment")，以反映因政府

⁹⁰ 〈規劃署不反對南生圍濕地緩衝區發展住宅計劃〉，商業電台，刊於 2016 年 1 月 19 日。
http://www.881903.com/Page/ZH-TW/newsdetail.aspx?ItemId=849369&csid=261_341

〈擬建 2500 單位 諮詢月底屆滿〉明報 2016 年 12 月 23 日
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1223/s00002/1482429151833

投入基建引致的物業增值。(政府徵稅、回收成本)⁹¹

- E. 每年公開拍賣「指定期內的發展權」⁹²。發展權(Development Right)以用途區分，並以可銷售的樓面面積計。指定期內若不動工發展發展權將報廢。發展項目須於限期內完成。(政府主導規模；市場主導內容)
- F. 業權擁有者購入發展權，便可按潛在發展的規劃去發展。(市場主導)

這混合模式有幾個好處：

最明顯的好處是即時大幅增加潛在發展用地，卻仍能掌控發展速度。每種用途的發展權的供應，很大程度決定了每種用途的樓面面積的供應速度。

第二，只要讓市場決定發展權的價格，拿來拍賣的發展權都會賣出；由於發展權都有時限，賣出的發展權都會轉化為發展。社會需要的樓面面積都會實現。

第三，可減少強行收地的需要。強行收地難免惹來反對兼無可避免要付出高昂的賠償費。

第四，可減少偏幫某些財團的疑慮。透過公開透明的拍賣程序和基建稅(Special Assessment)的徵收，可避免利益輸送的指控。

⁹¹ Stansel, Dean and Finch, Howard and Weeks, H.,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the Impact of Special Assessments Under Shifting Population Demographics (March 22, 2011). Journal of Business Cases and Applications, 2011.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865216>
“Levying Special Assessments to Fu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by Kara Millonzi, UNC School of Government, November 26th, 2014. Available at <http://canons.sog.unc.edu/?p=7917>

⁹² 有關發展權的運用，可參考

Jieming Zhu, “From Land Use Right to Land Development Right: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Studies June 2004 41: 1249-1267. Available at <http://usi.sagepub.com/content/41/7/1249.short>

Virginia McConnell, Elizabeth Kopits, and Margaret Walls, “How Well Can Markets for Development Rights Work? Evaluating a Farmland Preservation Program”, March 2003 • Discussion Paper 03-08,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Available at <http://www.rff.org/files/sharepoint/WorkImages/Download/RFF-DP-03-08.pdf>

這種混合式發展當然也有缺點。最突出的缺點就是不能十分肯定地去開發一個新市鎮。由於具體發展乃由市場主導，什麼地方以什麼速度發展都不再掌握在規劃師的手中，一些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可能無法實現。

5.3 發展岩洞

政府網頁指香港地勢山多，岩石堅固，非常適合發展岩洞。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11 年繪製出一幅全港岩洞發展適合性地圖，該地圖顯示約三分之二的香港土地適合發展岩洞。若能利用當中百份之五的土地發展岩洞，可提供面積約三千五百公頃的空間作發展用途（相等於約一百八十個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對現時土地供應緊張的情況大大紓緩。

5.4 對特別用途的照顧

經濟學者承認市場可以失效(market failure)。市場失效的原因有多個。發展經濟學有幼嫩工業(infant industry)之說。所謂幼嫩工業，乃指新興但未站穩陣腳的工業，由於基礎有待確立，無法在自由市場跟早已發展的工業競爭。幼兒工業在扶掖期或需特殊照顧，待茁壯成長後特殊照顧的措施便可取消。市場失效也可以源自非商業的價值。如果某種活動雖為社會帶來效益，卻無法給當事人帶來商業利益，當事人甚至無法支付活動的成本，要是沒有特殊照顧，這種活動便不可能持續。反過來，有些活動又可能為社會帶來損害，但當事人卻可置身事外，社會代價由別人承擔，自己不用付出。此外，市場結構(market structure)若無有效和足夠的競爭，亦可產生市場失效。

基於市場失效的考慮，有些空間的使用者需要特別照顧。譬如社區服務和設施，若都要自負盈虧和繳付市場租金，便要向服務對象收取高昂的費用。但服務對象或因沒有經濟能力，又或因故不願付出該等費用，社區服務無法支付高昂租金和其他成本便要終止。沒有足夠的社區服務，市民情緒出現問題，健康和諧的社區無法建構，競爭力便會倒退。

上文提到很多文化藝術工作者早前受惠於工廈的廉租而寄居於工廈。近年由於工廈的活化和變身，租金急升以致他們被逼遷或被逼暫停營運。此外，自從本港實行內地旅客自由行後，零售市道受惠於湧港的大陸旅客，舖租急升亦導致很多服務街坊的小店結業。這些小店之中，不少具有本土特色，若能扶掖它們，當中或有能發揚光大，成為本港品牌，甚至揚威海外者。2016 年的施政報告提及政府正積極考慮通過地契條款，要求發展商在合適的發展項目中加入電影院。其實，在地契加入條款才拍賣地皮的做法十分公平。筆者早已提出在地契加入條款要求發展計劃中若干比例的商舖面積指定給小店租用⁹³，相信會得到市民支持。小店可指定為非集團式、只此一家、並由港人經營的商店；由於幼稚園交市值租金經營往往有困難，即使 2016 年施政報告提出資助，部分非牟利幼稚園恐亦難全免學費，本報告建議小店舖位亦容納、甚至優先租給非牟利幼稚園。此外，小店區內的商店所繳的租金由市場決定，保持市場汰弱留強、提升效率的作用。同樣道理，在合適的發展項目中亦可加入只供文化藝術使用的面積比例，相信同樣會得到市民支持，並會有利於提升社會的凝聚力。

在地契加入條款要求發展商按規定照顧特殊需要的構思於 2016 年的施政報告首次獲得肯定。是年施政報告第 25 段提出：為了促進電影業發展，「政府正積極考慮通過地契條款，要求發展商在合適的項目中加入電影院。」然而肯定有人會質疑：為什麼要偏幫個別的行業？電影業要扶持，其他用途同樣可以找出多個值得政府扶持的理由。相反，支持本土經濟的小店條款不會指定怎樣的小店值得扶持。同屬小店的營運者之間有競爭，經營文具店的和經營食肆的乃至經營理髮店和電影院的，仍須互相競爭，以決定誰去誰留。

根據幼嫩工業的道理，政府有理由扶掖具潛力的初創企業。現時香港科技園公司就此擔當了重要角色。科技園設創新中心已與工業邨合併，為有優厚條件的初創企業提供較廉

⁹³ 何灝生，〈賣地可加小店商舖條款〉，《明報》樂觀天下，2014 年 3 月 3 日。

宜的營運空間和設施，提供積極創新、善用科技的生態環境，培育科技人才及促進交流協作。關於創新及科技產業的進一步分析，會於第十二章細表。

5.5 善用現有資源

解決問題要腳踏實地，靈活變通。我們土地資源匱乏，就要更適切地利用所有能利用的資源。政府 2016 年推出首個由工廈改裝成公屋的項目，是靈活變通的一個例子。然而，當局為保育該 H 型工廠大廈的「二級」歷史建築物而設的地位，加入額外間格上和使用上的限制，引起住戶不便。此外，自從 2016 年六月淘大工業村四級大火後，政府為顯示強硬有為打擊違契活動的姿態，取締了不少在工廈進行的商業文化宗教社團等活動。這屬於開活化工廈的倒車，肯定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6 總結

從香港不遜於新加坡的 TFP 表現看，假若香港能投入足夠的土地和人力資源，香港過去十年的經濟增長必定可以大大高於實際錄得的水平。但是今天不少人說：我們不必追逐數字上的經濟增長，我們寧取較樸實的生活，也不想犧牲我們的郊野公園和綠化帶；我們寧保留我們的農地，寧走復耕的道路，也不想見到石屎森林。我們要保障本地勞工的生計，不想外勞爭本地工友的飯碗。這些想法對很多人而言理所當然，亦是價值觀的問題，人家可以不贊同，卻不可以視為錯誤。

然而，要養活本港七百四十萬人口不是簡單的事情。即使我們不嚮往豪華的生活，也必須認識到：光是保持現時的生活水平也不是簡單的事。競爭力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社會在變、科技日新月異、人家都在拼搏，自己不努力，很容易被別人超前、取代、乃至被淘汰。何況市民對政府提供的服務和福利要求有增無減，如經濟不景、失業上升，我們現時豐厚的財政儲備也不可能維持多久。此外，很多口邊說滿足於平淡生活的人士

其實已是中產人士，衣食住行都有著落。但香港還有很多市民居住環境很差、每天為基本生活打拼。沒有土地供房屋、設施和經濟發展，他們怎能脫困？

新民黨提出香港須要成立「土地發展局」並建議政府構建熟地倉(land bank)，是解決長遠香港土地瓶頸的方法，值得考慮。但由政府主動收地始終成本高，在建熟地倉之餘，從政策入手，開啟民間推動發展之門，可能更有效益。關鍵是要有公平公開、避免予人印象涉利益輸送。本章提出一些嶄新方向給當局考慮。

至於輸入勞工的問題，*關鍵則在於設計可讓勞方安心的機制*，讓他們毋須憂慮會影響他們就業和晉升的機會，並應在輸入勞工期內確定他們加薪的速度。這將考驗勞顧會和政府相關部門的智慧。